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JOURNAL OF PARTY SCHOOL OF NAN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编委会主任 孟凡有

编委会副主任 郭榛树

主 编 郭榛树

主办单位：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南京市行政学院

2023 **01**
(总第123期)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学报

(双月刊)

目 录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

- 1 “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百年党章的逻辑主线研究
张家芳 宋一平
- 6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时代价值探析
姚 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10 人民至上：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底色与核心要义
余劲草 张 艳

马克思主义研究

- 16 列宁经典文本与毛泽东的政治实践性阅读——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为中心
张鹏辉
- 23 列宁《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的监督思想及启示
孙 茵

党史党建研究

- 27 延安时期党史学习教育的成功经验及启示
叶美燕
- 34 李富春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农业发展的实践及经验启示
李梦玥 赵美玲

目 录

41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功能优化与实现机制

张继军 王 潇

政治学与法学研究

47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级小微权力的图景、场域与规范路径

李 辉

54 新时代妇女反贫困实践的经验启示——基于 2012—2021
年相关文献的梳理

仙 珠 施敏靓

62 论政府失信行为的界定——以优化营商环境为视角

孙铭杰

文化研究

70 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的运行机理与功能表达——基于
英雄文化培育的视角

苗大鹏 刘社欣

城市现代化研究

79 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南京都市圈跨城区社会联系度研究
——基于 2022 年春节期间百度迁徙大数据

厉诗辰 吴义东 王先柱

88 南京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温李庆 顾巍巍 班 鸣

主管单位：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南京市行政学院

编辑、出版：本刊编辑部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建莲 王辉龙 刘玉东

李桂华 李菁怡 吴永胜

孟凡有 张华民 张家芳

陈 华 高信奇 郭榛树

编辑部主任：王辉龙

编辑部副主任：甘文华

学术指导委员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世谊 王庆五 布成良

张凤阳 陆剑杰 林闽钢

周毅之 童 星

2023 年第 1 期

总第 123 期

2023 年 2 月 15 日出版

地 址：南京市栖霞区

灵山北路 190 号

邮政编码：210046

电 话：025-86752230

电子信箱：njdxzb@vip.sina.com

承印单位：江苏河海印务有限公司

JOURNAL OF PARTY SCHOOL OF NAN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No. 1 2023 (General No. 123)

Contents

-
-
- (1) “Leading the Social Reform with the Self-Reform” : A Research on the Logic Thread of the Party Constitution in the Past Century **ZHANG Jiafang, SONG Yiping**
- (6) Research on the Times Value of the Spiritual Pedigree of Chinese Communists **YAO Jun**
- (10) People First; the Value Background and Core Meaning of the Great Party – building Spirit **YU Jincao, ZHANG Yan**
- (16) Lenin’s Classical Text and Mao Zedong’s Political Practice Reading——Focusing on the “*Leftist*” *Infantile Disease i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ZHANG Penghui**
- (23) Lenin’s Supervision Thought and Enlightenment in How to Restructure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Procuratorate **SUN Yin**
- (27)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of Party History Learning and Education in the Yan’an Period **YE Meiyang**
- (34) Li Fuchun’s Practice and Enlightenment of Lead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LI Mengyue, ZHAO Meiling**
- (41) Party Building Leads Grass-roots Governance; Function Optimization and Realization Mechanism **ZHANG Jijun, WANG Xiao**
- (47) The Picture, Field and Normative Path Of Rural Micro-Power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LI Hui**
- (54) Women’s Anti-poverty Practice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s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Sorting of Relevant Documents from 2012 to 2021 **XIAN Zhu, SHI Minliang**
- (62) Definition of Government Dishonest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SUN Mingjie**
- (70)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Function Expression of the Merit Awarding Ceremony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o Culture Cultivation **MIAO Dapeng, LIU Shexin**
- (79) A Study on Cross-urban Social Relations in Nanjing Metropolitan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ased on Baidu’s Migration Big Data During the 2022 Spring Festival **LI Shichen, WU Yidong, WANG Xianzhu**
- (88) Research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in Nanjing Metropolitan Area **WEN Liqing, Gu Weiwei, Ban Ming**

“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百年党章的逻辑主线研究^{*}

张家芳 宋一平

[摘要]“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条逻辑主线是贯穿百年党章的中心线索,反映了百年党章的主题主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本质和政治自觉,链接着百年党章与党章内在的各个要素,也揭示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和自身建设规律的探究与把握。

[关键词]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党章;逻辑主线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3)01-0001-06

逻辑主线是贯穿百年党章的主要线索,是我们理解和研究党章以及党的历史的关键密钥。“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作为百年党章的逻辑主线,在百年党章发展史中具有主题性、本质性、链接性等三大特点,反映了百年党章的主题主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本质和政治自觉,链接着百年党章与党章内在的各个要素。

为准确把握党章的逻辑主线,研究中将一大纲领、一大至六大通过的决议和宣言一并纳入研究内容。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迄今已制定、修订过一个纲领和十九部党章。党的一大纲领初步具有党章的性质,二大到六大党章虽然只有章程,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以及革命运动、政治任务等决议案均对党的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有较为详细的阐述,起到了纲领的作用,组织章程决议案则是对党章的进一步延伸和具体化。自七大开始,党章体例采用了章纲合一的形式,并一直延续至今。

一、“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反映了百年党章的主题主线

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管党治党的总规矩总章程,是党开展自我革命的根本制度规范。从严管党治党是一场伟大自我革命,一百多年来,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制度性成果集中体现在党章之中。而自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引领社会革命。如何革命,如何引领,在党章中也有非常清晰的逻辑理路。并直接体现党章管党治党的主题——“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将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写在了党的纲领、章程和决议之中。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列主义建党原则组建起来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政党,党章中关于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思想源自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

* [基金项目] 江苏省委党校系统(行政学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课题:“百年党章中‘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思想研究”(ZX230002)。

[收稿日期] 2023-01-10

[作者简介] 张家芳,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南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210046;宋一平,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210023。

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1]592}。列宁领导制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规定:“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向无产阶级阐明行将由他们完成的那个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性质和条件,组织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斗争形式的革命的阶级政党。”^{[2]11-12}革命导师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自我革命,但无论是“自觉的阶级政党”还是“革命的阶级政党”,无疑都包含无产阶级政党为保持自身先进性的自我革命。两种革命的思想(即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革命)显然已经隐含其中。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章程是以马列主义党建理论为指导制定的。一大纲领明确指出:“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3]1},直接阐明党领导社会革命的政治使命,党的政策涵盖党的各方面政策包括加强自身建设的举措,党的政策的主要目的即是指向社会革命。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章,并在二大《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对党自身提出明确的目标定位,“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3]162}。可见,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党必须具有自我革命精神,只有通过自我革命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才能够担负起领导社会革命的重任。此时,“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思想已经开始萌芽,并直接体现在党的纲领、章程等文献中。“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思想在章纲一体的党章中展现得更为清晰,七大之后的党章都在总纲部分开宗明义宣誓党的最终目标,再结合国情确定阶段性任务,进而从党的“主张的实现”“领导的责任”出发,提出党的建设的各项要求,并在条文部分不断完善。二十大之前的党章,尽管没有明确载入“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表述,但都将不同时期党对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最高认识体现其中。在讨论修订二十大党章修正案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郑重指出,“要把党的二十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使党章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更好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4]

“更好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正是修订二十大党章的目的所在,并在二十大党章中作为重要战略思想载入党的建设总体部署。从一大纲领到二十大党章,“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思想延续百年,贯穿于百年党章发展的全过程。

自我革命如何“引领”社会革命?党对社会革命的引领,在党章总纲部分具体展开为:人民立场和奋斗目标的引领、科学指导理论的引领、实践成效与经验的引领、阶段性目标任务的引领;在条文部分展开为先锋队伍的形象引领、坚强有力的组织引领和清正廉洁的风纪引领等。关于实践成效与经验的引领、阶段性目标任务的引领,反映不同时期革命任务的变化与调整,直接体现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实际成效。其他内容则可以看作是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实现方式。自我革命的主体和对象是政党自身,社会革命的主体是中国人民,党员是其中的骨干力量,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通过党组织和党员对人民群众的引领来实现的。引领首先是立场的引领,这是引领的前提,只有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从第一个纲领“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3]1},到二十大党章72次提到“人民”,每一部党章都会重申党的人民立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科学理论是发挥引领作用的重要武器,为人们提供前进的正确方向和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我们党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历次党章修改都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正,并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写入党章,以进一步发挥对革命的指导作用。先锋队伍的形象、坚强有力的组织和清正廉洁的风纪是实现引领的重点,也是百年党章的重点所在,在党章中分别展开为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制度、党的各级组织、党的纪律与纪律检查机关等章节。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对人民群众具有无比强大的引领力感召力,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关键;坚强的组织建设则是发挥引领作用的基石,团结协作高效执行的各级党组织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也是人民群众可靠的主心骨和坚实的依靠力量;清正廉洁的党风党纪是引领的底线,是群众判断一个政党是否保持马克思主义本色的标尺。就总体而言,这几个部分合在

一起也是每一部党章着墨最多的地方,是党章的主要内容。一大纲领到六大党章,以及七大到二十大党章中的党建部署和条文部分,都是紧紧围绕这些重点内容来展开的,这些内容直接反映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体现党管党治党的水平和自我革命的最高制度性成果。综上所述,自我革命如何“引领”社会革命,其关键是通过从严管党治党来破解引领难题的。“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不仅是贯穿百年党章的逻辑主线,也直接反映百年党章管党治党的主题。

二、“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本质和政治自觉

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也是指引中国共产党一路前行的最高党内法规,其内在的逻辑主线应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价值准则与政党本质。

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性”的本质属性。“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411}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品格,中国革命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有诸多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20世纪初,中国有300多个政党和政治团体,究竟谁能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中国的先进分子在苦苦探寻。“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6]507}为什么要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正如陈独秀所言,“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7]57}。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始,就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秉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宗旨,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党的二大宣言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3]132-133}党的七大第一次将“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宗旨写进党章。十二大党章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列为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至二十大党章,一直作为基本要求之一。无论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服务人民的本质属性。

党的自我革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自

觉。不断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特征,是确保政党本质的需要。革命之所以必需,因为“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5]171}。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早期成员脱胎于旧社会,不可避免带有旧社会的陈旧习气,而旧思想旧文化的侵染更是长期的,需要通过自我革命激浊扬清;另一方面,要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大多数人谋幸福,也必须通过不断自我革命摒弃固有的人性弱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的同时,也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革命精神。为建成一个始终站在人民立场的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先锋政党,每一部党章都将组织建设作为最核心的内容,并根据社会革命的需要不断完善发展。一大纲领的主要内容是组织建设,二大到四大党章都将组织单列,五大之后的党章不断完善从中央到基层的组织架构与各级组织的职能。组织又是由一个个成员组成的,党员的能力素质、信仰忠诚直接关系到政党的前途命运,二大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党内必须开展适应于革命的“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3]162},并要求“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3]163},并且不要求做到行动一致,还要求在思想上真正认同,即站在“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的高度来认识和施行。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第一句即是“牺牲个人”。至党的十二大,正式将入党誓词写进党章,要求每一个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可谓自我革命的最高境界。

执政条件下的自我革命更加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清醒与政治自觉。列宁在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之后,在执政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执政党自我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全部问题在于,以健康的强有力的先进阶级作为依靠的执政党,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队伍”^{[8]22}。列宁党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重要党建理论来源。早在1927年,五大党章就增设了监察委员会,承担起维护党的纪律和党组织纯洁性的重任。1956年,执政之后的中国共产党越发重视监察工作,八大党章第一次明确了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任务:“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

令的案件;决定和取消对于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和申诉。”^{[9]245}拨乱反正时期的十一大党章恢复了党内监察机构,“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改革开放后的十二大党章第一次规定了地方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双重领导体制。十九大党章对这一体制进一步优化,地方纪委发现同级党委委员违纪的,“应当在向同级党的委员会报告的同时向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不再需要经过同级党委批准。涉及常务委员,不再需要报同级党委,而是“报告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10]57-58}。党内监督体制的完善,推动十九大后反腐败工作取得压倒性胜利。面对“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党对自我革命的认识不断深化。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战略思想,并将“坚持自我革命”列为党百年奋斗的第十条宝贵经验,在十条经验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指出,“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11]11}“反腐败是最彻底

的自我革命”^{[11]52},并将上述“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思想成果载入党章,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11]107},这说明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通过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相互促进,直至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路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的高度清醒和政治自觉,彰显了党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利益的坚定立场和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

三、“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链接着百年党章与党章内在的各个要素

“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条逻辑主线是贯穿百年党章的中心线索。从横向来看,就党的纲领和每一部党章而言,“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条逻辑主线体现在每部党章及其构成要素展开的各个层面,将每部党章自身的内容链接为一个有机整体。从纵向来看,“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链接党的纲领和每一部章程,贯穿于百年党章发展史,从始至终、一脉相承。

表1 二十大党章内容与“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思想的关联表

党章的主要内容	社会革命的视角分析	自我革命的视角分析	引领的视角分析
总纲第1段:党的性质与奋斗目标	政党属性及社会革命的长期目标	党的性质与目标决定自我革命	人民立场的引领 奋斗目标的引领
总纲第2—8段:指导思想与行动指南	社会革命的指导理论	党的指导思想内在要求自我革命	科学理论的引领
总纲第9—10段:历史成就与宝贵经验	社会革命的成效与经验	党的历史经验内含自我革命	实践成效的引领 经验规律的引领
总纲第11—24段: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与战略部署	当下与未来一段时间如何开展社会革命	完成当前任务需要自我革命	阶段性目标任务的引领
总纲第25—31段:党的建设总体部署 总纲第32段: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	社会革命的领导力量	自我革命的战略要求: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解决党内问题相统一	自我革命的战略高度: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第一章:党员 第六章:党的干部	社会革命的骨干力量	自我革命的主体和对象	先锋队伍的形象引领
第二章:党的组织制度 第三章:党的中央组织 第四章:党的地方组织 第五章:党的基层组织 第九章:党组	社会革命的组织保障	自我革命的组织保障	坚强有力的组织引领
第七章:党的纪律 第八章:党的纪律检查机关	社会革命的纪律保障	自我革命的常态化特征	清正廉洁的风纪引领
第十章: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	革命的后备力量		
第十一章:党徽党旗	革命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象征与标志		

“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链接起每部党章的全部内容。以二十大党章为例,党章分为总纲和条文两大部分,表1分别从社会革命、自我革命以及引领的视角对党章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党章是紧紧围绕着“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而展开的。

从表1可见,“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思想贯穿于二十大党章的各个部分,将党章总纲与条文及其内在各个要素链接为一个有机整体。党对自身担负的社会革命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自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领导社会革命,为了成功领导社会革命,党必须保持先进性纯洁性,不断提升领导能力,为此,自我革命成为党的自身建设的战略指针和永恒主题。二十大党章在总纲部分阐述社会革命的目标、指导思想、历史成就经验以及当下的目标任务之后,“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便被纳入党的建设总体部署。自我革命还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才能保证正确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自我革命必须处理好的四大关系时,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解决党内问题相统一”^{[12]534}。自我革命是要破解大党面临的独有难题,为了将党建设成为能够领导民族复兴的坚强核心,党章条文分别从组织成员、组织制度和组织体系、组织纪律和纪律检查机关等方面展开,以增强组织的先进性。

二十大党章是迄今最为完善的党章,“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逻辑主线在二十大党章中的体现也最为显著。此前的纲领和章程在内容的完备性方面虽有不同程度的欠缺,但就总体而言,“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逻辑主线在早期的宣言、纲领、章程和决议案中也有着较为清晰的展现。及至七大之后,则直接体现在每一部党章的总纲和条文之中。

“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链接着党的纲领和每一部章程,贯穿于百年党章的全部历程。如前所述,党在成立之初,就将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写在了党的纲领、章程和决议之中。每一部党章在阐明党的任务之后,紧接着就对党的建设做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要求。二大宣言提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3]133},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社会革命都是围绕着“反帝反封建”展开的。为了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党自身必须成为“一切革命的群

众组织及革命的国家组织之中坚”^{[13]534}“是以自觉的,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13]535}。八大党章是党执政之后制定的第一部党章,此时党已经领导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由此党的社会革命任务发生了重大调整,转向发展国民经济和建设“四个现代化”,“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7]224-225}。鉴于党的领导地位,党章规定“更加需要向党的一切组织和党员提出严格的要求”,对于危害党的活动的分子,“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甚至开除他们出党”^{[7]228}。八大党章反映了当时对执政党建设的最高认识,对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有重要发展,并进一步严格了党员的义务和权利,明确了党的各级组织的基本任务。九大、十大、十一大党章深受“文革”影响,但也是围绕着党的目标任务和党的建设来展开的。十二大致力于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将“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作为党的工作重点载入党章,并第一次提出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强调“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加强党的建设”^{[14]156}。十三大到二十大党章的基本内容保持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管党治党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十四大党章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第一次载入“从严治党”。十九大党章提出“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同时将“坚持从严管党治党”列为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之一。至二十大将自我革命上升为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将党章作为最根本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通观百年党章,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相互推动、相互促进,“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逻辑纵贯始终。

在一百多年的奋斗征程中,中国共产党总是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及时将创新成果体现在党章之中,并按照党章要求,站在自我革命的战略高度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发挥对社会革命的引领作用,一步一步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辉煌成就。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应对新挑战新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更加要求我们深刻理解百年党章“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逻辑主线与战略要求,严

(下转第9页)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时代价值探析^{*}

姚 竣

[摘要]党的二十大开启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使命光荣,任务艰巨。全党全社会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实现这样的奋斗目标,决定着党和国家的事业能否顺利达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蕴含着我们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它既为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提供了动力源泉,又为推动党的建设提供了丰厚滋养,还为不断增强自信自立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精神指引。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时代价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图分类号]D64;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3)01-0006-04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1]4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是由多个具体的“精神坐标”汇聚而成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精神谱系”。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疫精神等一系列极具代表性的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进而构筑起鲜活且丰富的精神谱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召开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2]19-20立足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论述,有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时代价值。

一、为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提供了动力源泉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是一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践行初心使命构成了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伟大精神来源于伟大实践,实践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进程,精神同样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主观能动力量。伟大精神又推动新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践行初心使命提供了动力源泉。

党的初心使命是党的性质、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既是贯穿党的初心使命的一条红线,同时也使得党的初心使命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蕴含的焦裕禄精神、脱贫攻坚精神、伟大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具体呈现,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始终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致力于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成现实,致力于将

* [基金项目] 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研究专项“高校思政课教学中意识形态‘漂浮’现象及对策研究”(22VSZ156)。

[收稿日期] 2022-12-07

[作者简介] 姚竣,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211106。

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不断向前推进。同时,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蕴含的理想信念不断为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提供动力。“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3]¹⁵一名党员如果在精神上“缺钙”,就会变成东摇西摆的“墙头草”,践行初心使命的信念就会动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强调我们目前的工作还存在着“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不强,实干精神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4]¹⁴的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则是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当前,全党上下正积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对于广大党员同志来说,学党史是要做好“明理、增信、崇德、力行”,要从党史学习中理解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以精神的营养、价值、理念来真正做到传承弘扬、继往开来、激励未来,为不断践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增添精神力量。在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理想信念始终都是一条贯穿前后的线索。且这一谱系的形成也与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在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就必须从中吸收智慧的滋养,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新实践,坚持和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以此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

二、为推动党的建设提供了丰厚滋养

伟大精神不仅能为践行初心使命提供动力,也能为党的建设提供滋养。譬如毛泽东曾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5]¹⁵⁰长征精神不仅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念,也彰显了其在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风貌及品格气质,作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的红色基因,是我们在新时代继续推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强大精神资源和精神力量。

在新形势下,我们党依旧面临着重大风险和挑战,新征程中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旗帜鲜明地讲政治,突出党员的政治标准。同时,也要注重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

风建设等方面,解决好部分党员理想信念淡化、理想信念动摇等问题,不断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汲取丰厚营养。首先,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源的伟大建党精神能够为新征程中继续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提供精神基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必须继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强化理想信念教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并将精神谱系融入贯彻到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作风建设等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途径。其次,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蕴含的自我革命精神、改革创新精神等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各部分的精髓与实质,其实是革命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因此,勇于自我革命和不断推进改革创新,不断将精神谱系的内涵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能够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党的信念信仰教育以及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等提供思想智慧。最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也是党不断建设和发展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们需要在新的实践中,根据新的时代特点不断概括新的精神特征,同时结合历史发展经验,对原有精神的内涵作出新的阐释,从而为该谱系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当前,我们正处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这也就要求我们拥有新的精神力量来丰富精神谱系的时代内涵——新阶段的长征、新时代的雷锋、新的改革开放精神,等等,从而使这一谱系为全党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和强大的价值理念支撑。

三、为不断增强自信自立提供了精神指引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我们在新时代不断增强自信自立的精神指引。一个组织是否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关键在于其成员是否团结一致、是否自信自立地面对风险挑战。人心向背取决于吸引力、团结起来产生凝聚力、共同奋斗需要价值观引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价值观,就是引领方向的一面旗帜。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也是百年来中国人民始终保持自信自立的精神支撑。首先,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构筑中国共产党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纽带和桥梁。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的伟大,就在于其拥有顽强的生命力、深厚的凝聚力、坚韧的忍耐力和巨大的创造力。也正是因此,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才能屹立于世界之中。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原则,以集中统一的权威领导、党内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基层坚强的战斗堡垒为基础,运筹帷幄,做到“全国一盘棋”,以最快的速度取得了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阶段性成果,最大程度地维护了广大群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铸就的“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6]12}及在此过程中涌现出的一线抗疫人员和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抗疫故事,是我们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最好证明,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自信自立解决难题的精神风貌。无论何时何地,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凝聚力、向心力,对于奋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线的广大党员们来说,就是冲锋号、就是指南针、就是照明灯,就是坚持自信自立的深厚底蕴。其次,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继续推进现代化的精神生产力。如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在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共产党凭借良好的政治定力,面对新的历史挑战,必须继续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更好地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如何协调好国内国际两大循环,构建好新发展格局,贯彻好新发展理念,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中再创辉煌,这些问题都需要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去探索和践行,必须要在新的实践过程中用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滋养,自信自立,并将这种自信自立转化为创造新的奇迹和伟业的强大推动力,进一步拓展党的精神谱系,以新精神和坚定的自信自立激励新实践、推动新发展,从而使我党永葆青春活力。

四、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21}。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已走过百年历程,百年恰值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

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面向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遇到的困难、阻力、矛盾和挑战就越大,就越离不开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可谓历久而弥新,其中蕴含的强大精神力量能够为中国共产党实现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走好新征程,首先,必须发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所蕴含的团结精神,以实现政治的团结、思想的团结、意志的团结和行动的团结。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推动民族复兴就有了主心骨,精神上由被动转变为主动。之所以成为主心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组织了起来、团结了起来。没有党的团结统一,没有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就无法凝聚起人民的力量和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无法构建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合力。其次,必须发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蕴含的奋斗精神,以引领中国人民进一步将理想信念和信仰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的奋斗意识更加强烈、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具体体现在始终坚持为信仰和理想而奋斗、为崇高使命而奋斗、为具体目标而奋斗,不仅接力奋斗、共同奋斗,而且顽强奋斗、艰苦奋斗。新征程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中国人民敢担当,而且需要中国人民能吃苦、肯奋斗,只有通过大力弘扬奋斗精神,才能不断把团结起来的力量切实转化为改变社会的物质力量。最后,必须发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蕴含的斗争精神,主动防范化解风险,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精神力量。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强大的志气、底气和骨气以及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知重负重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是战胜前进路上面临的新矛盾和新挑战的精神资源。新征程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譬如意识形态的斗争、西方价值观念的渗透、党员干部的腐败等,要继续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要发扬斗争精神迎接各种困难和挑战并闯出新的天地。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我们既要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源自生动的社会实践,又要认识到人的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对于实践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能够在新征程上发挥出强大的精神力量,二者紧密相连、密不可分。之所以构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为了能在寻根求本的同时,加强广大党员干部历史认同、文化认同,进而促进广大党员干部对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认知和认同,提高自身政治觉悟,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使其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面建设当中。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我们党的巨大思想政治优势,是中华民族长期维持进取与奋斗精神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动力之源,更是我们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前提。在这一伟大精神谱系的指引下,我们将永远有信心、有胆识、有决心跨越任何艰难险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道上稳步前行,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2]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习近平.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责任编辑:木 杉)

(校 对:木 子)

(上接第5页)

格贯彻执行党的章程,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加强革命性锻造,将党的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列宁全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3]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4] 人民网. 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DB/OL]. (2022-09-09)[2022-12-20]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2523471>.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6] 陈独秀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7] 陈独秀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8] 列宁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4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0] 中国共产党章程[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1] 党的二十大文件汇编[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2.
- [1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3]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4]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育 东)

(校 对:江 南)

人民至上: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底色 与核心要义*

余劲草 张 艳

[摘要]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精神底蕴和价值底色,它萌生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求解放,为民族求独立”的革命热忱之中,发展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接续奋斗之中。没有中国共产党为了人民的初心,就不会有伟大建党精神,因而“人民”一词贯穿于伟大建党精神始终,更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科学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奋斗的理论自觉,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生动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旨归,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深刻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献身的精神品质,对党忠诚、不负人民鲜明宣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忠诚的高尚情怀。

[关键词]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人民群众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3)01-0010-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并深刻揭示了其历史地位,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价值旨归、精神品质和高尚情怀四个方面深刻揭示了伟大建党精神的人民本性,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人民至上”的价值选择。

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科学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奋斗的理论自觉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科学真理是因为其真理性源于为人民求解放的价值选择,共产主义理想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坚守的崇高理想是因为其崇高和远大是基于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价值归宿。这样的理论和理想与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本心具有思想上的高度契合性、行动上的高度贯通性、价值上的高度一致性,因而会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奋斗的理论指导。

(一)人民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实现自身发展的科学指南

马克思主义是真正为了人民而创造的科学思想体系,是真正看到人民主体性的科学思想体系,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始终将人民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实践的践行者。

唯物史观强调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一切历史活动都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一些宗教神学家和哲学家因为没能认识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规律,因而绝大多数拒绝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将历史的主体归于上帝、神或绝对精神。还有一部分哲学家看到了人的重要性,但是他们所看到的“人”仅是历史舞台上的英雄,他们用英雄史观来分析社会,忽视了在英雄背后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人民群众。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推动

* [收稿日期] 2022-09-18

[作者简介] 余劲草,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750021;张艳,博士,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750021。

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认为与社会生产相联系的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还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更是人民的理论。就实践的主体维度而言,一切实践活动的主体都是人民,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离不开人民群众、精神财富的创造活动离不开人民群众、社会进步的变革活动更离不开人民群众。就人民的行动维度而言,人民的一切活动都必然是实践,人民想要实现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的双重满足,想要成为创造历史的推动力量,其根本性、唯一性的途径就是实践。可以说人民性和实践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实现了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是在人民群众求解放、求发展的实践活动中萌发、形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是具有实践性和人民性的科学思想体系。

(二) 人民的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是人民实现自身发展的领导力量

任何政党都有其特定的政治立场与核心价值,政治立场决定了政党的实践活动,核心价值决定了政党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二者归根结底取决于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同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16}秉持着马克思主义人民性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其维护的必然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其根本政治立场必然是人民立场,其核心价值选择也必然是为人民服务。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放在心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立场,将人民群众放在最高位置。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在中国共产党“打倒国民派,拥护苏维埃”的号召下,革命先烈们浴血奋战、不畏牺牲,为人民群众谋得了追求幸福生活的根本社会条件;艰难探索的建设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感召下,先辈们顽强拼搏、艰苦奋斗,为人民群众谋得了追求幸福生活的根本政治前提;开拓创新的改革时期,在中国共产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影响下,改革先锋们勇立潮头、锐意进取,为人民群众谋得了追求幸福生活的根

本物质条件。直到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团结奋斗,依然为的是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作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没有一刻忘记过自己的历史使命,没有一刻放弃过自己的政治立场,始终坚持着“为了人民”的核心价值,在百年奋斗征程中带领中国人民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三) 人民的理想:共产主义理想是人民实现自身发展的精神支柱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更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支柱。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共产主义理想始终将“人民”作为未来社会构建的主体力量,它极大地解放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焕发出千百万底层劳动者的主动精神,为人民群众推翻旧的世界、建立新的世界提供了强大且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首先,这种力量表现为共产主义理想极大地解放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从奴隶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始终不变的追求就是实现自由和解放。但是,每一次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制度更替都只是将其中的“一部分人”解放出来。这种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和牺牲之上的“部分人”的解放是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压迫的解放,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虚假的、有条件的解放。正是因为如此,处于社会绝大多数的劳动者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真正的自由和解放,他们始终处于被剥削和被压迫之中,直到共产主义的出现才让处于压迫中的劳苦大众看到了曙光。共产主义理想中那个“自由人联合体”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体现着对劳动人民的真切关怀,它让劳动人民认识到了自身的地位、手中的力量,更将人民群众从“只能受人压迫”的思想禁锢中解放了出来。

其次,这种精神力量还表现为共产主义理想重铸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支柱。共产主义理想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擘画了一幅新的图景,在这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不公,人人得以幸福,人人可追求自由。这样美好而又崇高的理想为黑暗中的劳苦大众点亮了远方的灯塔,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必须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之中。在人民群众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过程中,共产主义理

想为无产阶级注入了自觉的阶级意识和强烈的革命精神,让人民群众在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过程中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生动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旨归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从党的奋斗初衷和党的发展方向出发,将党的初心使命概括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灵魂之问。这一回答极为生动地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将人民放在最高位置,为人民群众矢志奋斗的价值追求。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中国人民从受尽压迫到追求自由,从生活苦难到生活幸福,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坚定信念。

(一)“为人民谋幸福”的庄严承诺契合中国共产党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奋斗史,从“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2]137}的革命年代到“我们的目标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的新时代,为了人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实践活动的价值起点和价值旨归,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安全、人民的幸福始终是衡量一切的根本标准。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的安全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人民群众安全感不断提升。在血雨腥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时刻受到威胁,为了保障人民安全,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无数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以“无我”的状态投入战斗,用鲜血和生命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屏障。建设时期,守护人民安全依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头等大事。2015年,也门情况危急,中国第一个派出军舰进行撤侨行动,“中国人民不论在哪,祖国都能带你们回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在此危急时刻党中央坚持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全国各地团结互助、和衷共济,夺取了全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没有一刻忘记过自己的初心,没有一刻不牵挂着人民群众。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维护人民利益,人

民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带领和组织人民群众发愤图强、艰苦奋斗。人民群众物质匮乏,中国共产党就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人民群众的物质获得感;人民群众精神空缺,中国共产党就以供给高质量文化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中国共产党就以全面提升平安中国建设水平增强人民群众安全获得感。“抗美援朝”“改革开放”“脱贫攻坚”“棚户区改造”“建设四好农村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每一项决策、制定的每一个方案都将人民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全方位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得到满足。革命年代,人民的幸福可能仅仅是“不受剥削、不受压迫、不受威胁”;建国初期,人民的幸福是社会稳定、温饱不愁;改革开放时期,人民的幸福是生活富裕,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的幸福是坚实的物质保障、优美的生活环境、良好的教育条件、丰富的精神生活……不论什么时期,不论人民群众对幸福的标准如何变化,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的真切需求放在首位,始终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为奋斗目标。

(二)“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昭示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价值遵循

从《孟子·离娄章句上》中“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身、家、国”三位一体观到《日知录·正始》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共同利益观,再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民族整体观,家国情怀已经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事实也正是如此,一个受尽凌辱的民族,它的人民如何能受人尊重?一个富裕强大的民族,它的人民又怎会受人欺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早已成为“共命运、共荣辱、共兴衰”的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先辈们穷极一生的追求,也是当代中华儿女们奋斗终生的期待,更是中国共产党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以长远的眼光所做出的战略规划。

百年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和中华民族的光明前景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

牲、甘于奉献的根本推动力量。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年代,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开拓一方新天地的建设时期,在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改革洪流中,在踔厉奋发、勇毅前进的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夙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价值选择。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的革命精神、以“满腔热血沃中华”的爱国情怀、以“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奋斗精神、以“丹心未泯创新愿”的创新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杀出一条血路”,让中华民族以不可逆转的势头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迈进。

(三)“为世界谋大同”的崇高理想彰显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从陶渊明的“桃花源”到李汝珍的“君子国”,从孔子系统的“大同论”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几千年来,大同社会一直是全人类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赓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文明传承,抱守“协和万邦”“和实生物”的文化精神,践行“大道不孤,天下一家”的行动价值,在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改变自身命运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基础上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为经济全球化注入中国力量,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以胸怀天下的“大道”和人民至上的“情怀”引领人类社会走向美好未来的“大同”。

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的演讲主旨演讲中指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求索奋进,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3]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志向所在。从建国初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倡议,从“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到“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全人类发展的未来前景和前途命运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更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担负的历史责任。今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选择,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基础上将“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谋进步”作为更高的价值追求。

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深刻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献身的精神品质

自1921年以来,无数的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接续拼搏,攻克了前进道路上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彪炳史册的中国奇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甘将热血沃中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们“用青春与汗水、鲜血与生命为新中国奠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他们开拓创新,勇于担当,为中国的发展“杀出一条血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他们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来他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为的是心中崇高的革命理想、为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归根到底为的是他们心心念念的中国人民。

(一)在革命年代的血雨腥风中,中国共产党为满足人民对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的需要英勇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浴血奋战的二十八年里,面临着无数次的挑战和挫败。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残忍杀害,面对惨绝人寰的白色恐怖,面对国共合作的全面破裂,中国共产党没有屈服,更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他们依然高举手中革命的旗帜,依然坚持心中崇高的革命信仰,在黑暗中继续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军队向各革命根据地发起大规模“围剿”,面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面对牺牲惨烈的红军队伍,中国共产党没有放弃,更没有向反动派低头,他们重整旗鼓、重振士气,召开遵义会议,在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中转败为胜,转危为安,继续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前进。抗日战争期间,面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和日本侵略军的步步紧逼,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领中华儿女以昂扬的斗志投入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革命洪流之中。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拒绝和平民主的要求,悍然发起全面内战,面对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树立“革命必将胜利”的坚定信心,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

(二)在建设时期的艰难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为满足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艰苦奋斗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战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局面,面对波谲云诡、复杂敏感的国际局势,中国共

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为的是满足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建立一个人民期待的先进的工业国。人民渴望工业化、期待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就带领人民群众艰苦奋斗,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一五”计划,改变了我国工业残缺不全的现状,增强了基础工业实力;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人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中国人民志愿军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一道为维护国家安全、捍卫人民利益而斗争,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捍卫新中国的安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科技发展总体水平至少落后西方发达国家一百年,面对“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中国人民期望国家拥有先进的、强有力的科学技术,于是,以钱学森、李四光、邓稼先为代表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潜心科学研究、投身科学事业,集智攻关、勇攀高峰,“两弹一星”等尖端科技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我国科技实力大幅提升,国防安全体系得以完善。

(三) 在改革开放的开拓创新中,中国共产党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奋力拼搏

20世纪70年代,各种新兴科技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世界经济正在以前所未有之势向前发展,人民群众期待更丰富的物质享受和更多样的精神生活,但此时的国内,政治局势处于混乱状态,经济发展脚步放缓。面对这一局势,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深刻认识到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拓创新、锐意进取,以“革故鼎新的超越精神,披荆斩棘的革命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只争朝夕的追赶精神,敢闯敢试的攻坚精神,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直面难题的担当精神”向阻碍社会发展的弊端和藩篱开刀,向阻碍人民富裕的落后思想开刀,人民的生活需求从求温饱、求生存转变为求富裕、求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从僵化封闭逐渐走向勇于创新、开拓进取。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依然将人民群众的需要放在首位,为了让人民享有更丰富的物质生活、更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一起奋斗在“希望的田野上”,一起抗击“非典”病毒,一起攻克“青藏铁路”的三大难题……一起创造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

(四) 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矢志奋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人民群众的切实需求不再仅仅停留在物质文化层面,而是向环境更加优良、教育更加优质、社会保障更加健全的美好生活需要转变。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人民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也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无我”的奋斗状态积极投身到新的伟大事业之中。事实也正是如此,千百年来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华民族,小康社会一直是中国人民心中最真切的期盼。新时代,广大共产党员以热血赴使命、以行动践诺言,带领千万中华儿女奋勇拼搏,建功立业,在脱贫攻坚的新战场上接续奋斗,谱写了沧海桑田、波澜壮阔的民族史诗,绘制了山乡巨变、锦绣山河的时代画卷。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共产党从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目标出发,带领全国人民开展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举全国之力开展生命大救援,最大程度地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切身利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的工作态度和“为民族奋斗,为人民奉献”的高尚情怀带领中国人民砥砺前行,从“脱贫攻坚”的战场上走到“乡村振兴”的大道上,从“全面小康”的奋斗中转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得到满足。

四、对党忠诚、不负人民鲜明宣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忠诚的高尚情怀

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还是在艰苦奋斗的建设时期,“对党忠诚”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不负人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保有的崇高情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从建党伊始就以为人民造福为己任,始终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依靠人民的力量从弱变强、从小变大。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负人民的真切期待,不负人民的殷殷嘱托,更不负人民的厚望重托。

(一)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始终不负人民的真切期待

遥望百年前的中国,山河破碎,分崩离析,国家

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西方列强变本加厉的掠夺,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的妥协,地主阶级残酷无情的压迫,底层人民生活困苦的现状,残酷的现实让无数仁人志士扎红了眼,刺痛了心。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探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救国方案,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从器物救国到制度救国,他们改变了中国的军事武器,改变了中国的教育,甚至改变了中国的制度,但是一次次的探索换来的却是接踵而至的失败,一次次仿佛看到的光明换来的却是如故的黑暗。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中国共产党人为饱受欺凌的中国人民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终于让处于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了真正的光明和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为了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走出倍受压迫的黑暗境地,实现自由和解放,追求幸福和光明。所以,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为谁而生、为什么而生。“人民至上”早已刻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骨血之中,“砍头流血”的牺牲不能动摇它,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不能动摇它,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情炮火更不能动摇它。

(二) 中国共产党因人民而兴,始终不负人民的殷殷嘱托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也就注定了会因人民而兴,人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重要法宝与核心密码。从建党时50多名党员到今天成为拥有96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政党,这一政党发展奇迹的背后也让世界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有什么魅力?为什么发展如此之快?”这些问题。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征程,一切胜利的取得皆是因为人民,一切辉煌的铸就皆是依靠人民。国民大革命时期,人民群众的掩护和支持让中国共产党的有生力量在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得以保存;解放战争期间,面对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反动派,虽然“小米加步枪”不如“飞机大炮”先进,但是解放军战士们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人民群众始终会给予我们最强大的支持。“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给予人民的始终是其“所欲所求”之物,这也就决定了人民会选择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发

展经济、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每一次进步都是依靠人民的力量,“中国奇迹”是人民创造的奇迹,“中国力量”是人民给予的力量,“中国智慧”是人民汇聚的智慧。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记得人民的殷殷嘱托,在人民的支持下奋力扬起前进的风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一往无前。

(三)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造福,始终不负人民的厚望重托

古往今来,民心是“谁主沉浮”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将为人民造福作为根本的价值追求。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的幸福放在第一位,带领人民群众赶走了帝国主义列强,推翻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将人民群众从受人压迫的窘境中解放出来,人民实现了人身自由和幸福。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制度、发展工业、实行改革开放,将人民群众从温饱不足的生活环境中解放出来,让人民实现了物质享受的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为民造福,带领中国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疫情防控阻击战,以前所未有之势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但是,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是阻碍人民幸福生活的主要因素,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境界,站稳人民立场,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显著的实质性成效。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3] 习近平.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21-04-21(02).

(责任编辑:成虎)

(校对:江南)

列宁经典文本与毛泽东的政治实践性阅读

——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为中心*

张鹏辉

[摘要]毛泽东对列宁的著作尤为钟爱和推崇,且十分注重从中获取解决中国问题的经验参照、理论指导和方法启示。若就个案考察而言,此点尤为典型地体现在其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政治实践性阅读之中。自1932年首次接触该书以来,毛泽东在随后40余年的政治生涯中频繁联系中国实际对其加以阅读、论析和推介,并以此作为理论学习、思想改造、党的建设等政治实践性活动的重要依据。毛泽东对该书的阅读和推介虽然出现过偏差,但整体上是有益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深化和发展的,而且对于新时代建构科学的马列主义经典文本阅读观亦具有重要的镜鉴价值。

[关键词]毛泽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阅读史;政治实践性

[中图分类号]A821;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3)01-0016-07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下简称《“左派”幼稚病》)是列宁阐述马克思主义战略与策略问题的重要著作。自1920年出版发行以来,该书不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也得到了中共党内领袖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频繁联系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对其加以论析,将其作为策略制定、党的建设、理论学习、思想斗争与改造等政治实践活动的重要文本依据。近年来,随着阅读史的兴起及其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推介,学界就毛泽东对《“左派”幼稚病》的阅读、阐释和推介等问题做了一定考察,在史实建构层面厘清了不少重要问题。不过总的来看,既有研究成果多聚焦于宏观层面的史事论析,较少探究与史事密切关联的社会、文化和语境等因素。就此而言,若欲从阅读史的角度探究毛泽东与《“左派”幼稚病》这一论题,恐怕还有待更为细致的研究阐释。

一、结合《“左派”幼稚病》批判党内“左”倾错误

毛泽东最早接触《“左派”幼稚病》一书是在1932年红军攻打漳州之际。通过对这本书的研读,毛泽东从理论上深刻认识到了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性,意识到了“左”倾和“右”倾一样危害革命事业。正因如此,当“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之际,他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反复研读《“左派”幼稚病》,同时把这本书推荐给党内其他同志。1933年11月前后,毛泽东在给闽西指挥红军作战的彭德怀寄去《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之后不久,又寄去《“左派”幼稚病》一书,并在书上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本书,叫做其一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1]416-417}那么,毛泽东为何要在此时向彭德怀推荐《“左派”幼稚病》一书呢?应该说,在全党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和国民政府对马列著作严加审查、封锁的环境下,此举固然有提高党员干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苏联经典教科书及其对中国教科书的影响研究”(18BDJ027)。

[收稿日期] 2022-08-17

[作者简介] 张鹏辉,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510631。

部理论水平方面的考虑,但是若联系此前一段时期毛泽东同“左”倾临时中央在军事路线等问题上的争论,以及他因此而受到打击、排挤的经历来看,便不难发现毛泽东此举背后的深层考虑。

自王明等留苏学生逐步掌握中央最高领导权之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怀疑和不支持这一路线的党内同志受到打压,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害。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其他领导人围绕着如何制定同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方针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一番争论之后,中央局多数领导人提议并撤销了毛泽东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决定由周恩来兼任这一职务。随后,在1933年初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临时中央借此将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并在苏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毛泽东本人虽受到莫斯科方面的点名保护,但也因此被剥夺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职务^{[2]33}。如果说,通过对《“左派”幼稚病》的阅读使毛泽东从理论上认识到了“左”倾思想的表现和实质,那么在亲身经历了“左”倾临时中央对自己的排挤与打压之后,毛泽东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则切身感受到了“左”倾教条主义之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危害。这是促使毛泽东向彭德怀推荐《“左派”幼稚病》的重要原因。

这里还需注意的另外一个情况是,毛泽东将《“左派”幼稚病》一书寄给彭德怀的前几个月,彭德怀正代表苏区中央同十九路军就反蒋抗日问题进行谈判。1933年9月中旬,蒋光鼐和蔡廷锴派陈公培携带一封写给毛泽东、朱德的亲笔信,表示愿意进行谈判,共同抗日。22日,彭德怀便在延平王台东方军司令部接见了十九路军代表陈公培,提出红军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这三个条件下,同十九路军共同抗日。随后,双方几经谈判,就反蒋抗日的条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并签订了共同作战的协定。显然,若联系彭德怀与十九路军就抗日反蒋进行谈判一事来看,便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何要向他推荐《“左派”幼稚病》一书。概而言之,这其中既有帮助他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考虑,主要是从理论上认清“左”倾思想的危害与实质,以及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思想的核心要义;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在党内“左”倾教

条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彭德怀能够通过对该书的阅读进一步观照中国革命的现实,深刻汲取“左派”共产党人由于不懂得与同盟者进行联合、不愿意同其他党派进行必要“妥协”而致使革命事业受到危害的经验教训,积极争取与十九路军的合作。

严格来说,20世纪30年代初期“左”倾临时中央在党内的统治地位,决定了毛泽东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是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效的。不过在中国这样革命形势相当成熟、敌人力量异常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开展革命斗争,革命者在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说到底还是秉持着效果决定论的原则。换句话说,在刀口下讨生活的革命者很容易从强弱胜负的变化中判断出真理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并且为了生存的需要而毫不犹豫地纠正错误^{[2]26}。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是,由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惨重失利以及在随后长征途中的大量伤亡,党内许多同志对临时中央已颇有微词,对“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亦有所反思。在这样的情况下,全面清算过去一段时期党内的“左”倾错误,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条件。正因如此,毛泽东便不失时机地发动了一场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借此肃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等思想痼疾,恢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指定《“左派”幼稚病》为整风运动的必读书目

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举措,是组织全党学习中央指定的必读书目,以期达到改造思想方法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事业的重要目的。在中央指定的众多材料中,毛泽东十分强调对《“左派”幼稚病》一书的阅读和学习。经由党内领袖的推介部署和各级单位的贯彻落实,该书成了延安整风期间全党理论学习的重要材料,并在改造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方法、开展反对三风斗争、认识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任务,首先是要在高级干部中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对此,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信中明确说道:“整风,主要是整高级干部(犯思想病最顽固的也是这些干部中的人)。”^{[3]424}为此,中共中央在“九月会议”召开期间,发布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高级

学习组的决定》，提出了在延安及外地各重要地点设立高级学习组的设想，并要求先花半年时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4]623}。此后，为进一步领导和规范高级组的理论学习活动，作为中央学习组组长的毛泽东和副组长的王稼祥多次就理论学习的方针、材料等问题作了指示。1941年9月29日，毛泽东和王稼祥在致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组的书信中要求，学习组的同志在理论学习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并指定了《“左派”幼稚病》一书作为学习材料^{[5]171}。11月1日，毛泽东和王稼祥向各地高级学习组组长、副组长发出函电，规定了各地高级学习组理论部分的研究材料。在指定的十个学习材料中，《“左派”幼稚病》赫然在列。11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通知各学习组成员，要求在当年12月底前读完《“左派”幼稚病》等材料，从第二年1月起进入深入学习阶段^{[3]337}。11月4日，毛泽东和王稼祥向各地高级学习组发出了：“关于本年内的学习任务及学习方法的通知，”主要内容：一是规定“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研究组第一步均以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与我党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为范围”；二是要求学习材料方面将《“左派”幼稚病》等文件通读一遍，从中“获得初步概念，以便在明春可进到深入研究阶段”^{[4]676}。在部署整风学习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将《“左派”幼稚病》列为党员干部的学习材料，此举不仅表明他对该书的重视程度，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左派”幼稚病》在改造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许多党内高级干部认真阅读了《“左派”幼稚病》一书，不仅深刻反省了自己在思想方法上所存在的错误，同时也对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等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这为开展全党范围内的普遍整风奠定了重要基础。

1942年2月1日和2月8日，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报告，这标志着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的正式开展。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要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良风气的斗争，以进一步整顿党员干部的思想方法与思想作风。

整顿三风的斗争，首先指向的是全党的理论教育问题。整风运动的准备时期，中共中央将各个根据地 and 国统区选出的“七大”代表，以及延安和陕甘

宁边区的一些领导干部，逐步集中至中央党校进行学习。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央党校的教学活动存在比较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当时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的张秀山后来回忆说，在整风运动前，中央党校的教学方法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很大，不少同志学了许多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却不注意领会其精神实质，不联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6]145}。有鉴于此，毛泽东在1942年2月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党校课程要改造。现在党校教中国古代史及西方史，离现实太远。应首先进行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教育，总课题为党的路线，研究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六大以来》。”^{[3]365-366}根据这一指示，中央党校随即着手进行课程改造的活动，确定了“教育内容将以辛亥革命至今的中国历史为基础，以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7]的基本方针。不仅如此，为了配合教学课程的改造，中央党校还通过请译书翻译讲背景、开设相关文化课照顾低水平同志、定期出版《学习报》等途径组织高级干部学习《“左派”幼稚病》等马列经典原著，进一步引导学员领会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8]218}。总的来看，根据毛泽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教育应当学习《“左派”幼稚病》的指示，中央党校在改造课程的过程中，以学习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为基本原则，并辅之以组织高级干部阅读《“左派”幼稚病》等马列经典文本，从而有效地纠正了以往教学中存在的教条主义等消极倾向。

随后，为了在全党范围内进一步开展整顿三风的斗争，1942年4月3日和4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后发布了《关于在延安研究讨论中央决定和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以及《关于增加整风学习材料及学习时间的通知》，至此便正式形成了整风运动必读的二十二个文件。尽管《“左派”幼稚病》并不在整风必读的二十二个文件之列，但在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这一学习材料中，则摘录有《“左派”幼稚病》第二章中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铁的纪律等论述。应该说，通过摘录《“左派”幼稚病》中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并将其作为整风运动的必读文件来组织全党学习，既有助于借鉴布尔什维克在党的

纪律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亦是因应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的重要举措。

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推动整顿三风斗争的进展,毛泽东还借助党的组织会议亲自讲解《“左派”幼稚病》的重要观点。1942年11月21日和23日两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逐一讲解了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在讲到第七条要善于把不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时,毛泽东特地引援了列宁的《“左派”幼稚病》来加以说明。他说:“列宁写了一本书,叫‘左派’幼稚病,就是讲的这个第七条。这里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和机动性的问题。”^{[3]413}此外,为了避免党内同志在这一问题上产生教条主义的理解,他还强调说:“不调和的革命性不要同冒险主义混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不要同迁就主义混淆。”^{[3]413}联系党的历史来看,“左”倾教条主义者的主要错误之一,便是不懂得如何将不调和的革命性与最大限度灵活性结合起来,否定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主张革命道路要笔直又笔直,最终致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重大的损失。将革命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这一原则,有助于增强理论的说服力,使其更容易为全党同志所接受。

及至整风运动的第三阶段,《“左派”幼稚病》仍是中央指定的必读材料。1943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决定此次学习的时间为半年,学习内容为《“左派”幼稚病》等六种课本,要求“学习要展开争论,提出中心问题,展开自我批评,要联系实际材料,要有历史观点”^{[3]484}。1943年12月31日,谢觉哉在日记中谈到了昨天在西北局讨论《“左派”幼稚病》的情况。他写道:“孩子气不懂事,敢于冒险,称里手,不知给了革命多大损失。我们不能原谅这些孩子们,因为他们闯祸太大又太多。”^{[9]560}若从12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关于学习要联系实际、要有历史观点这一标准来看,谢觉哉在日记中对《“左派”幼稚病》的学习和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反省无疑是深刻的。此外,各地赴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也积极参与了此次理论学习活动。例如,太行区代表赵武成称自己在1944年初学习了《“左派”幼稚病》等三本指定的书籍,学习时间虽然不长,“但这是前一段学习基础上的再学习,是总结性的学习,

因此收获很大”^{[10]670}。由此可见,通过对《“左派”幼稚病》的学习,党内高级干部在理论知识和思想方法上获得了显著的提升。

言及于此,有待进一步分析和说明的问题是:作为一部阐述马克思主义战略与策略思想的著作,为何《“左派”幼稚病》具有改造思想方法的功能?客观来说,思想方法的改造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是改造的路径却是灵活多样的,并不限于学习专门谈论思想方法的书籍。对于许多理论水平不高的党员而言,阅读《“左派”幼稚病》这类并非专门讲思想方法的书,可以从具体运用的典范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因此是学习思想方法的更好的途径。事实上,列宁批判“左派”幼稚病思潮最为用力、最为彻底之处,正是在思想方法的层面指出“左派”共产党人不善于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懂得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如何学习和运用俄国革命经验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些策略原则。就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来看,延安整风时期的思想方法问题,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鉴于党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的“左”的错误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重大挫折,因此通过学习列宁对“左派”幼稚病思潮的批判,从理论上进一步认清教条主义的实质和危害,以实现对党思想方法的改造,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三、借助《“左派”幼稚病》推进党的自身建设

由上可见,毛泽东对《“左派”幼稚病》的阅读及其在此基础上的推介部署,已形成一套相当成熟且特点鲜明的逻辑理路。延安整风运动结束之后,伴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和革命任务的转变,毛泽东在开展革命活动的过程中继续秉持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策略,或借助组织会议等重要场合对该书加以推介,或在科学研判革命形势的基础上对《“左派”幼稚病》的重要观点加以论析,以此为提高全党理论水平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等政治实践性活动提供文本支撑。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向全党提出了要读《“左派”幼稚病》等五本马列主义著作的任务^{[11]350}。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结论报告中谈及理论工作的问题时再次提出: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左派”幼稚病》等五本

书,“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那就很好,很有益处”^{[11]417}。那么,毛泽东为何要在中共七大上号召全党学习《“左派”幼稚病》一书呢?关于此点,从毛泽东在七大会议期间所发表的一系列报告、讲话中或可窥知一二。中共七大的主要任务是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从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建设新中国作准备。显然,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客观上需要对当时国内外的基本形势做出准确的判断。按照毛泽东的分析,在国际形势方面,尽管反民主的反动只是国际潮流中的一股逆流,但是旧世界的三大基本矛盾依然存在^{[12]1103}。就国内形势来看,由于抗战以来国民党和共产党采取了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因而中国人民实际上面临着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的选择:或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或是继续独裁统治,将中国重新拖回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富强的状态中去。基于这样的分析,毛泽东十分重视唤起党内同志和全国人民对内战危险的注意。他指出: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弹下,正进行着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12]1051}。毛泽东对抗战胜利前后国内外形势的分析表明,战争与革命在一定时期内仍是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在国民党可能挑起内战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这就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掌握好马克思主义关于战略和策略思想的理论武器,以便应对战后可能出现的复杂局势。因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推荐阅读的五本马列经典著作主要阐述的乃是阶级斗争、战略与策略等方面的问题。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不顾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强烈需求,单方面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这一系列举动证实了毛泽东对战后国内形势的预测。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党内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等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日渐成为人民解放战争走向胜利的障碍。联系党的历史来看,开展游击战争、建设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这对于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克服革命战争环境下的诸多困难和严峻考验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久而久之也产生了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倾向等问题。及至解放战争胜利

前夕,上述问题日渐突出,一度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关注。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于1948年4月21日在《“左派”幼稚病》一书的封面上写了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13]304}根据这一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48年6月1日发布了《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的通知,号召全党认真学习《“左派”幼稚病》第二章等材料,迅速地消灭现在工作中存在的某些严重的无政府或无纪律状态,以迎接和保持全国革命的胜利。

作为一部论述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思想的经典著作,《“左派”幼稚病》亦不乏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理论阐释,特别是在该书第二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中,列宁在总结布尔什维克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建立极严格的铁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基本条件之一的重要论断,为革命战争年代下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提供了借鉴和指导。显然,对于熟知布尔什维克历史的毛泽东来说,他十分清楚确保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性、组织性在中国这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当敏锐地察觉到党内工作中存在某些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时,毛泽东便立即号召党内同志阅读《“左派”幼稚病》第二章,以此来明白地方主义、分散主义等消极倾向的实质及其对中国革命可能产生的危害,进而在此基础上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此举充分说明,毛泽东确实从该书对布尔什维克政党建设的阐述中,获得了他本人认为极具启发意义的道理。

为了更好地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和筹划建立新中国的相关事宜,中共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在此次大会的总结讲话中,毛泽东再次提到了学习马列著作的问题。他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过去读书又没有一定的范围,现在积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左派”幼稚病》等十二本书。“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通读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14]261}如果说,中共七大指定阅读《“左派”幼稚病》一书主要为了应对抗战胜利后极有可能出

现的战争局面,学习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与策略问题的论述;那么此次对《“左派”幼稚病》的推介显然是为了更好地适合和肩负起毛泽东所提出的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光荣使命,因而理论学习的内容也更侧重于列宁关于党的建设、无产阶级专政和思想方法等问题的论述。

四、运用《“左派”幼稚病》开展防修反修斗争

新中国成立以来,《“左派”幼稚病》不仅是干部必读的马列经典文本,也是毛泽东外出考察时经常携带的书籍。及至1960年代初,中苏双方围绕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这次论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双方由以往的内部交换意见转变为公开争论,相互给对方扣上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帽子;论战的着眼点也不限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国家利益的冲突,而是扩大至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内部的纲领路线之争。论战的加剧使得两党的关系不断恶化,加之苏联借双方意识形态之争对中国施加了多方面的压力,这让毛泽东更加坚信苏联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配合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帮助全党同志进一步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提出了学习三十本马列著作的想法。

在这三十本书中,《“左派”幼稚病》仍赫然在列。论及个中缘由,结合中苏论战的大背景、防修反修战略考虑以及《“左派”幼稚病》文本内容的分析便不难得知。众所周知,《“左派”幼稚病》是列宁为揭露和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而写的。当时,欧洲的一些“左派”共产党人没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战略与策略思想,既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更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精髓,因而在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与策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表现出“左”的错误倾向和修正主义的面目。就“左派”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歪曲和背离而言,《“左派”幼稚病》可以说是列宁揭露和批判修正主义的一部重要论著。在这个意义上,认真领会列宁对“左派”幼稚病思潮的批判,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战略与策略思想和辩证法思想等论题的总结,对于增强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总的来说,此次高级干部对《“左派”幼稚病》等马列经

典著作的学习活动,归根到底是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纷争下的产物,不免带有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之嫌。邓小平后来在总结这场论战时曾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15]291}这不能不说是此次理论学习活动存在的偏差和需要认真反思与总结之处。

及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一系列复杂的主客观因素,上述文本阅读和推介过程中的偏差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主要是毛泽东对列宁关于小生产产生着资本主义这一观点作了教条主义式的解读。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的谈话中论及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意见。他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16]413}又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16]413}此外,他在谈话中还引用了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关于小生产经常产生着资本主义的论述,来说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人民日报》于翌年2月9日发表《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发布了毛泽东谈话的部分内容。此后不久,全国便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严格来讲,小生产产生着资本主义这个观点是列宁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作出的,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解读,才能更加贴近这一论断的真实意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的一些富农和投机商人在国内资源奇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还不是十分巩固的情况下,从事投机倒把活动、大量囤积物资,严重地威胁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对于这一现象,列宁是十分警惕的。为了充分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合理性,列宁在该书的第二章“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中指出,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和小生产的力量。这就是小生产经常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一论断的由来。可以看到,列宁在文中所说的小生产并不是泛指所有的小生产者,而是特指危害无产阶级专政、专门从事投机倒把活动的那一部分人;列宁对小生产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警惕,主要也是出于在苏维埃政权还不是十分巩固的情况下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考虑。就此而言,与其说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论

断,毋宁说这是列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俄国实际情况作出的具体结论。

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在社会历史条件方面已经大不相同。特别是在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小生产已经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商品交换也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所谓的小生产经常地和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的情况。事实上,就连毛泽东本人在20世纪60年代初也多次谈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的道理。此点恰恰表明,毛泽东对列宁当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所得出的结论做了教条化的解读,并以一种知识论的立场将这一论断不加分析地照搬到对中国小生产发展趋势的分析,最终导致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与主要矛盾做了错误估计。

五、结语

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进行科学的阐释和解读,以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重要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不论时代特征和具体国情如何发展变化,经典文本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发展和开拓创新的源头活水。自1930年代初期首次接触、阅读《“左派”幼稚病》以来,毛泽东在随后40余年的政治生涯中频繁联系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情况对该书进行研读、论析和推介,以求从中获取解决中国问题的经验参照、理论指导和方法启示,表现出了鲜明的政治实践性论析特征。就其历史作用而言,尽管毛泽东对《“左派”幼稚病》的阅读和推介在特定历史时期出现了偏差和失误,甚至在某个时期还违背了他历来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但总体而言,此举在推进党的理论学习、增强党的自身建设、统一党的思想认识等方面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效用,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重要支撑。及至当前,当我们立足新的时代条件和历史方位继续审视经典文本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时,仍有必要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高度出发,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政治领袖对经典文本的政治实践性阅读予以系统考察和理性研判,在积极建构科学的马列主义经典文本阅读观的

同时,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发展的新境界提供文本支撑和理论启迪。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 [2]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5]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6] 孙庆海.张秀山传[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 [7] 中央党校再度改组告竣 确定新教育计划[N].解放日报,1942-04-01(01).
- [8] 张明胜.延安博苑:第3辑[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 [9]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七大代表忆七大: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11]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1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14]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1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6] 廖盖隆,庄浦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木 杉)

(校 对:木 子)

列宁《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中的 监督思想及启示*

孙 茵

[摘要]《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是列宁晚年关于国家机关改革问题的一篇重要文章,阐述了建立一个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参与的,独立的、具有绝对权威性的监察委员会的实施方案。文中蕴含的党和国家权力监督思想与我国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权力监督体系的思路不谋而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列宁;权力监督;国家监察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3)01-0023-04

1921—1924年间,列宁为推进监察机关建设,从思想、组织、制度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努力和尝试。《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以下简称《改组》)就是列宁晚年关于国家机关改革问题的文章之一,是1923年1月23日列宁在卧病期间口授的、刊载于1923年1月25日《真理报》的著作。本文以《改组》为中心,结合列宁关于权力监督的相关论述剖析列宁党和国家权力监督思想及其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相关启示。

一、《改组》一文的历史背景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曾设想构建廉价政府,建立一个普遍吸收全部劳动者参与国家管理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由于该设想民主程度较高,公职人员可以通过选举产生。然而,当时苏俄国内人民文化水平普遍低下,尚未具备成熟社会主义的文明水平,加之作为资本主义包围圈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内外局势压力,造就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非常感”。在这种“非常感”的驱使下,布尔什维克党在制定计划和推行政策上选择了高度集中的政治决策机制,这也造成了党内民主和党内监察的缺乏,以及个人专断的出现。廉价政府被列宁戏称的“资产阶级的大杂烩”的国家机关所取代,权力机制实际由

俄共的命令制、委任制和实际领导人进行实施,俄共通过干部任免实现对国家机构各个部门的权力掌控。“这样一来,就成为最地道的‘寡头政治’了,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1]157}这种情况下,书记处成为了党内最重要的核心机构,总书记的地位与权力被大大提升。

虽然这种相对集权的国家权力机制是由苏俄面临的内外环境决定的,有利于政权成立初期时应对内外外部严峻的政治与经济形势。但对这种集权的权力架构带来的弊病,列宁也早有清醒的认知,甚至担忧。

一是,对于党内过度集权的担忧。由于当时苏联国内文明程度较低,列宁提出由布尔什维克党代广大人民群众行使权力,导致权力集中于党内,同时党的权力触角也延伸至各个政权机关、社会组织和群众性组织,通过在这些组织中建立党团,实现党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进而,权力集中在党内,党的权力又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再加上对党和国家权力监督的力量又非常薄弱,党的权力以及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在极度缺乏有效约束与制衡的情况下,出现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对于行政工作来讲,决

* [收稿日期] 2022-04-01

[作者简介] 孙茵,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300000。

策链条明显延伸,行政决策的效率非常低下。

二是,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的担忧。采用中央集权的命令制的工作方式,容易导致脱离群众,弱化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建设,同时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缺乏监督容易自我膨胀,滋生腐败,最终造成国家机构官僚主义化。列宁认为虽然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下,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在工作机制上施行个人集中负责制是一种必然,但同时也要去限制这种体制所引起的各种弊端。列宁曾多次提出,越是绝对强硬的政权,在一定时期内实行了独裁,就越要强化监督,用多种形式的监督手段,消除有可能存在的弊病。

三是,对党员干部贪婪腐化的担忧。缺乏约束的环境会导致人对权力的无限追求和利用权力为自己和关系人攫取利益。中央工农检察院主席古比雪夫曾指出,尽管当时苏联的经济形势较为严峻、不容乐观,但是苏维埃机关官员和企业家却仍然有着较大的数额支出。对此,当时许多苏俄代表也曾在1920年召开的苏俄九大上予以揭露,指责中央和地方经济干部腐败,并认为其恶劣程度并不逊色于老牌的资本家。

四是,对工农检察院工作的担忧。工农检察院是国家最高监察机关,工农检察院的工作是对各级党员以及领导干部进行监察。列宁认为工农检察院这个机关办得十分糟糕,对于监察党中央委员的职能,工农检察院并未发挥实际功能,可以称得上“没有胜任的能力”,只能成为中央委员的“附属品”,并在有些时候成了他们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的助手。工农检察院的人员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也堪忧。

五是,对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有可能会产生的分裂感到担忧。列宁认为党内有可能会产生分裂,一些白卫分子在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局中,将党内的分裂押为了赌注,对于这种分裂他们又把赌注押在党内主要的意见分歧上。列宁指出,如果党内出现问题,那么党就会有垮台的危险,而这种不稳定、分裂的风险主要来源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列宁还很清醒地认识到了,如果他逝世,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很有可能会有权力争斗,“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2]385}。这也就必然会导致党内严重斗争,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

二、《改组》一文中有关党和国家权力监督的主要思想

《改组》一文刊发时,列宁仍然在任苏联人民委

员会主席。因为受到刺杀,脊柱附近中弹,列宁于1922年5月、12月先后两次中风,身体右侧部分瘫痪,停止了主要政治活动。但重病没有阻止列宁深入思考一系列还没有解决好的尖锐问题,他在寻找国家机构改革的方案。通过梳理,将其主要思想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 建立中央监察委员会,构筑强有力的监察机关

列宁认为要建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将党的监察机关同苏维埃的监察机关合并起来。他认为,通过合并,一方面将会有大量政治素质强、业务能力高的成员加入进来,从而有效解决以工农检察院为代表的这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的“大难题”,工农检察院的威信因此得以强化。另一方面,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成为平行机构,大大增强中央监察委员会对中央委员会的监督效力。1922年《关于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目的》的决议,再次明确了监察委员会监督权独立性的根本原则;同年俄共(布)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也明确了监察委员会的权威性与独立性,说明了监察委员会和党的委员会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两者在组织上是平行关系;党的监察委员会具有独立行使参与权、检察权、质询权、罢免权等权力。与此同时,工农委员的增多,党的阶级基础的扩大,有利于打破党内的等级制度,“在中央委员会里纯粹个人因素和偶然情况的影响会减小,从而分裂的危险也会减小”^{[3]783}。列宁认为,这些举措“通过我国工农中的优秀分子同真正广大的群众联系起来”^{[4]378}使中央委员会与群众的联系更加的密切,同时保障了中央委员会的各项工作扎实、顺利开展。而且,中央监察委员会要有一定人数的委员参加政治局会议,强化了对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监督,使得党中央委员会能在准备政治局会议方面做出更严格的制度规定。但实际上,在当时的苏维埃政府,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独立性并没有完全确立起来,1922年俄共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了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决议要发生效力必须经过党的委员会同意,这就表明了监察委员会不是完全独立的存在,各级监察委员会依然要受限于党的委员会,这种尴尬的地位也造成了对党内“一把手”的监督的缺位。

(二) 注重对工人监察委员的选拔,构建素质过硬的队伍

当时的苏维埃监察机关工作人员人满为患且专业能力较为低下,工作效率不高。对此,列宁提出要积极拓展相关人才的来源渠道,增强权力监察机关的人员力量。列宁认为,新增加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应当是共产党员,这些工作人员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以及农民,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因此,列宁认为,一方面要重视政治考察。较高的政治素养是监察机关工作人员必备的政治素质,监察工作人员的选拔必须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确保选拔而来的人忠诚可靠。另一方面要突出业务能力。选拔的人才要具有真正的现代水平,不亚于那些西欧国家的优秀人才,是真正有现代化学问的人。列宁在他的续文中提到了对这种机关的工作人员素质的具体要求,一是要是一名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二是要是一名社会制度中的优秀分子,受过良好的教育;三是要为人真诚,不信空话、不说昧心话;四是要有不怕困难、不怕斗争的精神。为此要采取以下措施:第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草拟针对中央监察委员会候选人的考试大纲,再筹备成立一个专门的筹备委员会对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进行物色。第二,要对这些工作人员进行长期的培训教育,使他们掌握本领,能够胜任工作。第三,施行党员推荐机制,这些人员需要有几名共产党员进行推荐,同时还要通过国家机关一些基础知识的考试。严格选拔优秀人才的同时,列宁还要要求监察人员要强化学习,提升自身的业务素养和技能水平。

(三) 精简工农检察院机关人员编制,优化机关内部职能及功能

列宁认为党的监察委员会机关的工作人员应该由长期受党的培养,工作经验丰富,对党忠诚可靠的同志组成,对于当时工农检察院的情况,他提出要精简人员和机构,要冲破职员编制,对工农检察院的人员进行严格的审查,对不符合发展需要、专业能力较差的工作人员进行裁减,以提升监督质量和工作效率。与此同时,列宁认为要从工人和农民中择优选拔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这些被选拔出的工农监察委员也应当像一般的中央委员一样,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工农检察院的出现是社会主义国家纪检监察工作的重大改革创新。1919年4月3日,斯大林提出了重新修订和完善国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工作的相关法规条例的意见。之后,国家监察机关进行职能处室调整,并积极进行改革。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组建新的国家监察部,在旧的国家监察机关的基础上整合各个系统中具有监督职能的部门,强化监督力量,并由苏共总书记兼任国家监察部的最高领导。1920年,国家监察部正式更名为工农检查院,这是当时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大规模和最高级别的国家监察机构。

(四) 重视人民的监督力量,积极发挥人民对党和国家权力的监督

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也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作用。“哪里有千百万人,哪里才是政治的起点。”^{[5]13}列宁历来重视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不仅力主要建立中央监察委员会,还强调要积极发挥人民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实际效力,他认为,对于党员在政治舞台上进行的普遍意义的监督可以起到生物学上所谓“适者生存”的作用。通过公开、民主选举以及广泛主体的监督,能够保证党员承担与其能力相当的工作,并在认识到因为不合理使用职权等问题造成的错误后能够自省改正错误。在苏维埃政权下,工农两大阶级的合作基础是社会制度建立的根基,列宁认为要充分并真正的发挥人民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就要把国家监督与工农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在《改组》一文中,提出“我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这当然是大致的数字)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像一般中央委员一样,应该经过党的资格审查,因为他们也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2]422}苏共十大时,按照《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要求,进行了清党工作,非党员的无产阶级群众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积极揭露存在官僚做派、滥用职权、违法犯罪等问题的党员干部,这场清理,共计17万人被清理出党,约占当时党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大大纯洁了党的队伍。

三、列宁监督思想对我国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价值启示

列宁党和国家监察思想是人类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理论成果,特别是他晚年在《改组》一文中倡导的人民监督等思想与我国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权力监督体系的理念具有很高的逻辑契合性,对我国强化党和国家权力监督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强化纪委和监委的独立性

列宁认为,权力机关的权力的独立性是做好监督工作的必要前提。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

监督体制经历了从初期的双重领导体制到以本级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再发展到以上级为主的新模式,逐步呈现出相对分权化权力配置模式。党和国家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施行国家监察委员会与纪委监委合署办公,通过整合中纪委、监察部等多个监督主体,理顺了相互关系,进一步强化了纪检监察部门的独立性,但由于双重领导体制,纪检监察部门需接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检监察部门的共同领导,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同级监督的难题。需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持续深入探索强化纪检监察部门的独立性的有效方案,推动建立复合式权力结构,不断提升党和国家的权力监督和制约的有效性。在政策、决策等层面,优化分权式结构设计,要积极推动纪检监察部门的全方位、全过程参与;在执行层面,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通过集权式的结构设计提升集中力量干大事的能力;在监督层面,要持续优化监督力量的整合与运行,不断提升监察效能

(二) 高度重视“关键”“少数”

列宁在《改组》一文中表达了要加强对党内“关键”“少数”领导干部的监督思想。在我国,各级党政、部门“一把手”,责任最为重大、岗位最为重要,因此,监督理应更加强化。结合当下我国党和国家权力监督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建立完善的“一把手”监督监察机制。一是要建立起常态化的党风廉政教育机制,要强化党性培养机制,涵养党风廉政的政治氛围,引导党员干部逐步养成廉洁奉公的行动自觉。二是要继续健全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体系,对“一把手”的监督监察要有针对性、具体化的制度举措,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同时要“一把手”的问责机制进一步优化,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有罚。三是要拓宽监督渠道,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形式协调贯通,把党和国家机关监督与社会监督有机结合,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有机联动,构建强有力的监督体系。

(三) 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

列宁注重发挥和保证人民群众的监督主体地位,在《改组》一文中,提出要吸收工农参加监督工作,积极开展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对于我国监督体系来讲,目前基本形成了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多种监督形式相互贯通,协调发展的运行模式,从监督形式来讲,还要完善党外监督的优化机制,要充分发挥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的重要作

用,让“无所不在”的眼睛监督一切公权力,形成监督合力,保证人民群众的监督权的合理、合法行使。要增强监督的广泛性,还要优化党务公开、民众听证会等民主机制,让人民群众“看的见”,才能“监督到”。同时,对于纪检监察工作人员的监督,也要积极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优化监察工作的公开、透明机制,实现普通群众、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等党外力量对监督监察工作全过程、全要素的监督,破解监督机关自身监督难的问题,为党和国家打造过硬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四) 优化纪检监察机关干部队伍

列宁提出要将工农检察院打造成为模范机关,要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现阶段,我国依然存在着纪委和监察部门的财政保障、干部考核以同级党委为主,纪检监察部门对同级党委的依附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等问题,这也就导致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权的独立性还不够,监督能力难以得到最大规模的开发。因此,要加快解决好同级党委对同级纪检监察部门在人力、物力、财力的牵制,消除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顾虑。同时,要注重强化对纪检监察干部的队伍建设,一方面要完善纪检监察机关干部的选拔机制,真正选拔出作风硬、素质高、能力强的干部队伍。另一方要强化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教育培训,优化干部考核、晋升机制,提升从业人员的业务综合能力;尤其是要抓实政治素质培育工作,作为专职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干部,特别要培养他们抵制腐败及违纪违法分子利益侵蚀的自觉、自省能力,打造出政治过硬、对党绝对忠诚的干部队伍。

参考文献:

- [1]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3]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5] 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木杉)

(校对:江南)

延安时期党史学习教育的成功经验及启示*

叶美燕

[摘要]延安时期,党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党史学习教育。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学习党史、总结历史经验,既是一次历史知识学习,更是一次澄清党内路线是非、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全党思想的思想教育。回顾延安时期党史学习的基本情况,总结延安时期党史学习教育的成功经验,对我们今天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有着重要启示。

[关键词]延安时期;党史学习教育;成功经验;现实启示

[中图分类号]D231;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3)01-0027-07

中国共产党历来非常重视学习,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斗争经验。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时期。思想统一,才能步调一致向前进,反之,革命事业将有重蹈历史覆辙的危险。土地革命时期,曾接连发生过三次“左”倾错误,其中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时间最长、危害最大。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是没有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清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1937年王明回国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一大批领导干部深受他的影响,党内思想出现严重分歧。鉴于此,毛泽东适时领导全党开展了一次党史学习教育,通过学习、总结党的历史来清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以达到统一全党认识、树立正确思想政治路线的目的。

一、延安时期党史学习教育的基本情况

延安时期的党史学习始于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推进于1941年“九月会议”,贯穿于整个延安整风运动,终于六届七中全会。这次党史学习的主要

内容为学党的历史文件,学党史方法,学治病救人。

(一) 延安时期党史学习教育的基本历程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论新阶段》的报告,由此拉开了全党党史学习的序幕。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在扩大的六中全会之后开展一个全党干部学习运动,用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毛泽东依次提出了三项学习内容:学马列主义理论、学民族历史、学当前运动经验。会后,党内开始进行学习运动^①,其中党史学习是重要内容之一。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指出党内学习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缺点,许多人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报告中,毛泽东依次提出了三项学习内容:学习现状、学习历史、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从《论新阶段》到《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讲学习都是“三学”,一学理论,二学历史,三学现实运动经验,只是讲的次序上稍有不同。

1941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规定中央学习组的任务为“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

* [收稿日期] 2021-11-23

[作者简介] 叶美燕,博士,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430068。

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1]375}。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规定高级组“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到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2]623}。9月29日,毛泽东致信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再次明确:“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践联系为目的,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要目见另单)。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位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略——笔者注)。”^{[3]171}这一阶段,毛泽东明确要在党内同时进行理论学习和党史学习,并初步规定了学习的主要材料。之所以说是“初步”,是因为后来根据实际学习情况和进度,党中央对学习材料进行过调整。

后来,根据学习组成员们的革命经历和文化水平,中共中央对高级组进一步实施分组学习^{[4]203}。1941年11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率先确定了134人为政治学习组成员,参加思想学习方法组的名单当时还未审定提出^{[5]337}。11月25日,中央又发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②,决定把高级学习组成员分成政治组与理论组,政治组以研究政治实践为目的,理论组以研究政治理论与思想方法为目的。同时规定,政治组成员也符合理论组条件时,均可加入理论组,不符合者只能列席旁听,不编为理论组的正式组员^{[6]215-216}。党史学习属于政治学习组,重在学习和研究六大以来党的政治实践活动。这时候的党史学习,中央要求的是“通读”一遍党的历史文件,通读的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以便在明春可进到深入研究阶段”^{[5]337}。

在1942年春正式发起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在全党的高级干部中展开了中共党史学习研究。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专门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关于党史的学习从“通读”党的文件进入“研究”党的历史层面^{[5]370}。中央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党史学习是同步进行的,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践相联系,实际上两者也无法完全分割开来。但是党史研究要超前于理论研究,因为早在1941年11月便决定“关于思

想方法论的研究暂不进行”^{[6]15},对于中央学习组,毛泽东将重点放在中共党史的学习^{[4]203}。1942年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决定全党均应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7]326}。6月22日,毛泽东指出“目前学习以三风文件为主,党史之研究暂停止”^{[5]388}。在全党进入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后,党史学习研究不再单独进行。但是,党史学习始终融入于整风运动各个阶段,整风文件学习是与党的历史相联系的,整风中检查错误也是与党史相联系的。

1944年5月21日到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长达11个月之久的六届七中全会,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24年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彻底清算了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带来的危害,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党的历史经验做出系统总结,标志着整风运动胜利结束,全党党史学习最终达成一致的认识和结论。

(二) 延安时期党史学习教育的基本内容

延安时期的党史学习既是一次历史知识学习,更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学习党的历史文件,以明辨是非。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史学习研究相结合,以树立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在整风实践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实现“治病救人”。

学党的历史文件。1941年12月30日,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电周恩来:“中共党史的学习请先从讨论《六大以来》的文件入手。”^{[5]348}由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党内重要秘密文件汇集《六大以来》正式印制,这是前期整风运动中高级干部学习党史的主要材料。《六大以来》出版后,引起了广大党员研究党史的浓厚兴趣,很多党内同志提议从一大开始编撰一本六大以前的党史资料书。1942年春,毛泽东着手编辑《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10月,《六大以前》在延安出版,不过当时全党处于整风的紧张阶段,没有引起足够热烈的反响。1942年4月,毛泽东规定了整顿三风学习的二十二个文件,要求“一切干部学校凡能阅读文件者,暂行停止一切其他科目(军事学校则暂行减少军事科目),专门学习二十二个文件”^{[7]326}。二十二个文件既有“党史文件”,也有“理论知识”,但以中共领导人的著作为主,加强了对“现实材料”的重视。

1943年8月,毛泽东又着手选编《两条路线》的学习材料,这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且相对侧重于六大以后党的历史。10月,《两条路线》成书出版,这部书是后期整风运动高级干部学习研究党史的主要材料,是必读“党书”。整风运动开始后,党史学习融合于整风学习中,并开始进入总结现实运动经验层面。

学党史研究方法和态度。“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1]400}“古今中外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历史是一个整体,整体各部分、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毛泽东强调:“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1]399}这就是说,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相互联系,要把整个党的历史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二是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一切历史现象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研究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要放在当时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之下。具体到最难的人物评价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1]406}进一步说,研究党史要科学而客观、辩证而全面。三是研究中共党史要具备宏观视野,放在国内国际两个大背景下考察。但是时刻“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1]407},毛泽东反对和批评教条主义,强调“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1]408},也就是要有“创新”精神,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学“治病救人”。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并将其作为整风运动的宗旨。其基本含义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

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8]827-828}由于整风运动以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的历史为重点,因此所谓“以前的错误”,其实主要指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错误。在这一宗旨下,党内进行了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些党内领导干部,如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带头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诚恳做出自我批评。王明起初拒不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但后来也愿意检讨自己的错误。当然,批评的目的不是“整人”,而是救人和团结。在毛泽东的正确引领下,王明、博古等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中共七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二、延安时期党史学习教育的成功经验

(一)明确党史学习要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延安时期,树立正确思想路线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紧急任务。思想路线一旦混乱,革命的道路将举步维艰。从大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时期再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数次经历“左”“右”倾错误,其中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最为持久。为了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为了推进党和人民的事业,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统一全党于正确思想之下。毛泽东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认为有必要在党内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总而言之,清理王明路线的错误和影响,进而统一全党思想是这一时期开展党史学习的直接原因。

要认清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中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因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1]399}。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后,革命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数次生死存亡的考验。毛泽东认识到本质上是党内存在思想路线错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明辨是非的重要途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1]399}。学习研究党史有助于认清是非曲直,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1]400}。在延安整风中,将党史学习与整风运动相结合,就取得了良好的整风效果。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史上的错误思想路线得到全面清理,为召开中共七大做好

了思想准备,七大也因此能够成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二) 划分党史学习的重点内容

延安时期的党史学习,以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的党史为重点内容。194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着重研究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一段”^{[5]326}。延安整风期间,基本上也是围绕这一时间段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1944年3月,毛泽东还说明:“对抗战时期也许不在七大作结论。七大只作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的结论,这个结论应取得经验教训,要照顾以后,不重视惩办,只作政治结论,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5]499}1944年5月,中共决定召开七大,并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起草历史决议是为召开七大做准备,决议的形成经历了多次修改,一开始定名为《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可见这段历史的分量之重。后来,经毛泽东修改并敲定题目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案》。题目虽然发生变化,但是主体内容没有大的变化,仍然以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段历史为核心。

注重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党的历史,体现了辩证法上的两点论与重点论。延安时期党史学习内容广泛,毛泽东强调“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1]399},他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划分为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和抗日时期。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案对党的整个历史做了全面梳理,但是明显有所侧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认为,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存在一条“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深远而持久地影响着全党,而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的路线比较正确,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之前的错误。因此,毛泽东选择重点讨论党的“左”倾教条主义史。这种明确轻重缓急的处理方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

(三) 探索有效的学习方法

毛泽东提出了“钻”和“挤”的学习方法。延安时期,外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国民党多次反共运动,中国共产党时刻面临着生存挑战。在恶劣的自然生态和政治生态环境下,中国共产党经济上要搞生产建设,政治上要维护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学习

教育运动必然占用大量时间和精力。但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要领导中国革命必须要学习,因为中共干部队伍中“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1]178}。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两种学习方法。一是针对党员干部没有工夫学习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挤”的办法,用“挤”来对付忙: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建立了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制度,规定“在情况许可的地方或部门,一律坚持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度”,“一切为着在职干部教育而耗费的时间,均算入正规工作时间之内,把教育与学习看做工作的一部分”^{[7]150}。二是针对党员干部看不懂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钻”的办法,用“钻”来对付看不懂、难理解:我们要像仇人一样地进攻它,对于仇人我们是不讲感情的。当时党内干部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唯有孜孜不倦地钻研才能学有所成。在紧张的革命战争环境中,“钻”和“挤”方法的提出和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勤奋好学、奋发图强的精神品质。

(四) 实施领导干部带头学习

延安时期党史学习,以高级干部为党史学习的主体。革命事业依靠革命队伍,革命队伍依靠革命领导,干部作为革命事业的领导者,其素质直接关系到革命前途。毛泽东将学习本领比作“进货”,“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1]178-179}。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他们是革命的“舵手”,因此亟需提高他们的学习本领。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狠抓党内高级干部的学习运动,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确立正确思想路线的重要手段。1941年9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集中很大一部分精力领导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明确以高级干部为党史学习的主体。根据九月会议要求,随后成立了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延安及各地方成立了高级研究组(又称高级学习组),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高级学习组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干部,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全国以三百人为限,内延安占三分之一,外地占三分之一^{[2]623}。当然,重视高级干部学习不等同于忽视中

下级干部学习,延安时期各项学习是全党范围的。不过在党史学习上,毛泽东从现实情况出发,认为解决全党问题首先要解决领导层问题,“只要中央与高级干部是团结的,全党必能团结”^{[1]228},因此首要的是抓紧中央领导阶层和高级干部群体的党史学习。

三、延安时期党史学习教育的现实启示

在建党100周年之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有着重要意义。党史学习教育,不仅是历史教育,更是政治教育。延安时期的党史学习,对今天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 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

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要求我们分清主流和支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为践行初心使命而不懈奋斗,先后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斗,夺得了又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创造了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成就。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迈向强起来,中华民族正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胜利和成就,是历史发展中的主流。与此同时,根据唯物史观,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在活动过程中,成功经验和曲折教训都是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受时代和条件的限制,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犯过一些错误,但那只是历史发展中的支流,并不起决定性作用。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自我批评,能够及时纠正缺点错误,并牢记历史教训。

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要求我们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本质,并不是说否定历史上的曲折和错误,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长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以“解放思想”“学术自由”“还原历史”为名,抓住党历史上所走的弯路、错路,肆意丑化、抹黑、否定我党的历史。这种对历史的解读犹如“盲人摸象”,以所谓“新奇”吸引眼球,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危害。尤其是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部分国家对我国存在很深的误解和偏见,这些错误观点和思想很容易被别有用心者所利用,达到“乱阵

脚”的目的。习近平指出:“要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既不能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也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9]24-25}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义正词严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二) 明确党史学习的重点内容

学习党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早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我们今天讲的中国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体现于这两大纲领之中。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自觉担负起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9]15}党史学习教育,就是在了解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奋斗史中,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认识,牢记并践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即将党的初心使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提高全党的思想觉悟和行动自觉。

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严厉批评党内存在理论脱离实际、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现象。他反对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来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的实

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和行动指南。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学习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时代条件、实践历程、重要成果等,在学习党史的过程中加强政治认识、坚定理想信念、提高理论水平。

学习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历史。延安时期和新时代的两次党史学习,都通过中央全会做出了重要的“历史决议”,都有侧重性地对不同时期党的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为了影响人的思想和行动,最终要落脚于服务现实。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侧重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段历史,从此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则用较长篇幅阐述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也就是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和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0]70-71}。

(三) 提升党史学习教育的效果

指定党史学习教材。百年党史,各类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指定党史学习教材有助于找到发力方向。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三个历史决议都处于党历史上重大历史关头,对不同时期党的历史经验做出了系统总结,始终是我们学习研究党史的基本遵循。这次党中央为了

组织好党史学习教育,出版印行了四本指定学习材料和四本重要参考材料,需要重点学习的是习近平同志《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中国共产党简史》,以求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各地按照中央要求,以党史学习为重点,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并结合地方党史特色,利用好地方党史研究成果,开展“接地气”的党史学习教育。

创新党史学习方法。延安时期的党史学习方法是“挤”和“钻”,这一方法至今仍然适用。同时,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知识水平、认知特点、学习方式等都发生了变化。党史学习教育也必须与时俱进,适应于时代发展的要求。今天的党史学习教育,可以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学习报告、学习研讨、知识竞赛等多种灵活形式,保质保量地完成学习任务。习近平指出:“要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注意为基层减负。要防止为完成任务应付了事,出现‘人在心不在’等现象,防止照本宣科,防止为了博眼球信口开河。要防止肤浅化和碎片化,学党史讲党史不能停留在讲故事、听故事层面,而要通过讲故事引导广大党员加深对党的历史理解和把握,加深对党的理论理解和认识。”^{[9]27}要做好党史学习教育其实并不容易,各级党委领导人需要用心用力,发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真正效果。

(四) 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的时代要求

党史学习的重点对象一是党员二是青年。经过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仅有50多人的党发展为拥有最多党员的世界最大政党。任何时期,加强党史学习教育,都是坚定党员理想信念,提高党员干部领导水平的重要途径。不同于延安时期的以高级干部为重心,这次党史学习教育覆盖各级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无论是党的高级干部,还是党的基层干部,亦或是普通党员,都同样重视和强化党史学习教育,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实干经验和智慧。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

传承。”^{[9]26}作为时代发展中的主力军,青年更应该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勇于担当时代责任。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学”从来都是为了“用”,但各个时期“用”的重点不同。这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延安时期学党史主要解决党内路线是非,重点清算六届四中全会和遵义会议时期王明“左”倾路线错误不同。这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主要是进一步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成果,铭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道理,进一步领悟、传承、坚守和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党中央还为此专门下发了文件,要求全党各地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立足本职岗位为群众办实事外,还要从最困难的群众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切实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事。也就是说,党史学习教育的主要成效,必须体现在“践行初心使命”上。

党史学习永远在路上!“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11]67}重视党史学习教育,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史学习教育,形成了关于党的历史的系列重要论述。党史学习教育不是一时之事,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应该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来推进。

注释:

- ① 1939年5月2日,《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对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学习运动做了初步总结,并动员全党要坚持深入推进学习运动。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报告,称:“六中全会以后中央发起的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对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所以说,延安时期的学习运动确实以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为起点。
- ② 《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规定,加入政治组必须同时满足四项条件:(1)以现任及曾任区党委以上,军队中旅级以上,及相当于这一级的各种工作干部为基础选择组员。(2)党龄一般须在抗战前入党,个别的可以在抗战后入党。(3)文化水平须确能阅读并理解党的历史

文件,文化及理解力低者不应列入。(4)确能遵守组织纪律,未经允许,不得将学习会中涉及党内秘密的争论或结论向外宣布。加入理论组的条件是:(1)以各种工作干部中之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与理论修养,确能阅读并理解《哲学选辑》等书者方为合格。(2)党龄不加限制。同时规定,政治组成员若同时满足以上条件,可以加入理论组成为正式成员,否则只能旁听。

- ③ 讨论并通过《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本来是七大的议事日程。毛泽东认为,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的眼睛应该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因此,在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该决议,这为开好七大做好了重要准备。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3] 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4]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5]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6] 文献和研究(一九八四年汇编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7]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
- [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10]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1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成虎)

(校对:江南)

李富春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农业发展的实践及经验启示^{*}

李梦玥 赵美玲

[摘要]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发展农业是陕甘宁边区人民摆脱生存危机的必然选择。李富春在领导边区经济工作时,坚持把农业放在首位,带领广大军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实践,具体举措有:积极鼓励动员,进行宣传教育;推行开荒种地,改进耕作方法;奖励劳动模范,支持生产竞赛等。总体来看,他在边区发展农业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可概括为:发展农业须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发展农业要采取科学的技术方法;发展农业应发挥榜样的带头作用。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农业发展的实践和经验,对推动当今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关键词]李富春;陕甘宁边区;农业发展;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3)01-0034-07

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农业发展,“农业是贯穿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全过程的重要问题”^[1]。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根据地,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便是发展农业生产,保障根据地军民的基本生活所需。李富春作为陕甘宁边区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亲自领导了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生产运动,为边区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杰出领导者。他不辞辛劳、顽强探索,带领边区民众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建立起了“革命家务的基础”,使陕甘宁边区从贫瘠荒芜发展为富饶秀丽的“陕北的好江南”。

一、李富春领导边区农业发展的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时期,发展农业是筑牢边区经济根基的重要途径,是化解边区粮食危机的必然选择。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落后的农业技术和严酷的政治环境等多重挑战,李富春作为陕甘宁边区经济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毅然承担起领导边区农业发展的重

任,带领边区军民不懈奋斗,使农业生产运动取得了辉煌成绩,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陕甘宁边区发展农业的必要性

发展农业是筑牢边区经济根基的重要途径。陕甘宁边区经济素不发达,近代以来因频繁的战乱而变得更加脆弱。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边区没有现代工业,手工业规模也仅限于私人作坊。囿于长期贫困,商业也难以大规模发展。在这种极端落后的条件下,农业成为边区人民赖以生存的命脉,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制定边区的经济政策,必须从革命与战争的实际出发,必须把握边区经济的基本特点。这一时期,发展农业,不仅能够改善人民生活,保证广大军民的基本需要,而且能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壮大提供动力。因而,边区政府将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毛泽东也曾多次论及农业的重要地位,强调巩固经济基础“应确定农业为第一位”^{[2][3]}。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只有首先保证农业的

* [收稿日期] 2021-11-23

[作者简介] 李梦玥,郑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450010;赵美玲,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特邀研究员,300350。

顺利发展,才能够筑牢边区经济根基,从而为抗日战争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发展农业是化解边区粮食危机的必然选择。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边区政府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追求进步的有志之士和爱国青年,纷纷把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将延安视为民主革命的圣地。从1937年起,就有许多爱国青年、国内外记者团相继奔赴延安。他们的到来为边区建设储备了优秀人才,但同时也导致陕甘宁边区政府各个机关需要财政供养的人员进一步增多。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陕甘宁边区脱产人员仅有14000余人,而到了1941年则高达73117余人,占到了边区总人口的5.37%^{[3]230}。这些非生产性人员的增加,加重了边区政府在财政方面的困难,造成了边区粮食紧缺的局面。这时边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亟需大规模地发展农业,以解决粮食问题。

(二) 边区发展农业面临的现实问题

恶劣的自然条件。陕甘宁边区位于我国西北部的黄土高原,有着特点鲜明的地形、土壤和气候。边区地形复杂,主要包括“塬地”“山地”和“川地”三大类。其中,“塬地”已经属于半沙漠高原性质,一眼望过去看似平坦,但实际上却沟壑纵横,被许多深沟所切割;“山地”是边区最为常见的,由黄土高原常年冲蚀而形成;“川地”是被山峦之间的河流所冲积出的平地,这些平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原,往往窄而长,但因其地势较为平坦,且可以引河水灌溉田地,所以成了主要的农业区。边区土壤多为黄土,也有红黏土、石灰结核红土及各种冲积土。边区地处内陆,远离海洋,总体上为高原大陆性气候,还兼有山岭性和沙漠性的气候特征,年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干燥寒冷,温差变化大。总之,这种恶劣的自然条件制约着边区农业的发展,给初到陕北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极大的生存挑战。

落后的农业技术。一方面,边区的生产工具较为原始。生产工具是衡量一个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边区农户在从事农业劳动时,使用的都是较为原始、简单的工具,如镢头、锄、镰刀等。但是,很多贫苦的家庭连这些最为常见的工具都难以配备。这就导致他们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农业生产常常是广种薄收,即使农民再为勤劳也无法弥

补工具上的落后。另一方面,边区的耕作技术也较为落后。陕甘宁边区虽然农业历史悠久,但其一直以来的耕作技术都是以粗放型为主。为了防御频发的自然灾害,并恢复地力,边区农民主要采用间作和轮作的方法。施肥是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然而在边区的农业生产中,肥料十分稀缺。在地广人稀的地方,农民播种时甚至不施任何肥料。此外,边区一些地方在给农作物播种之后,没有给作物锄草、松土的习惯,除了收割,很少会有其他的管理措施,这也导致边区粮食亩产量很低。

严酷的政治环境。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目,他们开始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先后在陕甘宁边区附近修建了五道封锁线,北线两道,南线三道,并派驻二十多万人的军队防守。此外,国民党还收买、培植了一些土匪势力,他们以破坏边区为目的,经常在边区交界处活动,有时还进入边区内进行袭扰,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严重地扰乱了边区的社会治安。除了采取武装进攻,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还对边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停发八路军军饷,私扣海外华侨及后方进步人士给共产党的一切援助,禁止边区生产的产品向外输出。国民党的一系列恶劣行径给边区的发展,尤其是边区以外援为主的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面对这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首先发展农业,以壮大边区经济实力,与外部势力作斗争。

(三) 李富春在边区农业发展中勇挑重担

抗日战争时期,李富春曾先后担任陕甘宁省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秘书长。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封锁,造成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经济上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上的困难严重影响到各方面工作的正常开展。针对当时所面临的各种难题,中共中央提出“我们应以最大的努力,来克服前进中的任何障碍,增加新的力量”^{[4]82},努力发展边区经济,以克服财政困难。在这一情况下,李富春同志服从全党工作的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在负责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同时,又肩负起领导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重担。1938年底,中央成立了由李富春牵头,叶季壮、曹菊如、高自立、李六如、刘景苑等组成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随后,又成立了中央财政经济部,林伯渠担

任部长,李富春担任副部长^[5]²³⁰。因为林伯渠常常在西安开展工作,无暇顾及中央财经部的事务,所以实际上是由李富春在做中央财经部的大部分工作,具体指导边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使边区面临的经济困难愈加严峻。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向全党发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号召。之后,为解决和改善边区军队及人民穿衣吃饭的基本问题,他又提出了要依靠生产运动的主张。作为边区经济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李富春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的相关号召与主张。他认为要克服物质困难,为长期抗战提供物质支持的最好办法就是进行广泛的生产运动。基于边区的实际情况,他进一步提出发展生产运动应当把农业作为中心一环。边区政府为了有序推进生产运动的开展,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委员会,林伯渠担任主任,李富春担任副主任,由于主任林伯渠身为边区政府主席所承担的事务繁杂,精力有限,因而生产运动委员会的许多具体工作都是在李富春的领导下开展的。李富春凭借不怕吃苦的劲头和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推动了边区农业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逐步奠定了其在农业生产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边区民众的一致认可,毛主席也曾号召“中央机关干部都要像李富春一样学会做经济工作”^[6]⁴²。

二、李富春在边区领导农业发展的具体实践

李富春在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工作期间,坚决拥护并贯彻中共中央的各项政策,强调要将农业作为边区经济工作的中心一环。为了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他在领导农业生产的过程中,积极鼓励动员,进行宣传教育;推行开荒种地,改进耕作方法;奖励劳动模范,支持生产竞赛。这一系列举措取得了显著成绩,李富春也为边区的经济发展贡献了个人智慧与力量。

(一) 积极鼓励动员,进行宣传教育

开展农业生产动员,激发人民生产热情。1937年,中国共产党发表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提出了要“发起全国人民的总动员”。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李富春在会上作了《加紧生产 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在全边区党政军各机关各学校所有脱离生产的部队机关学校大概有五万人;把这五万人

集体的组织起来,这一个生动的力量是很大的”^[7]。此时,边区的生产动员主要是面向党政军各机关各学校,所开展的生产运动规模有限。由于连年的自然灾害,加之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边区的农业生产不能很好地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中共中央意识到农业生产运动不能仅限于军队和各机关,应当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激发他们的劳动热忱。“于是便决定把边区部队以改善生活为目的的局部性的农副业生产,发展为整个边区的以逐步实现经济自给为目的的生产运动。”^[8]²⁷⁶李富春作为生产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更是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深入基层,对各机关各部队各学校各民众团体进行耐心的动员与说服,鼓励他们为增加农产品而斗争。在他的积极号召之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人民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男女老少都争先加入农业生产之中。

进行宣传教育,普及农业发展的重要性。除了在各大会议上对党政军民学进行动员号召之外,李富春还充分运用多种形式的宣传工具,如报纸、诗歌、戏剧等,对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的目的,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他认为在边区大力发展农业的目的在于:第一,解决粮食问题,改善生活境况。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是边区在大生产运动中应当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要解决所面临的经济困局,就必须敢于与恶劣的自然条件作斗争,与想要破坏边区生产的敌人作斗争,大力发展农业。农业发展起来了,边区人民的生活境遇也可以得到改善。第二,坚定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在生产运动中,不仅要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还要通过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提高边区民众的政治觉悟,使他们能够更加自觉地团结到边区政府周围;更要用显著的成绩,向全国人民证明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正确性,证明我们党是有能力团结与组织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从而提高各阶层人民对于最终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为了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质量,他还对边区人民进行生产教育。他认为边区作为落后的农业区,需要对民众进行生产教育,使他们掌握正确的生产办法,这样才能够实现“以少的劳动得到多的收获的结果”。在农业生产实践中所取得的累累硕果,证实了李富春等共产党人进行宣传教育的绝对正确性。

（二）推行开荒种地，改进耕作方法

推行开荒种地，扩大边区耕地面积。面对边区耕地上的困难，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1939年3月，李富春根据这一安排，向各机关、学校、部队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他们每天下午停止办公，出动全体人员进行开荒种地。为了推动这一任务的有序开展，他带领财经部按照各单位的人数、劳动等级分配了具体的开荒数量，并在延安附近的荒地上划分了开垦区域，打响了边区农业生产运动的“第一个战斗”。在这场战斗中，李富春率先垂范，自觉执行不迟到早退、不损坏工具和听从指挥的三大劳动纪律，领导各机关人员顺利地完成了开荒突击的任务，也在民众中掀起了开垦荒地的热潮，使得开荒成了普遍的运动。在边区“日夜都有动人的景象，黎明时分，成群结队的人们，已荷锄抗镢上山了，登高一望，到处都是挥汗如雨的垦荒者。夜晚，一孔孔窑洞的灯火却亮了起来，万家灯火与点点繁星交相辉映”^{[9]104}。在李富春的带领下，开荒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原定计划本是开荒60万亩，在1939年进行生产总结时，边区民众实际上却完成了105万亩^[10]，大大超过了原定计划数。

改进耕作方法，提高边区生产技术。在陕甘宁边区，除了绥德分区的耕作方法较好一些外，其他地区的耕作方法均是粗放型，效率低下，粮食收成不高。在完成开垦荒地的任务之后，边区的土地得到充分开发，耕地面积已经扩大不少。这时，要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产量，就需要开始改良边区农民的耕作方法。毛泽东在总结了抗战以来边区农业生产取得的成绩与不足之后，提出的农业发展的八项基本政策中，就包含着提高农业技术。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在实地考察了边区各地农业生产的情况之后，提出“在边区目前条件下，改良农作法的问题，不仅成为必要，而且已是完全可能的了”^{[11]551}。为了较快地改进边区耕作技术，李富春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操作方法，主要包括深耕、施肥、除草这三项具体措施。其中，施肥是边区政府极为重视的一项措施。针对边区存在的肥料不足问题，陈云、李富春及中组部的其他同志们带头四处搜集肥料。当时，一些在延安访问的外国记者们看到这一景象，都感到十分惊奇，赞叹不已。在李富春多施肥的号召

下，边区各地广泛开展了积肥运动，增产了不少细粮。总之，通过改进耕作方法，边区的农业生产焕发出新气象，取得了更大的成绩。

（三）奖励劳动模范，支持生产竞赛

奖励与表扬劳动突出的组织与个人。发展农业是为了人民，具体的生产办法是由人民群众在实际工作中创造出来的，对这些办法进行总结提炼，目的是将宝贵经验推广到群众中去。劳模运动就是其中一个鲜活的例子，也是我们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路线的具体表现。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生产运动奖励条约》，规定：“凡参加生产运动的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单位或个人，成绩优异者，均可受到奖励”^{[12]161}。李富春积极践行边区政府这一政策，十分重视奖励生产中的劳动模范，他认为有计划有组织地去发现、培养模范工作者与劳动英雄，是发扬革命队伍中每个人的一技之长、每个人的创造性，把各方面工作推向前进的重要办法。为了进一步规范劳动模范的选拔，他提倡制定更加完备的劳动奖励制度。在李富春的推动下，边区政府又颁布了《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及其代表选举办法》等文件，规范了劳动模范的选举过程。随着劳模运动的持续推进，民众的生产潜力得到了极大激发。在1945年召开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到会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共有476名，还有500多名来宾及旁听者参加了会议^{[12]379}，充分反映了劳模运动在边区产生的较大影响力。

支持生产竞赛，推动农业发展。在生产奖励制度的刺激之下，边区涌现出不少中国版的“斯达汉诺夫”，在农业生产中就发现了吴满有这样的模范人物。1942年，《解放日报》刊登了关于模范农民吴满有的报道之后，各抗日根据地都掀起了学习吴满有的热潮。安塞县的劳动模范杨朝臣主动给吴满有写信，提出要与他开展劳动竞赛，并定下了生产目标。边区政府得知这件事后，将劳动竞赛这一形式推广到各部队、机关与学校中，要求每个人都积极参与。随着生产竞赛在边区的不断发展，李富春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组织起来”的号召，提出应当把这种生产竞赛变成群众性的运动，要由个人之间的生产竞赛，发展为机关之间、工厂之间的比赛，以吸引更多参与。在他的积极倡导之下，中央秘书处、宣传部、组织部等多个部门都主动签订了劳动条约，开

展劳动竞赛,在边区掀起了一股农业性生产竞赛的热潮。此后,边区举行的生产展览会,进一步刺激和鼓舞了广大民众的生产热情,把生产竞赛推向了高潮。生产竞赛的实行,推动大生产运动向纵深发展,使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极大地促进了边区农业的发展。

三、李富春在边区领导农业发展的经验启示

李富春在边区领导广大军民进行的农业生产运动,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解决了边区的经济困难,而且保障了长期抗战的物质需要,成为边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领导农业发展时,他十分注重发挥思想动员、科学指导与物质激励的作用,这些对于当今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来说,依然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一) 思想动员:发展农业须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

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具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农业是民之根本,关系到广大民众的基本需求,要发展农业,就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领导边区发展农业的具体实践中,李富春同志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注重对军民进行思想动员工作,使人民对农业生产的热情空前高涨,在农业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对民众进行思想动员时,也要讲究一定的方式方法,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坚持利益引导的原则。“追求和实现一定的利益是人们进行社会实践的根本目的。”^[13]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边区民众最基本的诉求就是吃饱穿暖。李富春在领导边区农业发展时,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4]⁶⁴⁹的指示。他在代表中共中央对边区民众进行思想动员时,明确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生产是为了更进一步地改善边区民众的生活。因而,他所开展的思想动员工作,才能够充分调动起人民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我们党的思想动员工作能够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也是我们在新时代激发人民群众积极性应坚持的重要原则。因而,针对当前一些地区出现的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我们可以积极开展动员,并加大种粮补贴、奖励力度,让

农民种粮有利可图;同时,也要健全保障机制,确保各项补贴政策落地生根,确保补贴资金落实到农民个人,以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只有坚持利益引导,紧扣人民利益开展的思想动员,才能产生强大的力量,实现动员的目标,才能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坚持动员方式的多样性。李富春在边区发展农业的实践中,除了进行详细的解释工作与耐心的说服工作,还积极运用多种载体(如报纸、诗歌、戏剧等)对人民进行思想动员,这也是这一时期的动员工作能够取得显著效果的有效途径。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传统动员方式的影响力在不断下降,因而我们必须根据时代要求,创新思想动员方式。首先,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以新媒体技术为载体,开发新型动员方式,使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其次,要探索“党建+乡村能人”的思想动员模式。这种模式是由各地区村内具有一定威望、在农业生产中取得了一定成就的能人,以党建为抓手,在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同时,依靠自身人格魅力,来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农业生产。此外,当前要实现我国农业的新发展,必须意识到,对人民开展思想动员工作,不仅要让他们意识到农业的重要性,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重要的是应引导民众树立革新意识,勇于探索农业发展的新路子。

(二) 科学指导:发展农业要采取科学的技术方法

科学技术与农业生产实践相结合,有利于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虽然,当时边区的技术水平较为落后,但李富春认识到“在经济建设中,需要自然科学界帮助提高的方面是很多的,诸如农业、畜牧业、工业、运输业、盐业及改善生活等等许多实际问题,无不需自然科学的指导,无不需技术来解决”^[15]³⁰。在农业生产中,他克服各种困难,坚持改良边区农业耕作方法。经过不懈探索,他带领民众提高了边区农业的耕作水平,为农业生产实现质的飞跃提供了可能。

科技的发展应符合现实需要。边区所发展的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这些科学技术是为抗战、为解决现实问题而服务的,是和边区的生产实践紧密相连的。具体而言,在农业生产中,边区

科技的发展,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农作技术,使农业生产实现了质的飞跃。在现代社会,我国农业要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科学技术的助推。科学技术不是经院式的学问,研究新的科学技术不能脱离农业发展的实际,而是应当坚持需求导向,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据统计,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每年走向市场转化为产品的比率不超过50%,能达到规模应用的则不到30%^[16]。这说明我国农业科技成果与农业的现实需求结合不够紧密。要改变这一状况,首先,应当深入田间地头,进行广泛调研。唯有秉持务实精神,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才能了解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状况,才能研究出符合当前农业发展需要的科技成果。其次,要建立起健全的反馈机制。派驻技术专员驻村跟进科技成果的应用情况,及时反馈并调整应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方能真正发挥科技成果的作用,有效推动农业发展。

坚持自力更生地发展科学技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边区的一切发展都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以李富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先垂范,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边区农业,经过不懈努力,探索出了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有效措施。新时代,我们依然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农业,不断创新农业生产技术。因为“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经济社会发展打造新引擎”^{[17][21]}。在全球经济增长充满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坚持自力更生地发展科学技术,以先进技术助推现代农业的发展。首先,要完善政策保障体系。实现农业科学技术自立自强,必须依靠坚实的政策保障。应当积极制定有利于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各项政策,在政策与制度方面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其次,要着力培育高素质的农业科技人才。加快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实施更加全面的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方案,培育一批实践能力强的青年创新人才;构建立体化引才模式,加大对于农业科技人才的支持力度,配套保障机制,充分激发青年人才创造活力,提升我国农业科技竞争力。

(三) 模范激励:发展农业应发挥榜样的带头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注意培养劳动英雄,使之成为新的群众领袖。如果没有千百个群众公认的劳动英雄,想要把生产组织起来,是不可能的”^{[18][21]}。李富春在边区带领军民发展农业生产时,注重培养典型,充分发挥榜样的模范带头作用,以教育、激励大多数人。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劳模运动,不仅激发了人民的生产热情,而且在其他建设方面也发挥了显著作用。当今社会,我们要正确发挥榜样的作用,就需要选举出真正被人民群众所认可的先进典型。

创新劳动模范的选拔形式。除了在实践中挖掘劳动模范,还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选拔形式来发现更多的典型。李富春在边区农业生产中积极推行的生产竞赛,是发现劳动模范的创新形式。生产竞赛运动的开展,涌现出了一批新的劳动英雄,也将边区的农业生产推向高潮。边区生产竞赛的顺利推进,关键在于其形式的新颖和计划的详细。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也应当结合时代发展变化及农业生产的现实需求,不断创新劳动模范的选拔形式。一是要不断创新劳模评比形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劳动模范评选标准比以往更加丰富,我们也应当随之不断创新评比形式,采取线上投票与实地走访相结合、组织推荐与个人申报相结合等方式,发现农业生产中的先进典型。二是要制定好详细的评比细则,以确保选拔过程的公平公正。无论采取何种评比形式,都必须确保程序的规范与透明,因为只有经过严格公开的审查才能选出群众广泛认可的模范,才能真正发挥劳动模范的作用。

注重对劳动模范的宣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利用劳动模范的示范效应,能够给广大的群众以实际的鼓励和刺激。良好的宣传工作,对于发扬劳模精神可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选出劳动模范之后,李富春坚决支持中央机关通过报纸、戏剧、开大会、举办展览会等形式,对这些劳模进行广泛的宣传,将他们打造成了一本本立体的教科书,在边区民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和国的功臣”^{[19][2]},新时代依然要高度重视对劳动模范的宣传,发挥劳动模范在农业生产中的带头作用。一方面,要借助现代化的宣传手段。利用网络新媒体平台、主流报纸等,对先进典型进行直接有效的宣传,以劳模精神的先进性熏

陶人民群众,以情感人,让榜样的力量深入人心,从而激励人们不断向着争当劳动模范的目标迈进,将见贤思齐逐渐发展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另一方面,要搭建发挥劳模作用的平台。通过设立劳模创新工作室、劳模师带徒、劳模一帮一等活动,让劳动模范得以在实践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以实际行动带动广大民众投身于现代化农业生产中。

李富春在陕甘宁边区带领广大军民进行的农业生产实践,将农村经济发展与抗战大业相融合。他通过思想动员的办法,将边区人民有效地组织到农业生产中,以开荒种地、改良耕作方法、奖励劳动模范、开展生产竞赛等一系列有效途径,重塑了边区的农业生产方式,改变了人民的传统观念,在边区树立起了劳动光荣的理念。边区农业的发展,既改善了陕北人民的生活,满足了他们的基本诉求,又给抗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历史是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兴衰更替的真实记录,是最好的营养剂。以史为鉴,汲取当时的经验教训并运用到目前的农业发展中,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独特视角,有益于我们推动农业发展恒久不衰,对于破解农业发展难题,稳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戚振宇,李金叶. 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思想的百年演进、逻辑脉络与原创性贡献[J]. 学习与探索,2021(6):98-105.
- [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王东方. 中国革命的延安之路[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4]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2辑[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
- [5] 房维中,金冲及. 李富春传[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 [6] 利广安等. 纪念李富春[M].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0.
- [7] 李富春. 加紧生产,坚持抗战[J]. 解放,1939(65):8-13.
- [8]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延安时期大事记述[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 [9] 刘东社,刘金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史话[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10] 李富春. 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初步总结[J]. 解放,1939(85):7-9.
- [11]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农业[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 [12]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延安时期大事记述[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 [13] 甘泉. 略论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的基本经验[J]. 江汉论坛,2013(10):90-93.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5] 李富春. 李富春选集[M].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
- [16] 毛长青,许鹤瀛,韩喜平,等. 推进种业振兴行动的意义、挑战与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2021(12):137-143.
- [17]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18] 山西省档案馆编. 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7卷[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 [19] 习近平. 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责任编辑:成虎)

(校对:木子)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功能优化与实现机制*

张继军 王 潇

[摘要]基层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也离不开党建质量的提高。多元化的基层治理特征,决定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属性,也决定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功能特性。从多层面、多角度来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以系统性功能回应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功能结构,进而优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区域一体-主体觉醒-组织协同-精神培育-资源整合”功能体系,切实破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嵌入-悬浮”困局,科学构建“核心领导-权责配置-能力发展-合作运转-责任追溯”的实现机制,整体性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高质量发展,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关键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功能优化;实现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3)01-0041-06

一、问题提出

基层社会是人民群众相互交流、彼此互动的日常场域,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而基层政权的巩固和基层秩序的维护更是关乎人民群众的美好幸福生活,同时,人民群众的社会关系网络也都基本发生在基层社会之中。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和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人民群众的美满幸福。面对社会结构的转型,必须创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发展方式,以适应基层治理的结构变迁和时代变迁。尤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党建既可以作为把握党的大方向的政治力量,又需要成为承担社会治理的专业力量^[1]。立足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具体实效更成为基层党组织的重要目标和重要内容^[2]。然而,伴随基层治理难度的增加,加之民众多元化利益需要,促成良性社会治理仍面临重重压

力^[3]。换言之,要紧紧围绕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新要求,严格落实党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领导地位。

从唯物辩证法看,党建与基层治理之间是辩证的关系,党建保障了基层治理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大局,能够有效整合基层社会中的治理主体、治理制度、治理机制和治理资源等关键要素,使基层治理中多元要素得以聚合起来、协同起来、运转起来,切实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更大效能。同样,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也变成党建的重要目标,基层治理也成为检验党建质量的关键内容。也就是说,两者之间不可分离、不可分割,需要相互融合发展,不能相互割裂,更不能“各自为家”。就客观实践来看,党建与基层治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功能体系不健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融合发展不深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综合成效不明显。综合来看,缺少必要的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制度、治理机制和治理资源的有效支撑,致使党建引领

*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资助“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功能优化及实现机制研究”(22JY068)。

[收稿日期] 2022-08-24

[作者简介] 张继军,政治学博士,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716000;王潇,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716000。

基层治理陷入“悬浮化”状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成效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党建与基层治理有脱节现象,是隔离而非融合,是割裂而非发展,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提出了新挑战,需要优化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功能建设,更要优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功能结构,以系统性、结构性功能回应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困境,促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高质量发展。换言之,基层治理涉及大量公共和私人部门,需要在多元主体之间构建合作机制,促使各方达成集体行动,实现分散行动不能完成的治理目标^[4]。为此,必须发挥党的领导优势,理顺党建与基层治理的行动关系,把党建引领功能真正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整体性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高质量发展,不断构建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格局和新发展。

二、结构转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社会变化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环境、新变化,基层社会呈现为多种类型组织及多元个体利益博弈的场域,如何实现基层治理的有序发展,如何协调基层中的多元利益关系,直接关乎基层治理的可持续性发展。在回应社会结构转换的过程中,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嵌入”过程出现了“悬浮”困局,需要找寻其中的运行逻辑,积极应对基层治理中的悬浮化和低效能问题。

(一) 转换:基层社会结构发生变迁

在社会变革发展的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不断形成,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综合化的特征属性,并交织在繁杂的关系网络之中。同时,随之而来的基层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社区制替代了单位制,单一主体治理的过程不再适应现代化治理的需要,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是客观实践的必然要求。在传统基层治理过程中,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出现了些许问题。例如,何以优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功能结构,何以推进基层治理的可持续性发展,何以科学构建上下互动机制,这些都是党建高质量发展必须要回应的。在社会结构的转换过程中,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面临诸多客观挑战,要深入探寻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发展逻辑,积极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更好发展。

(二) 嵌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尝试

从国家治理体系构成看,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内容,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有利于深化基层治理发展,有利于维护党在基层治理中的权威,而这这就要求基层治理必须置于党的全面领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的 basic 经验,是将党的组织建立到其他一切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细胞中去^[5]。政党嵌入治理,是实现党的建设进而以党的建设推动治理的有效路径,也是新时代党建的价值取向与制度安排^[6]。推进党建有效嵌入基层社会治理,高效发挥党建引领的独特作用,以制度机制的完善和引领功能的优化,不断推进基层治理。更有“实践型党建”探索,将党建嵌入基层治理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实现党建与基层治理无缝对接。除此之外,借助改革发展机遇,创新探索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可以改变基层治理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党组织、政府组织和社会主体的多元行动者系统,形成多种互动形态和内外互动路径,促进多元主体间的认知嵌入、情感嵌入和规范嵌入,进而实现整体性党建的治理绩效^[7]。

(三) 悬浮: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困局

当前,社会自主性增强,呈现出流动性、网络化和碎片化特征,使得依赖组织、动员、指令的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越来越难以有效“进场”,导致党建出现“悬浮化”^[8]。在现实中,出现了党建引领不足、互联互动难、发挥作用难、党组织管理难等问题。究其根源:一方面在于体制机制尚未理顺,党建与基层治理的权责关系并不明晰,党建与基层治理的共识性行动需要达成,亟需构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相辅相成、紧密相连的共生发展关系。另一方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在理念、制度、机制、资源、技术等方面没有得到有效串联,使得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功能结构未能有效释放整体性治理效能;同时,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表达机制、参与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等,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自然缺乏内生活力和内生动力。

从功能结构来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功能体系欠佳,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功能结构不优,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陷入悬浮化,导致基层治理效能得不到有效提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陷入低效化和低能化。那么,何以破除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悬浮化现象,何以优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功能结构,何以切实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绩效,这需要多方面的创新发展:

一是党建与基层治理权威要统一,需要理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逻辑关系,也要丰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手段;二是党建资源与基层治理资源要融合,整合分散化的资源,破除治理资源的碎片化倾向;三是党建与基层治理内在统一,不断生成共识性行动,达致多赢发展格局^[9]。进一步说,需要注重自上而下给予党建更多治理资源、治理权能和治理权威,优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功能体系,理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权责关系,积极回应基层社会中的复杂、多元问题,真正破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的种种困局。

三、功能优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系统功能

完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功能迫在眉睫,实现党建引领转向“功能引领”,优化党建引领功能体系,提高党建工作质量,进而实现基层治理的高质量发展。在此过程中要优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系统功能,更要完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功能结构,以结构性、系统性地深入推进基层治理,达致“区域一体—主体觉醒—组织协同—精神培育—资源整合”的功能结构,促成结构功能的适用性、高效性、科学性,突破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发展、新机制,进而有层次、有梯度地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良性发展。

(一) 区域一体:引领基层有效治理

政党不能缺席社会治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党建在方向把控、主观能动性激活、互动合作与协同治理上发力^[10]。综合而言,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要准确把握政治方向,贯彻党的大政方针,带领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居民参与基层治理。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更是顺应社会发展趋势,重视“一切工作到支部”的发展要求^[11]。深刻地来说,党建引领区域治理,就要促进区域一体发展。同时,要围绕区域利益一体化,整合多方利益关系,探索赋权基层,实现“党建赋能”,塑造增能型党组织,调动更多基层治理主体的参与热情,释放基层治理主体的内在潜能,使不同主体高效参与基层治理,并在治理过程中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不断维护和巩固党在基层的合法性、权威性。也就是说,需要深入推进“党建区域一体化”发展,围绕区域共同利益的实现目标,发挥基层党组织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核心功能,充分激发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内在动能,夯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发展空间。同时,切实尊重公民需求,坚持有效

引领基层治理,科学促进基层建设,不断推进区域治理一体化发展。

(二) 主体觉醒:助推基层自治发展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12]。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过程中,人民群众发挥着主体性功能,关乎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最终质量。为此,需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优势,更要强化基层群众自主能力,进而释放基层群众的主体性功能,有效激发基层群众自治活力,充分消解社会矛盾,规避一系列不良的社会后果。而唤醒民众主体性需要专业性的技术支撑,需要畅通人民群众的参与渠道,优化人民群众的参与机制,确保人民群众相关权利的正确行使,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融入基层治理、基层决策和基层评估等关键领域,真正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此同时,需要把不同组织和不同个体的步调协调起来,逐步建构稳定的基层秩序和基层发展格局,保证社会系统处于有序状态和健康状态。除此之外,更要探索多层次、多种类的自治平台,发挥共治平台、自治平台、线上平台、线下平台的综合性治理功能,其中,尤为注意自治的有效性、经济性和科学性,推进党建助推基层治理的制度化、科学化、高效化和法治化,逐步实现“政党强、社会强”的均衡型基层治理结构,提升基层自治能力和基层自治水平。

(三) 组织协同:协调组织有效运转

面对基层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利益多元化、需求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治理主体间不仅相对平等、自主,而且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基层社会本着自我组织、自我规制的原则,在法治和民主协商的框架下自主运转^[13]。但是,当面对复杂的基层公共事务时,就需要不同主体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更要基层治理主体合作互动,充分发挥集体智慧,汲取不同主体力量,这就需要协调组织之间的利益关系,使组织有效运转,共同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也就是说,基层治理的属性决定了多主体、多组织需要充分协商、有效沟通,必要时需要多层次协商,并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共同行动。这就需要通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通过党建维护平衡关系,通过党建协调组织得以良性运转。就中国基层治理实践来看,草根社会组织也凸显出封闭性、排斥性和冲突性的特征,如“失独

组织非法维权”“广场舞场地争夺战”等,亟须通过党建整合多方诉求,弥合组织间的治理缝隙,发展草根组织内在的互惠性、合作性,实现各类组织协同治理和科学治理,创造各类组织发展的绿色文明环境,促进党建引领下的基层社会共同体的美好发展。

(四) 精神培育:促进公共精神生长

培育公共精神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应有之义,培养人们的公共精神更有利于提高基层治理水平。而公共精神不仅有利于基层治理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增强党在基层社会的权威。实践和理论证明,社会治理的本质在于公民的互动,关键在于人的发展,重点在于培育有公共精神和公益精神的社会公民。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构建大量公共场域,塑造不同公共空间,激发民众的公共意识,使基层民众达致集体行动和有效合作,切实解决基层公共问题,科学推进基层治理水平。同时,党建引领也要积极营造基层公共服务氛围,推进普通党员的组织化建设,以组织为载体,带动基层其他组织和个体参与公共服务。综合来看,这既有助于凝聚民众人心,营造温暖的社会氛围,也有利于构建基层社会的美好生活共同体。进一步来说,在基层社会场域,民众以组织化的形式参与社会行动,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基层社会运动,有效培养了公民意识,激发了民众参与公益服务的热情,树立了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先进发展理念^[14]。

(五) 资源整合:盘活社会治理资源

资源背后孕育着巨大能量,资源的丰富性关乎基层治理水平的发展空间。而党组织具备强大独特优势,比其他组织拥有更为雄厚的治理资源。就基层治理而言,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更需要发挥党建的资源整合功能与资源保障功能,以有效盘活社会治理资源。而且,唯有执政党有资格、有能力、有意愿在资源整合过程中,推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增值^[15]。换言之,基层治理的过程也是利益互动的过程,需要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过程中整合治理资源,促进基层治理的更好发展。但是,资源是相对有限的,而问题总是频繁出现的,为了回应错综复杂的基层难题,就需要建立多类型、多层次、多机制的资源链接体系,需要挖掘丰富的治理资源,需要吸纳更多社会力量,以资源的多元性回应问题的多元性。进一步讲,提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整体水平,必须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资源整合功能,科学统筹基层

治理资源,不断创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资源使用机制和资源循环机制,适时组建基层基金会和基层互助基金组织,激活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在这一过程中,要扩大基层组织、草根组织和普通民众在治理资源使用上的知悉权、参与权和决策权,确保基层治理资源利用的精细化、合理化、科学化和高效化。

四、实现机制: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整体回应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既符合当前的客观实践要求,也完全符合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一个“逻辑体系”,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最佳效能,需要推进“核心领导-权责配置-能力发展-合作运转-责任追溯”的整体安排,核心是必须坚持党的坚强领导,关键在于理顺治理主体权责关系,重点在于增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综合能力,进而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合作机制,完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考评体系,从而整体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多重成效和多种效益。

(一) 核心领导:坚持党在基层治理中的坚强领导

没有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基层治理便无法有效展开,更难以在重大突发性事件面前经得住考验^[16]。必须夯实基层党组织的主体责任意识,实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良性运作,指引各个主体朝着目标前行,构建基层治理的新局面、新景象和新格局。具体来说,在新时代背景下需要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强大优势:一是强化党的领导机制,优化多元主体之间的治理关系,强化分工合作意识,充分发挥党建在基层治理中的“掌舵”“调头”功能,逐步形成党建“掌舵”,自治组织“擂鼓”,各类草根社会组织“划船”的生机勃勃景象。二是明确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的相关主体功能,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发挥参与主体的功能优势,以相对稳定的治理关系推进基层治理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其中,党建引领相关治理主体参与协作,相互达成共识行动,进一步夯实党的基层治理基础,有效巩固党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真正把党的领导体制功能转变为基层治理效能。

(二) 权责配置:厘清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权责关系

基层治理的过程十分复杂,涉及诸多利益相关方,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回应复杂化的利益关系。倘

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权责关系不明,必然增加基层治理的相关成本,也会降低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效能和绩效。为此,需要有效厘清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主体之间权责关系,使其合理分工、各司其职,推进基层治理一体化发展,破解基层碎片化治理困局,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整体性效能。具体来说:一是创设制度机制,合理划分权责关系。制度的作用就在于明确权责关系,以制度规范各自活动范围,进而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功能优势,使两者互为一体,互为融合发展。二是从传统治理转向现代治理,实现权责体系的合理配置。综合来看,要着重从上层着力向基层着力转变,从局部推进向整体推进转变,从各自封闭向共同参与转变,从简单粗放向精准发力转变^[17]。唯有如此,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动能才被真正释放,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才会转化为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发展,彼此紧密相连、密不可分,进一步增强各个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推进基层治理的高效能发展,提升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三) 能力发展:增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治理技能

能力困境一直是制约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因素,要适应客观发展环境,有效实现人的转变,实现人的现代化,推进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人的发展促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更好发展,具体而言:一是加强党建队伍的理论教育,提升党建队伍的理论水平。从实践来看,党建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文化素养差异较大,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升。为此,需要强化实践教育和理论教育,提升党建队伍的综合素养。二是优化主体成员构成,构建可持续发展体系。进一步说,需要开拓人才进入渠道,引进优秀的复合型人才参与到党建工作之中,有效破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能力困境和技术困境。三是增强治理技能,强化治理能力。现代社会治理面临失灵,这就需要更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理念,增强组织能力、回应能力、应急能力和协调能力,进一步提升党建成员的基层治理技能,如发现需求、化解矛盾、协商对话、弥合冲突等综合能力建设。四是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资源整合能力。优化社会治理资源配置方式,实现资源配置结构由权威分配到目标需求主导的转变。打通资源网络,横向资源整合,打造区域化、一

体化党建组织;纵向资源整合,优化基层治理机制和基层治理关系^[18]。

(四) 合作运转: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融合发展

基层治理已呈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状态,基层社会有执政党基层组织、群众性自治组织、各类草根社会组织等^[19]。为了有效回应基层治理中的碎片化、低效化困局,提升基层治理的整体效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重在调动多元治理主体广泛参与,科学构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合作机制,释放各方力量,激发各方主体性功能。一是实施赋权增能机制,促进多元主体合作运行。民主是用来处理公共事务的,民主离不了公共意识,没有公共理性的人也是不可能有民主意识的。鉴于此,需要明确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主体地位和主体关系,贯彻实施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构建基层党组织领导、自治组织引导、社会组织融入、社会公民参与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发展之道。同时,进一步探索“授权赋能型”基层治理体系,在主体、制度、机制、方法和资源上向基层赋权,保障基层有相应权能开展治理行动,强化基层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二是大力培育多类型、多种类的社会组织,增强基层治理的活力和专业化水平。治理是多元互动的过程,而社会组织则是基层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有效承接部分基层治理功能;同时,从绩效角度来看,社会组织具有低成本、高收益、自主性、灵活性的特征。这就要求对社会组织进行“制度赋权”,营造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合作治理的体系机制。三是内生基层社会组织,推进普通公民的组织化进程。具体来说,需要依据基层实际情况,坚持群众需求导向,推进本土组织和草根组织的成长和发展。同时,依托内生社会组织,实现居民自治有序化,建立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有序自治机制,从而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和高质量发展。

(五) 责任追溯:落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责任机制

治理区别于管理,治理强调双向互动机制构建,而非单一主体的输入过程,其中,主体是相对平等的,也是相对独立的,但彼此有着紧密联系,并且需要多元主体的持续参与。但在责任压力下,基层工作者需要完成大量上级交办的事务,接受上级单位的目标考核,无暇顾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真正绩

效。同时,由于缺乏规则化、制度化的设计,实践中的党建引领依然存在不足^[20]。为此,需要激活不同主体行动能力,落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责任机制,促成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一是落实清单制,明确责任关系。制度具有统一思想、协调整合、规范行动、推动发展等功能,这就要求界定清晰的责任体系,明确主体的责任内容,明晰各自事务的治理流程;同时,将主体责任公布于众,保障公开公平公正。二是建立责任反馈制度,优化责任追究机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及时回应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的各种诉求,满足人民群众所需。对于履行责任意识不强,实施效果不佳的主体行为进行责任追究,以奖惩机制推进责任机制严格落实。三是推进有序参与,压实责任运行机制。公民参与是现代治理的本质要求,公民参与更是推进治理有效的核心内容。落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责任机制,就要畅通公民参与监督的渠道,维护公民参与权利,实现上下双重监督,促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良性发展,真正实现基层治理的高质量高效能发展。

参考文献:

- [1] 陶传进,杨亚亚.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政治目标及其落地方式[J].新视野,2021(2):32-36.
- [2] 潘博,王立峰.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其化解路径——以社会资本为分析视角[J].社会主义研究,2020(5):110-117.
- [3] 吴晓林,谢伊云.国家主导下的社会创制:城市基层治理转型的“凭借机制”——以成都市武侯区社区治理改革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20(5):91-98.
- [4] 杨宏山,李婷.双重整合:城市基层治理的新形态[J].中国行政管理,2020(5):40-44.
- [5] 李威利.从职域到区域:中共百年城市基层组织建设的转型发展[J].党政研究,2021(2):51-60.
- [6] 周建勇.新时代党建中的嵌入治理问题研究[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87-97.
- [7] 彭勃,吴金鹏.整体性基层党建何以可能:空间治理的工作路径[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1(1):81-87.
- [8] 陈亮,李元.去“悬浮化”与有效治理:新时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逻辑与类型学分析[J].探索,2018(6):109-115.
- [9] 杨妍,王江伟.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现实困境 实践创新与可行路径[J].理论视野,2019(04):78-85.
- [10] 曹都国,吴新叶.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制度逻辑与效能改进[J].江淮论坛,2020(6):86-91.
- [11] 祝灵君.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研究[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4):37-45.
- [12] 曹海军.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J].政治学研究,2018(1):95-98.
- [13] 周庆智.改革与转型:中国基层治理四十年[J].政治学研究,2019(1):43-52+126.
- [14] 孔娜娜,陈伟东.公民社会的生长机制:政府与社会合作——以老旧城区社区物业服务为解读对象[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4):158-162.
- [15] 刘厚金.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以集体行动的逻辑为分析框架[J].社会科学,2020(6):32-45.
- [16] 赵秀玲.在社会建设和基层治理中贯穿党建红线[J].党的文献,2020(4):8-9.
- [17] 狄英娜.社区的“温度”从这里来——上海市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调查[J].红旗文稿,2018(24):12-14.
- [18] 赵聚军,王智睿.社会整合与“条块”整合: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的双重逻辑[J].政治学研究,2020(4):95-105+128.
- [19] 胡小君.从分散治理到协同治理:社区治理多元主体及其关系构建[J].江汉论坛,2016(4):41-48.
- [20] 刘佳,文吉昌.党建引领基层适应性治理:制度优势、不足与改进——以B县适应性环保治理为例[J].领导科学,2021(4):48-51.

(责任编辑:东 华)

(校 对:木 子)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级小微权力的图景、场域与规范路径^{*}

李 辉

[摘要]规范村级小微权力运行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村级小微权力覆盖资源分配、公共服务、村民自治等多个领域,资源流变、法治根基、组织化建设、文化浸润等非均质性社会基础条件在运行风险和规范难度的双重面向上多元交错,勾勒出村级小微权力实际运行中的差异图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场域投射分析显示,不同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资本决定其在小微权力场域中的位置及博弈策略。全面规范村级小微权力必须贯彻系统思维,以制度确权“正名”,以场域控权“增能”,以乡风塑权“铸魂”,重构有规则、有灵魂的村庄公共秩序。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村级小微权力;规范路径

[中图分类号] F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071(2023)01-0047-08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作为法律法规赋予村民自治组织及村干部在“三资”管理、惠农工程建设、优抚安置与社会保障等村务管理中的权力,村级小微权力运行与基层治理效能密切相关。小微权力行使一旦发生异化,便会恶化党群关系、弱化政治认同、消解执政之基,严重掣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治力度,规范乡村小微权力运行”^[1],2022年中央1号文件中关于强化基层监督,加强基层纪检监察组织与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沟通协作、有效衔接,强化对村干部的监督等表述同样控权色彩浓厚。显然,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迈向农业强国的新征程中,加快构建民主自治、权责明晰、相互制衡、公开透明、操作规范、简便高效、监督有力的小

微权力运行机制,是确保治理有效、避免乡村脱序的当然举措,更是夯实村治根基、牵动乡村振兴战略全局的重要抓手。

一、文献述评

对村级小微权力的研究与中国农村的权力格局分布,包括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及社会结构的分化有着最直接的关联,尤其是在取消农业税后,农民、村集体、基层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重构打破既往的权力格局,小微权力逐渐浮出水面。随着2013年宁波北仑区试点基层“小微权力清单”,2014年宁海县出台《村务工作权力清单三十六条》,地方政策层面的实践探索逐渐将村级小微权力引入学术研究的范畴:

学界最初对村级小微权力的研究聚焦于其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内在关联上。学者们尤其是参与改革的地方官员往往对村级小微权力影响“治理有效”这一目标具有最直观而深刻的体验,认为只有严格规范小微权力,才能打通村级权力运行“最后

^{*}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江苏村级‘小微权力’的差异图景与规范路径研究”(19ZZD004)。

[收稿日期] 2022-09-22

[作者简介] 李辉,法学博士,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南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210046。

一公里”,从制度层面提升乡村治理效能^[2]。另有机构和学者进一步拓展了村级小微权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关联,指出小微权力不规范易于导致集体资产资源被非法侵占,村级重大决策被非法利益裹挟,对实现“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乡村战略目标极其不利^[3],村级小微权力是否规范还关系到能否打破农村熟人社会及人情往来的旧秩序,能否构建农村社会交往关系新规则,这对净化基层政治生态,推动“乡风文明”同样至关重要^[4]。作为规范小微权力运行的创新典型,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得到重点关注。在2018年中央1号文提出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之前,这一做法就已经在多地出现并引发学界关注。有学者分析了这一创新的制度逻辑、主要做法、政策绩效^[5],也有学者将其置于县乡村关系格局中去整体性理解,反思了政策创新的社会基础^[6]。当然,同样有观点认为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并非尽善尽美,面临着成本抬高、效率不足以及权力制衡不充分等问题^[7]。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尝试进一步设计规范村级小微权力的可行路径。常见的分析维度包括:需从顶层设计、制度执行力、党内“软环境”、制度文化等诸多方面确保小微权力规范^[8];应把制度建设、基层党建与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结合起来,构建农村基层小微权力规范运行的长效机制^[9];探索构建“村级小微权力+互联网+监督”平台,以规范村级财务管理为抓手,通过依法确权,有效晒权,规范用权,把村级小微权力运行置于互联网大数据平台之中^[10]。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已有的研究在框架上侧重于“自下而上”的社会化视角,在内容上集中于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而村级小微权力的源起及运行中的失范,恰恰是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在农村基层场域复杂叠加与耦合的结果,与农村公共权力格局、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多重因素密切相关,缺乏系统分析,就无从解释村级小微权力由“应然”走向“实然”过程中的逻辑自洽,就难以描述隐藏在小微权力运行“黑箱”下的多元利益博弈,仅凭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显然难以尽数回应上述问题,亟需在广度与深度上作进一步探索。

二、村级小微权力界定及运行中的差异图景

需要指出的是,村级小微权力并非收费时代的

自然延续,其权力行使的主体、客体、依据等与以往相比具有明显异质性,乡村治道变革在事实上重塑了乡土社会的权力格局,“改革前的总体性支配权力逐步被技术化的治理权力所替代”^[11],这在发生学意义上对村级小微权力的生成及差异化运行产生了直接影响。

(一) 村级小微权力的三重意蕴

目前中央层面的政策文件尚未对村级小微权力作明确界定,地方性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的小微权力尽管内容各异,但按权力来源与行使主体,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资源分配类权力,即扶贫救助、惠农政策落实等因国家向农村输入资源而衍生的权力。税费改革后,随着国家资源下乡与地方资源资本化,“在项目资源分配环节,特殊主义的项目资源分配模式形成了资源分配的权力—利益网络”^[12],乡村干部作为基层治理中的代理人与当家人,自然承接这部分资源分配的权力,而作为理性的能动者,其行为逻辑又深刻影响权力行使的实际效果。其二,公共服务类权力,即劳动就业、公共教育等国家基础性权力在乡村公共服务领域的延伸。以国家政权建设来矫正当下乡村治权弱化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考量,而国家政权建设“并非只涉及权力的扩张,更为实质性的内容是,它必定还涉及权力本身性质的变化”^[13],即在解构全能主义国家的同时,有序增强基础性权力,从而持续有效地提升国家对农村的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其三,村民自治类权力,即村务公开、“三资”管理、工程建设与采购等村民自治范畴内的权力,这类权力本应作为农民由义务本位走向权利本位的印证,却又往往因农民自身的分化和自利而落入机会主义与策略主义相互强化的窠臼。

对上述三类小微权力的考量必须置于当代中国乡村整体性变迁的时代语境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宏大叙事中予以体味,尤其应关注国家建制模式在农村的适应性嬗变,因为“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关系影响着国家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构成权力的结构”^[14]。质言之,村级小微权力是在乡村政治规范与基本社会秩序重构及新型乡村共同体型塑的政治生态遽变中集合锻造的产物,而这种锻造又因力度与韧性不足导致运行中的困境:一方面,力度不足缘于小微权力行使与国家权力的分布式下沉和互动式转移相关,前者往往因地方分利秩序和精英俘获而导致权

力下沉中的散佚,后者则受村民薄弱的自主行动能力与村庄派性政治的掣肘,易于出现权力转移中的衰减;另一方面,乡村治理内卷化导致集合锻造的韧性不足,乡村有效治理有赖于组织化的官僚体系与基于道德、伦理和情感之上的非正式治理之间的共融性合作,但现实中大多仅有国家权力的下沉,非正式治理资源却“在经历市场化、现代化的洗礼后变得越来越脆弱、离散和隐藏,往往并不具有强大的行动能力”^[15],二者的非对称合作与碰撞使得小微权力运行缺乏足够圆融的政治场域,从而在实际运行中表现出脆性。

表1 村级小微权力运行差异图景

社会基础 差异图景	资源流变		法治根基		组织化建设		文化浸润	
	原生经济发展水平	惠农资源流量	涉农法律法规体系	农村社会法治精神	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	农民组织化程度	宗族势力	新乡贤文化
运行风险高(R1) 规范难度大(D1)	+	+	-	-	-	-	+	-
运行风险高(R1) 规范难度小(D2)	+	+	-	-	+	+	-	+
运行风险低(R2) 规范难度大(D1)	-	-	+	+	-	-	+	-
运行风险低(R2) 规范难度小(D2)	-	-	+	+	+	+	-	+

显然,小微权力运行风险及规范难度与资源流变、宗族势力呈正相关,与法治根基、乡贤文化、乡村组织化建设呈负相关。前者无关资源本身,而是原生经济发展水平高、惠农资源流量大的地区,诸多利益交集更易形成权力的利益网络,导致难以抑制小微权力运行中的越界冲动,这是宁波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率先推出小微权力清单的重要原因,而作为传统差序格局的重要表征,宗族势力强大往往使得小微权力运行中难以摆脱人情的影响,在某些地区,宗族势力甚至深度介入村级组织选举,维护宗族利益一旦成为小微权力运行的隐藏文本,失范的概率将大大增加;后者则与现代性的生长相关联,作为与现代化相伴生的质的规定性,以独立主体、自由市场、民主政治、公共精神等为内核的现代性既是乡村振兴预期的伦理底色,也是阻止小微权力运行脱序的天然屏障:一方面,现代性渗透于法治根基与新乡贤文化,二者的功能性互构在不同维度调节小微权力运行,这其中,法治的作用自不待言,其内蕴的正

(二) 村级小微权力运行多重面向下的差异图景

诚如上文所述,村级小微权力是后税费时代乡村权力格局调整的产物,国家作为关键元素,由其主导的农村治理制度变迁、农业重大政策调整、农民公民权赋予等在制度与权威层面为小微权力源起提供了法律与政策依据。而在实际运行中,资源流变、法治根基、组织化建设、文化浸润等非均质性社会基础条件在运行风险和规范难度的双重面向上多元交错^①,勾勒出村级小微权力运行的差异图景,即R1D1, R1D2, R2D1, R2D2(见表1)。

式规则为小微权力运行提供了明晰的边界与路径,而新乡贤文化作为法治手段的补足,在非正式规则领域塑造共同的知识图式和行为模式,同样有利于规范小微权力,另一方面,现代性在解构传统乡土伦理的同时,不断引领乡村社会走向公共性和政治性并自然外化为组织化的政治参与,毕竟“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16]174},在乡村场域,基层党组织引领和农民自组织化构成政治参与的基本样态,在浸润公共精神和增强政治效能感的同时,也将小微权力监督逐步纳入更稳定可控的制度化渠道。

三、村级小微权力运行的场域投射分析

倘若将村级小微权力的差异图景视为平面直扫式的静态梳理,那么动态视角下的“过程—事件”分析更利于全面透视小微权力的运行逻辑,这就需要拓展一种场域研究^②思维,以共时理解的方式描摹小微权力运行和监督的全过程,在微观和中观层面构建嵌套于现代性与乡土性冲突之中的行动者博弈

分析,进而以一种更为鲜活的方式达成与乡村振兴宏观战略的相互关照。

(一) 行动者的生存心态(Habitus)

“生存心态”是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基本概念,意指在场域内贯穿行动者内外,既指导行动过程,又彰显行为风格,既表达行动者个体特质,又渗透着所在阶层属性,兼具“建构的结构”与“结构的建构”双重性质和功能的“持续可转换秉性系统”。本文的“生存心态”特指小微权力行使者(村干部)与监督者(基层政权、普通村民)围绕权力运行和监督形成的稳定心理基础、意识形态及行为逻辑,其复杂叠加使得小微权力差异图景的场域投射愈加生动而多变。

对村干部来说,小微权力行使并非简单的职责履行,而是牵动场域神经,勾连乡域政治的关键抓手,“政治正确”作为权力运行中实际遵守的价值准则,直接影响着村干部们的行为趋向:基于上级政府考核或村庄公共利益所导致的小微权力失范因为“政治正确”通常被冠以“权变”的名义,被认为具有天然的行为正当性,是村干部化解村民质疑的终极武器,也是免于事后追责的丹书铁券。在此基础上,生存心态的自我归并和同化又促使村干部们将追逐私利导致的小微权力腐败自觉纳入上述“公意”的统一文本,从而进一步模糊权力行使的边界。对基层政权和普通村民来说,虽然同为小微权力的监督者,但生存心态迥然不同:基层政权肩负维持乡村社会秩序再生产的职责,既要确保乡村社会的稳定,又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而税费改革并未完全解构传统的压力型体制,在各个条口,基于目标替换而产生的策略性治理在不断型塑“不出事逻辑”的同时,也为小微权力失范设置了事实上的容限,即以达成各类考核任务为下限,以不触动乡村社会稳定大局为上限。在此范围内,基层政权随时可能变换角色,在监督和默许的行为模式间灵活切换,甚至可能在政策迎检(党组织建设)、产业治理(惠农经济)等方面直接参与小微权力运行;普通村民对小微权力监督的态度同样因多重因素显现出多面性,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积淀的权力敬畏感构成农民生存心态的原初体验,导致这一群体似乎天生缺乏权力监督的勇气,而国家对基层政权规训的不断加强、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尤其是利益思维的涌流又为小微权力监督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当

然,建立在理性算计和利益考量基点之上的监督逻辑往往具有极强的选择性,他们既可能因个人和家庭私利化身维权斗士,也可能彻底沦为“无公德的个人”而对小微权力侵蚀村庄公共利益视若无睹。

(二) 资本(Capital)及其在场域中的转化

在布迪厄看来,行动者个人和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是贯穿于社会场域的动力学原则,而这种权力关系又始终通过行动者拥有的占有的有形与无形资本来呈现。简言之,由行为主义视角出发,小微权力在乡村社会场域中的投射主要通过行动者拥有的多种资本(经济、社会、文化)间的比较和竞争来建构。

乡村社会场域下的经济资本主要包括行动者占有的物质财富与资料,相较普通村民,村干部的经济资本不仅包括自身拥有的财富,也暗含了附着在职位之上的村集体“三资”管理权及下乡资源的分配处置权,即部分领域的小微权力同构于村干部的经济资本,且权力行使的规范化程度越低,同构化程度越高。社会资本则是行动者基于关联性社会网络而掌握的资源容量及动员能力,鉴于近年来“富人治村”与“能人政治”现象日益普遍,财富与社会交往的共生关系使得“富人”村干部们通常具备更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早已越出村庄,延伸到相关业务部门和各级政府”^[17]。文化资本涵盖了个体的受教育水平、文化修养及建立在农技与管理基础上的知识权威,当前乡村治理中的“行政吸纳”模式与知识精英之间存在选择性亲和关系,其结果便是村干部群体掌握的文化资本普遍优于普通村民。如此一来,貌似村干部与普通村民掌握的各类资本极不均衡,小微权力运行是否可能陷入百无禁忌的境地?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是因为除了基层政权的监督与调控,上述资本对小微权力的实质性影响还需在政治系统内完成象征性资本的转化,这一转化过程不可能圆满,按照布迪厄的说法,二者之间存在一个“汇率”,这就为乡村治理的制度建构与行动者的策略选择留下了充分的空间。

(三) 位置(Location)与策略选择

综上,乡村社会场域中的小微权力运行最终依赖于行动者各类资本在政治系统内的转化,这一资本“正当化”和再分配的过程,也是权力关系博弈的过程,场域中不同行动者的“位置”与策略间的耦合互动形成连续的拓扑空间,进而塑造出小微权力运

行的多种可能。其中,行动者相对稳定的生存心态与静态的资本存量决定了博弈中的初始“位置”,对彼此“位置”的感知又深刻影响权力关系中的策略,各方全力推动自身占有的各类资本在政治系统内高质量转化,从而确保获得占优“位置”,相应的策略选择在两个方向上展开:其一,政治系统的准入(Access),即争取与“位置”相匹配的政治身份。行使小微权力必须以获得村干部身份为前提,因而村庄选举必然成为资本转换与策略竞合的集聚地,胜者取得合法合规行使小微权力的制度确认,完成象征性资本转换,负者退而为监督者,所占有资本随之转换为监督资源,双方的“位置”因选举结果发生改变并持续影响小微权力行使与监督的力量对比;其二,政治规则的制定(Formulation),即争取有利于自身“位置”的行为规则。对小微权力行使者而言,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理想的规则制定应当既确保权力行使的权威,又能为牟取私利留足空间,而监督者则希望通过规则的覆盖屏蔽权力越界的所有可能,二者产生的张力以混合方式向政治系统传递并最终通过内部转换输出为特定的小微权力运行规则,这一过程往往复杂而激烈,不独是因为双方为争夺规则制定主导权展开的合作与非合作博弈,更因为动态的角色互换与“位置”调整会颠覆性改变规则诉求,这就为小微权力运行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也在实践层面进一步印证了小微权力差异图景的必然逻辑。

四、系统规范村级小微权力运行的实践路径

随着《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出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步入快车道,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亟需以系统思维全面规范小微权力,以制度确权“正名”,以场域控权“增能”,以乡风塑权“铸魂”,重构有规则、有灵魂的村庄公共秩序。

(一) 以制度确权“正名”

村级小微权力内涵不清、界限不明不仅为权力滥用打开方便之门,也借由正常履职与权力异化的认知偏差使相关监督师出无名,因而规范小微权力必须由“正名”开始,在制度和法治层面率先做到精准确权。

一方面,应审视并完善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确保分类实施、整体推进、智慧融合。必须认识到,小微

权力清单制度发端自浙江并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迅速推广,与当地集体资源丰富且存在大量无法明确归属的经济利益有着最直接关联,带有精细化治理色彩的小微权力清单是利益争夺之下的应激反应的结果。反之,在集体资源相对单调而匮乏的中西部农村,这项制度则不宜强行嫁接,否则失去资源滋养的制度援引“就可能因为缺少基本的支撑复杂制度高成本运转的资源条件,而变成形式主义,甚至导致乡村治理中的无效率空转”^[18]¹⁸⁰。同时,小微权力清单的制定必须整体协同于后续的执行、监督和调整方能凝聚制度合力,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性完善小微权力事项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流程图等“三单一图”,实现一切权力有控制,一切控制有程序,一切程序有规则,一切规则有清单,要强化落地落实,提升制度执行力,回应村民诉求,增强制度渗透力,完善监督反馈,培育制度调适力。此外,要重点加快小微权力清单智慧化赋能,将“三单一图”纳入村务管理与服务智慧化平台,实现事项清单线上公示,材料文本线上审核,流程进度线上查询,监督测评线上跟进,全面增强普通村民了解并监督小微权力运行的可及性与实效性。

另一方面,以“送法下乡”滋养农村法治内核,实现权由法定,权依法使。规范村级小微权力的法治化逻辑业已通透,而具体操作路径仍需思量,尤其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国家权力再次向乡村扩张,乡村治理出现明显行政化、边缘化倾向”^[19]的现实情境中更是如此。应将规范小微权力作为“送法下乡”的重要内容,将其同步纳入中国农村法治化进程:一要明确小微权力法律依据,全面梳理村级小微权力条目,对具体内容进行法制溯源,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予以取消,同时审核小微权力来源的法律位阶,确保其不与上位法产生抵牾,经审查合格的小微权力编制成权力清单并逐条标注法律依据,印制指南手册向村民宣传发放并在村务党务公开栏和信息服务平台及时公布;二要明确小微权力行使程序与规则,应敦促绘制并审核小微权力运行流程图,理顺各节点的前后置关系,取消违法违规的前置条件,同时审查小微权力行使的主体、对象、工具等要件,确保其合法合规;三要明确小微权力监督路径,既要拓展监督渠道,通过信息化的“掌上平台”为村民个体的“原子化”监督留足空间,又要构建由市县

纪委监委统筹协调、乡镇纪委负责实施、村务监督委员会辅助配合的三级监督体制并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

(二) 以场域控权“增能”

村级小微权力根植于乡村社会场域,对其考察显然不能脱离村庄这一基本政治单元。事实上,在精准确权之后如何实现场域控权,正是规范小微权力由“正名”走向“增能”的关键。

其一,强化村级党组织“嵌入式”引领是场域控权的核心。作为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在乡村场域中规范小微权力必须夯实村级党组织建设,将其全面嵌入小微权力运行全流程:首先,以党组织领导权威实现授权嵌入,村级党组织肩负统筹领导乡村经济社会建设的职责,权威基础得天独厚,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的“一肩挑”制度设计更是进一步增强了村级党组织的影响力,因而凭借自身权威及地方性知识,理应将乡村治理的战略目标与村情民意相结合,对村级小微权力的内涵、边界、程序等提出翔实可行的赋权建议并通过制度渠道予以确认,保证小微权力配置兑现贯彻国家意志与服务民众需求的双重功能;其次,以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实现行权嵌入,鉴于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规定的推行,村级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在很多领域自然化约为对小微权力的规范,应将党组织班子建设、组织生活、党员主题教育活动等方面的标准化建设与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惠农项目落地、便民服务供给等涉及小微权力行使的具体事务相结合,以党组织建设的标准化促进小微权力行使的规范化;再次,以全面从严治政实现督权嵌入,习总书记强调要“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20],应贴近小微权力实践开展党风党纪的常态化培训与考核,严格按照“四议两公开”的制度设计对村级重大事项决策予以监督,同时加强基层纪检监察部门对村级党组织的巡查力度。

其二,以多元组织参与激活农民主体地位是场域控权的根本。普通村民能否在权力行使与监督的双重向度上发挥主体作用是推进场域控权进而实现小微权力运行增能的关键。一方面,以村委会选举为抓手激活村民在权力行使中的主体地位,要提升村干部福利待遇,整合农村各类资源要素,优化干事

创业的制度与政策环境,吸引返乡大学生、青年民工、转业军人、本土“能人”等群体参与选举,严格按照“合格、优选、负面”三张清单确定人选,防止因权钱结合带来的村庄政治排斥垄断权力资源,造成权力运行的社会基础失衡,同时要鼓励普通村民以村庄集体利益为导向积极参与选举投票,在授权环节提前植入规范用权的因子;另一方面,以组织化为依托激活村民在权力监督中的主体地位,村民自治制度本就内蕴民主监督的需求,但实际监督效果往往取决于村民组织化水平,要正视当前“乡土社会的血缘性和地缘性减弱,农民组织化低、集体意识弱”^[21]的现实,进一步完善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通过听声纳意增强村民的集体行动能力,要发挥村民小组作为“微自治”载体的利益聚合功能,通过制度化建构与组织化表达积极参与村级重大事务决策与监督。

(三) 以乡风塑权“铸魂”

从“皇权不下县”的“双轨政治”,到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文化始终是影响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变量,“这种借由文化权力形成的自觉治理方式,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乡村社会有序统治的密码”^[22],村级小微权力的规范行使同样需要特定的文化网络予以支撑,某种意义上来说,相较刚性的制度约束,这种通过文化内在的教化与载道功能所衍生的权力规范意识才是稳定而持久的“铸魂”之举。

一方面,要改造重构契合小微权力运行的意识形态体系,以乡风文明涤清权力运行脉络。要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始终贯穿于小微权力运行的诸领域,做到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使村两委自觉将小微权力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公器,而非为个人谋私利的工具;要通过《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加强对广大村民的道德引导,推动道德养成,使其在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精神状态等方面同乡风文明的战略目标相契合,实现个体行为逻辑由私利恣意膨胀向重视集体意志转变,有效降低小微权力运行的社会成本;要在尊重村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制定兼具法律“硬度”和道德“软度”的村规民约,促进村民自觉遵守、共同维护,使其成为小微权力清单以外的有效补充;要构建德治、法治、自治相互契合并有效衔接的价值融通体系,真正实现自治增活力,法治强保障,德治

扬正气,为村级小微权力运行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与氛围。

另一方面,要打造新乡贤文化,抵制和防范宗族势力裹挟,避免小微权力沦为宗族利益的“白手套”。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社会关系主要靠“礼”来调节,这种特定的村庄政治逻辑为宗族势力介入村庄治理提供了便利并在传统礼序和现代规制的碰撞中得以延续。税费改革后,由于村庄原有组织权威的消解及内生力量的孱弱,基层治理压力加大而正式治理资源匮乏,以宗族为代表的非正式治理资源迅速填补权力真空并在利益刺激下结成利益网络,由此导致小微权力运行出现异化。有鉴于此,必须打造新时代的新乡贤文化对宗族文化进行消解、融合与引导:应深挖乡贤“富矿”,以乡情乡愁而非宗族血缘为纽带,把德高望重的老人、心系故土的有识之士、道德模范、乡村教师、经济能人等利于统筹社会资本的群体纳入新乡贤范畴,推动乡村治理精英的再生产;应通过组织乡贤文化研讨会,建立乡贤名人库,乡贤理事会等组织,出台吸引新乡贤回归的干部返乡、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的“四乡”模式,让新乡贤成为社会稳定的维护者和乡村文化的弘扬者;应建立“激励一约束”机制淡化新乡贤的宗族色彩,引导新乡贤的嘉言懿行与现代公共精神相契合,在祛魅宗族文化的基础上“逐步构筑有现代价值共识、制度保障、文明成风的新乡贤文化形态”^[23];应打通新乡贤与村两委选举、村监会选举的制度通道,直接嵌入小微权力行使与监督的流程,为小微权力的规范运行纠偏矫正、保驾护航。

结语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加快推进,如何规范小微权力行使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将是一个棘手的未竟课题,这其中的难点在于,除却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正式规则,小微权力运行还深受“宗族观念”“文化范式”“群体思维”“经济动因”等非正式规则的影响,如何考察上述因素通过语言、习俗、心理、欲望、个性、信仰等方式作用于小微权力,必须依赖于科学的分析框架与严谨的田野调查。可以确定的是,鉴于村级小微权力运行背后的诸多隐藏文本,党和政府作为乡村治理的“元治理者”,在依靠“行政吸纳政治”的逻辑进行技术治理的同时,应积极引入非

正式治理或半正式治理,构建一种面向实践的“结构性叙述”框架,从而弥合乡土社会的非程序性与科层化治理之间的张力,借由刚柔并济、张弛有度的乡村治理体系逐步走向中国特色的乡村善治。

注释:

- ① 乡村公共权力的形成和运行是多种因素复杂耦合的结果,无论是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将其描述为相互交错影响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相互关联网,抑或是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所勾勒的传统伦理基础上的伸缩性网络,其间涉及的非均质社会基础对乡村公共权力的影响深邃而鲜明,就村级小微权力而言,这种影响最直观的体现为差异性的权力运行风险和规范难度。
- ② 场域(field)由皮埃尔·布迪厄提出,他认为“场域是诸种客观力量被调整定型的一个体系,是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也是一个冲突和竞争的空间”。

参考文献:

- [1] 中办国办印发《指导意见》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N].人民日报,2019-06-24(001).
- [2] 周庆智.论“小官贪腐”问题的体制与机制根源——以乡村治理制度为中心[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5):128-136.
- [3] 扬州市邗江区纪委监委.基层小微权力规范与治理——邗江农村“三资”监管的实践探索[J].廉政与治理,2019(1):317-326.
- [4] 李人庆.依法治村如何实现——宁海小微权力清单改革的有益探索[N].宁波日报,2015-02-17(A07).
- [5] 王杰秀,闫晓英,李玉玲.宁海“36条”:将村级小微权力关进制度笼子[J].中国民政,2015(22):39-42.
- [6] 孙经纬,戴玉琴.华南宗族村庄小微权力腐败的生成机制——基于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J].学术探索,2019(4):34-39.
- [7] 黄大熹,廖超超.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的运行效应探微[J].前沿,2016(8):83-87+103.

(下转第96页)

新时代妇女反贫困实践的经验启示

——基于2012—2021年相关文献的梳理*

仙珠 施敏靓

[摘要]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胜决战之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脱贫的近1亿贫困人口中妇女约占一半,脱贫攻坚的胜利离不开妇女在反贫困过程中发挥的“半边天”作用。新时代中国妇女反贫困的成功实践,是中国特色减贫事业的一个缩影,绝对贫困的时代已经结束,对相对贫困的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新道路上,对妇女反贫困实践经验的总结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既有文献研究发现,关于新时代妇女反贫困的历程梳理和经验总结方面的文献相对较少,本文基于2012—2021年相关文献,选用ROST CM6内容挖掘软件,对国内学界新时代妇女反贫困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同时,对现有文献进行综述,总结新时代妇女反贫困的实践经验。

[关键词]新时代;妇女反贫困;实践经验;文献梳理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3)01-0054-08

引言

反贫困是指“为了帮助贫困群体走出长期持续性贫困的生存状态,政府通过政策倾斜性支持以及非政府组织给予相关帮助,使贫困群体劳动技能不断提高并获取更多的生产资料、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帮助贫困群体实现生存条件的改善与生存能力、发展能力的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脱贫的近1亿贫困人口中妇女约占一半^[1]。在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上,妇女“半边天”力量争相迸发,巾帼风采得到生动展现,贫困妇女的精神面貌被重新焕然,脱贫致富的道路越走越宽。中国妇女反贫困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是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中国特色反贫困领域的鲜活实践。本文基于2012—2021年妇女反贫困相关文献的梳理,为我国广大妇女同胞走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相衔接的道路总结出更扎实的实践经验,也为妇女发展领域的理论研究者 and 政策实践者提供参考。

一、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也是“她”时代,共建美好未来生活需要离不开“她”力量。本文以2012—2021年发表在中国知网上的妇女反贫困文献为研究对象,剖析国内新时代妇女反贫困实践,总结经验,为后脱贫时期贫困治理问题提供颇为丰富的女性反贫经验和理论参考。

本文主要选用ROST CM6(ROST Content Mining System)软件和EXCEL,对主题内的文献进行编码和统计分析。ROST CM6是武汉大学沈阳教授ROST虚拟学习团队研发的辅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 [基金项目] 青海民族大学2022年度校级人文社科类规划项目“新时代青海农牧区妇女反贫困实践与经验研究”(2022GH03)。

[收稿日期] 2022-04-25

[作者简介] 仙珠,青海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兼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教研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810007;施敏靓,青海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810007。

的内容挖掘软件。它可以实现分词、词频、语义网络、情感、聚类等一系列文本分析。

本文的具体研究步骤是:首先,梳理2012年至2021年中国知网妇女反贫困的文献资料,通过选取主题为“妇女反贫困”“妇女贫困”“妇女相对贫困”“妇女减贫”“新时代妇女政策”“新时代妇女乡村振兴”“新时代妇女就业”“妇女精准扶贫”的所有文章,对文章标题进行高频词统计,过滤无意义词,描述分析新时代妇女反贫困研究热点;其次,针对排名较高的词频作研究议题领域分析,通过运用语义网络分析形成和输出高频词共现矩阵,形成议题领域内的可视化标签,以此探析新时代妇女反贫困研究现状;最后,基于不同视角对既有文献进行综述,得出主要研究结论,总结新时代妇女反贫困实践的经验启示。

二、研究现状

(一) 研究热点分布

以“妇女反贫困”“妇女贫困”“妇女相对贫困”“妇女减贫”“新时代妇女政策”“新时代妇女乡村振兴”“新时代妇女就业”“妇女精准扶贫”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搜索并筛选时间年限为2012—2021年,发现共有相关文献398篇。利用ROST CM6挖掘软件词频分析功能,对398篇文章的标题分词进行统计,剔除研究、问题、视角、发展、影响、分析、对策、路径、中国、因素、背景等非核心词汇,选取排名前50位的核心词汇(见表1)。首先,除去“妇女”“贫困”“女性”高频率主题词搜索外,“农村”在标题中出现的次数最多,共出现145次,并且与之相关的“扶

贫”“脱贫”“地区”“乡村”“振兴”“留守”“攻坚”“脱贫致富”都属于此次文本分析中出现次数较多的高频词,这说明中共十八大以后的新时期,妇女反贫困的研究多集中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领域,与我国新时代的背景和政策息息相关,也进一步证实了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与农村相关的议题是妇女反贫困的重点实践地区。其次,“参与”一词出现了32次,“巾帼”出现了28次,妇女是脱贫攻坚的重点对象也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参与”“巾帼力量”“行动”等词汇高频率的出现是学界对新时代反贫困实践中妇女群体作出伟大贡献的高度肯定。再次,“家庭”作为核心词出现了26次,“社会”和“妇联”均出现25次,这说明新时代妇女反贫困事业的成功实践离不开家庭、社会以及妇联组织的支持,家庭、社会和妇联组织亦是研究新时代妇女反贫困关注的焦点。同时,教育是女性减贫的关键,十年来国家对妇女的就业和教育一直保持高度关注,女性通过接受教育,提升知识和技能水平,通过创业就业参与经济活动,摆脱贫困,在学术研究中,“就业”“小额信贷”“能力”“创业”“教育”等核心词汇也多次出现。此外,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是反贫困主战场,实施反贫困战略有利于实现民族共同繁荣,有利于提升民族地区自主发展动力,根据词频分析结果,学界对于新时代妇女反贫困实践的研究,将目光聚焦到了甘肃、贵州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最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老年妇女、旅游产业等与促进新时代妇女发展相关的服务和项目也是妇女反贫困实践研究关注的重点。

表1 2012—2021年妇女反贫困相关文献标题中高频核心词及词频表

序号	高频词	词频	序号	高频词	词频	序号	高频词	词频
1	妇女	310	18	少数民族	21	35	战略	10
2	贫困	189	19	助力	20	36	策略	10
3	农村	145	20	组织	17	37	行动	10
4	扶贫	103	21	小额	17	38	脱贫致富	10
5	脱贫	86	22	民族	17	39	教育	9
6	地区	60	23	政策	17	40	思考	9
7	乡村	51	24	调查	16	41	老年	9
8	振兴	34	25	实践	16	42	介入	9

(续表)

序号	高频词	词频	序号	高频词	词频	序号	高频词	词频
9	参与	32	26	现状	13	43	创新	9
10	巾帼	28	27	作用	13	44	经验	9
11	家庭	26	28	社会工作	13	45	机制	9
12	女性	26	29	多维	12	46	甘肃省	9
13	社会	25	30	信贷	12	47	旅游	9
14	妇联	25	31	项目	11	48	力量	9
15	留守	23	32	能力	11	49	贵州	9
16	攻坚	23	33	时代	11	50	救助	8
17	就业	22	34	创业	10	—		

通过对 398 篇相关文章的标题进行语义网络分析发现(见图 1),农村地区、扶贫脱贫、乡村振兴、家庭、留守是新时代妇女反贫困实践研究的热点议题。关于农村地区反贫困的研究集中在扶贫脱贫、家庭、留守妇女等方面,而对乡村振兴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妇女参与方面,其中不乏学者基于乡村振兴背景对妇女反贫困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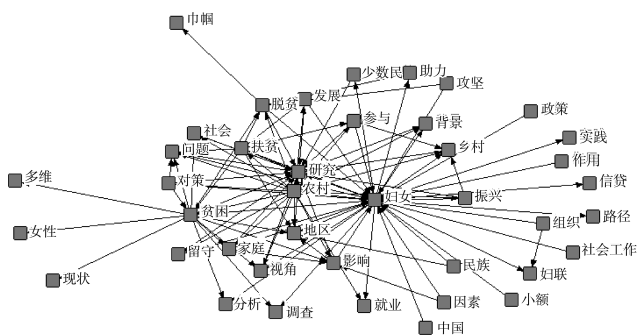


图 1 2012—2021 年妇女反贫困相关文献标题的语义网络图

(二) 研究领域分布

1. 农村妇女研究领域

对农村妇女反贫困的研究,学界关注的重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见图 2):一是扶贫脱贫,包括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脱贫攻坚、脱贫致富实践中的讨论,也包含了农村妇女就业、通过小额信贷项目创业、农村妇女教育方面的研究;二是对地区的研讨,将研究对象聚焦到少数民族地区以及河南、甘肃、贵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三是对农村妇女家庭的研究,包含社会性别、社会工作、留守妇女、老年妇女等研究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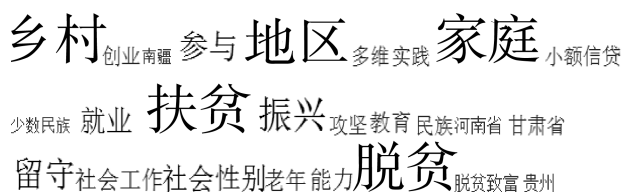


图 2 2012—2021 年农村妇女反贫困研究的可视化标签

2. 民族地区妇女研究领域

民族地区反贫困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民族地区妇女反贫困实践的研究也体现在三个方面(见图 3):一是地区,学界对于民族地区妇女反贫困的调查多集中在新疆、贵州、云南、宁夏、青海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农村贫困地区,探讨彝族、回族、苗族、藏族等民族地区妇女脱贫攻坚时期的独特实践;二是就业,依托少数民族特色文化手工艺品和旅游服务等第三产业发展,对民族地区妇女反贫困方面的研究既实现了少数民族妇女就业增收,也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弘扬、传承和发展,加强了各民族大团结;三是生计,受教育程度、饮食结构单一、发展意识淡薄、外出流动不稳定以及传统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妇女对外来扶贫主体的依赖性较强,以“维持型”生计为主保障家庭稳定增收,避免返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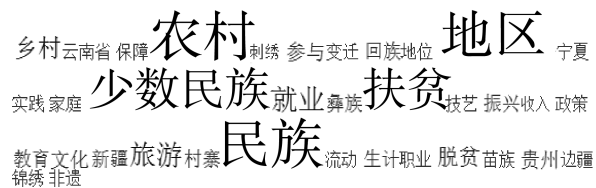


图 3 2012—2021 年民族地区妇女反贫困研究的可视化标签

3. 妇女参与研究领域

妇女反贫困实践中,对妇女参与领域的研究是近三年的热点议题,相关文献多集中在2020年和2021年,这与我国新时代的政策发展背景紧密相关。2020年脱贫攻坚战役取得全面胜利后,学界将妇女反贫困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帮助广大妇女群体减少相对贫困,促进新时代妇女全面发展上,提出了妇女参与、妇女赋能、妇女发展、女性参政等相关主题的研究(见图4),其中重点关注了妇女参与基层自治、妇女参与乡村旅游、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妇女权益保障等问题,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党建先行,加强妇女思想政治引领,积极探索妇女参与乡村振兴的减贫新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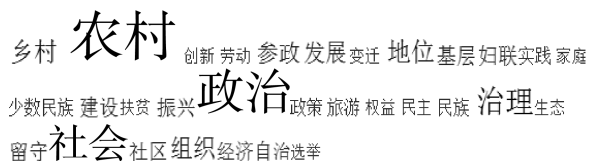


图4 2012—2021年妇女参与反贫困研究的可视化标签

三、主要研究结论

在2012—2021年妇女反贫困研究文献中,主要选取质量相对较高、代表性较强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通过对中国知网上可查阅的新时代妇女反贫困研究文献梳理后发现,学术界有大量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新时代妇女反贫困进行探究,研究的视角主要体现在妇女贫困与反贫困政策、妇女反贫困实践、少数民族妇女反贫困以及新时代妇女发展等,在一定程度上为新时代妇女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一) 基于妇女贫困与反贫困政策的视角

十八大以来,不少学者从妇女贫困与反贫困政策研究的不同方面对妇女贫困问题作出了详尽的探讨。霍萱和林闽钢从国际视野下的“女性贫困化”及其政策出发,分析导致“女性贫困化”的结构性因素,提出了缓解和应对的政策建议^[2]。赖力认为妇女贫困问题有其特殊性,妇女是反贫困政策的关键因素,以贵州省扶贫实践为例,从性别平等出发,提出妇女反贫困仍然面临诸多困境^[3]。聂常虹和王雷详细论述了妇女贫困的特征及成因,分析我国妇女扶贫的政策实践和国外女性扶贫的成功经验,进而针对我国妇女扶贫存在的困境提出对策建议^[4]。

高苏微、周常春等运用贫困代际传递、社会性别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三大理论针对妇女反贫困问题探讨女性致贫原因和脱贫办法^[5]。程玲认为妇女贫困与妇女的可行能力缺失有关,应当调节妇女反贫困政策以提升可行能力为目标从而改变妇女的贫困状况^[6]。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于妇女贫困与反贫困政策方面的研究从国际国内两个视野,基于社会性别、贫困代际转移等理论,详尽探讨女性致贫原因,妇女反贫困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强调反贫困政策中妇女的关键作用。

(二) 基于妇女反贫困实践的视角

蔡生菊认为贫困家庭能否顺利脱贫取决于妇女的脱贫程度,以贫困脆弱性为探析视角,基于甘肃省农村妇女的实证调查,考察贫困妇女现状和成因,并提出帮助妇女摆脱脆弱性贫困的未来路径^[7]。蒋国河、平卫英等通过发展性社会工作的理论,以江西省Y村妇女互助储金会为案例,总结农村反贫困实践中的不足^[8]。苏海从发展主义视角将贫困妇女的减贫大致分为被动卷入阶段、主动依附阶段与社会自觉阶段,阐述了农村妇女减贫的历程,总结中国农村女性减贫实践并提出了经验反思^[9]。姑丽布斯坦·阿布都卡地尔认为南疆Y村贫困妇女的反贫困实践有其特殊价值,剖析Y村妇女贫困产生的主要因素,对Y村贫困妇女的减贫脱贫路径进行探析^[10]。黄桂霞通过社区养老、就业及健康脱贫等带动妇女反贫困政策的实施,分析和探讨社会保障对妇女脱贫减贫的作用^[11]。王伊欢和任彤对近五年以来妇女反贫困实践取得的巨大成就进行了肯定,并对广大妇女在参与反贫困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提出了长效建议^[12]。综上所述,学者们选取特殊贫困地区作为调查研究对象,进行实地考察,对妇女反贫困现状、面临的挑战、未来的展望展开论述,学界针对妇女反贫困实践经验总结方面的文章较为缺乏,理论视角目前还比较单一。

(三) 基于民族地区妇女反贫困的视角

在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攻坚战役中,民族地区的贫困程度要高于我国的平均贫困水平,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和贫困人数占我国贫困地区和总贫困人数的一半多。部分学者洞悉了民族地区妇女反贫困工作的特殊性,针对民族地区妇女反贫困的研究作出讨论。顾永红等认为连片特困地区妇女反贫困有其脆

弱性,提出通过增进生计资本,提高妇女抵抗贫困风险的能力^[13]。杜亚男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妇女较男性有着天然的劣势,详细剖析了少数民族地区妇女的贫困特点以及妇女反贫困工作存在的问题,并从政府和非政府角度对少数民族地区妇女反贫困问题提出相应对策^[14]。赵丽娜认为扶贫先扶志,以延边州妇联扶贫实践为个案,提出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不仅要解决温饱问题更要解决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15]。李小云等以扶贫项目“瑶族妈妈的客房”为切入点,论述再造经济空间中的女性贡献^[16]。杨丹从民族志视角对贵州省猴儿关苗寨妇女群体反贫困实践进行探讨,直观分析民族地区妇女反贫困的措施与进路,透视出伴随一系列新的观念、政策或技术的引进,乡土社会将产生的连锁反应^[17]。钱宁和王肖静从苗族妇女的贫困现状出发,提出妇女赋权行动策略和妇女赋权过程中的困境,指明妇女反贫困政策和赋权路径的选择应当尊重主体的自主性^[18]。满丽萍选取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主战场红河州滇越边境的少数民族地区妇女作为调查研究对象,探讨如何在不脱离性别角色分工的同时引导少数民族妇女反贫困^[19]。通过梳理上述学者观点,由于地理位置、文化特点等因素,民族地区妇女反贫困有其特殊性,在长期的扶贫减贫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反贫困“巾帼”经验,笔者认为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发展新时期,民族地区妇女反贫困工作仍是减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四) 基于新时代妇女发展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妇女既是人类文明的开创者,也是推动社会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妇女解放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0月1日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指出,“妇女是人类文明的开创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在各行各业书写着不平凡的成就”^[20]。张波以“锦绣计划”为例,通过探索贵州妇女反贫困政策、品牌项目、产品提升、文化秉承等扶贫措施,总结妇女在脱贫攻坚中提升素质、促进就业的经验,以便实现新时代妇女的脱贫致富、创业增收^[21]。聂常虹等认为深入研究新时代妇女脱贫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乡村性别歧视、“数字鸿沟”、救助力量薄弱及扶贫性别意识的缺乏是当下妇女脱贫减贫存在的问题,并基于国际妇女脱

贫经验和我国实际案例依次给出建议^[22]。张丽宾认为在“十四五”及今后一个时期妇女发展可以通过就业创业等参与经济活动来消除性别歧视,促进女性人力资源发展^[23]。郑吉伟和李雪薇在建党百年之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解放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阐述了新时代妇女发展的时代意蕴^[24]。廖和平和朱有志提出新时代农村妇女应从改革开放时期的“半边天”作用向“超半效应”转变,认为新时代为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中发挥“超半效应”提供了时空条件和科学支撑,新时代妇女拥有更高的素质和能力^[25]。王旭和刘静姿阐述了习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妇女发展重要论述的科学理论内涵,并总结此系列论述的国际国内时代价值^[26]。综上所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妇女发展的政治保证,新时代妇女的减贫工作需要密切关注女性人力资源发展,注重提升妇女的素质和能力,让“半边天”拥有更多幸福感、获得感、成就感,促进新时代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

四、经验启示

基于新时代妇女反贫困研究现状和既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对于这方面研究的热点与我国的时代背景和政策环境息息相关,多集中在讨论农村妇女发展、妇女精准脱贫、民族地区妇女扶贫计划、妇女参与等领域,为了给广大理论研究者和基层实践者更好地展现近十年的研究成果,在未来研究和实践中合理把握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重难点,以及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阶段高效推动乡村治理,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了新时代妇女反贫困实践的经验启示。

(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为反贫困工作提供了力量源泉,脱贫攻坚的胜利体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在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新时代妇女反贫困事业首先要突出党的领导这个关键,坚定不移地保持攻坚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把脱贫攻坚作为最牵挂的一件大事,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妇女事业的发展,多次就发挥妇女作用、加强家庭建设、提高妇女发展能力等方面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27],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妇女发

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以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为基础,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脱贫机制体系,在未来乡村治理中发挥妇女的重要作用,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妇女反贫困实践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二) 妇女反贫困实践融入了性别意识

“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即将步入新时代,相继出台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均提出继续缓解妇女的贫困程度,组织动员妇女群体积极主动地开展并参与扶贫项目,提升妇女能力,增加收入来源。同时,《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政策和法律体系中^[28],进一步从政策、法律层面保障了贫困妇女权益。《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提出,“追求男女平等的事业是伟大的。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27]。学界研究成果大多是以社会性别为理论基础,充分发挥妇女的独特性,探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扶贫减贫过程中的生动实践,提倡提高妇女经济收入的同时,提升妇女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 多维介入的妇女精准脱贫

十八大以来,我国妇女减贫事业由开发式扶贫逐步过渡到精准脱贫阶段。2015年《全国妇联关于在脱贫攻坚战中开展“巾帼脱贫行动”的意见》提出要在妇女脱贫减贫实践过程中,通过扶贫扶智、技能培训、小额信贷、能人带领、两癌救助等方式,提升妇女扶贫的精准力度^[29]。学者们对于妇女反贫困问题的研究从政策呼吁走向行动实践,倡导建立全社会关爱妇女发展体系,让妇女群体脱贫更加精准。针对不同地区的贫困妇女分类施策,学者们采用案例研究的方式展开讨论。对于尚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学者们纷纷探讨如何提高她们的脱贫能力和内生发展动力,调研的重点有针对性地聚焦在种养殖业、手工艺品编织、乡村旅游、家政服务、农村电商等妇女培训项目;对于缺少劳动能力的老年及患病贫困妇女,学界的讨论侧重在做好社会保障和反贫困政策的有效衔接上。同时,倡议充分发挥企业、社会组织在人才智力扶贫上的优势,搭建“妇联+企业+巾帼扶贫车间”的社会支持网络,强调妇联组织积极带头参与的重要意义。

(四) 农村贫困妇女是推动农村减贫和实现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

目前农村“空心化”和“三留守”的现象依然衍生出很多社会问题,绝对贫困虽已全面消除,但在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农村贫困和留守妇女的积极参与,依旧可以成为再现乡村活力,促进家庭和谐,推动乡村治理有效的主要驱动力。但要实现这一目标,推动农村妇女的长远发展,学界在理论上明确以下议题。一是妇女既是脱贫攻坚的受益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新时代妇女扶贫减贫工作应将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将用心用力帮扶与调动妇女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结合起来,组织动员广大妇女奋力投身乡村建设一线^[30]。二是探讨如何协调妇女主体意识和外部力量的合理衔接关系,积极响应国家扶贫减贫、共同富裕的号召,实现包括广大妇女在内的共同富裕,坚持包容发展,共建发展,共享发展,平等发展的政策要求,推动多主体参与的农村减贫格局,这需要妇女的主动参与。农村贫困妇女的减贫实践和经验,是推动农村减贫和乡村振兴的独特“财富”,也是发展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理论研究的内容之一,值得广大学者们为之呼吁和行动。

(五) 妇女减贫需要提高妇女的发展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妇女事业,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方向性引领性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妇女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因此,新时代对于妇女发展方面的文献研究多集中在讨论习近平关于妇女发展的重要论述上;此外,研究如何将现代化的扶贫技术和社区既有资源相协调也是新时代妇女反贫困实践中促进妇女发展的焦点议题。受家庭影响,绝大多数贫困妇女的生活空间依旧以本社区为主。各种扶贫计划和项目仍要依托社区开展,挖掘社区内部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本,在基层帮助妇女创造更多就近就业的机会,提升妇女发展的主体性和内生动力。

五、结语

当前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全面的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发挥妇女重要作用,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总结新时代以来中国妇女反贫困实践历程和经验具

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已有的丰富研究成果看,妇女不脱贫,人类就不可能消除贫困,新时代妇女在中国特色减贫实践中,“半边天”作用充分彰显,促进了扶贫减贫工作由“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极大激发了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中国妇女减贫脱贫的经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笔者认为研究新时代妇女后续的相对贫困问题,一定要基于政策分析,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继续融入性别意识,注重女性减贫的过程,关注农村妇女发展,在特色种植、乡村旅游、手工编织、电子商务、家政服务等多样化就业创业项目中增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减贫发展的包容性和公平性。实现性别平等,治理相对贫困问题,任重而道远。

妇女贫困本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社会现实,妇女反贫困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孕育、生长乃至蔓延的土壤依靠党建引领、社会支持、学界的努力,特别是女性精神的独立自主,在新时代反贫困实践中,妇女逐步走出传统思维的桎梏,摆脱生存困境与文化边缘化的境遇^[31],不断追求美好生活。妇女群体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主体,学界对妇女扶贫减贫工作的研究集中于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以社会性别理论为基础,对单一视角下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妇女进行案例研究,针对后脱贫时代总结妇女本土化反贫困实践经验的文章相对较少。在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减贫道路上,呼吁广大理论研究者与实践工作者持续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反贫困事业,总结中国特色妇女减贫实践经验,尤其在研究本土化的角度、跨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吸纳更多的理论基础,拓展更多的研究方法,为后脱贫时期贫困治理问题提供丰富的巾帼经验和理论参考,推进新时代妇女研究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J]. 农村工作通讯, 2021(8): 12-28.
- [2] 霍莹, 林闽钢. 为什么贫困有一张女性的面孔——国际视野下的“贫困女性化”及其政策[J]. 社会保障研究, 2015(4): 99-104.
- [3] 赖力. 精准扶贫与妇女反贫困: 政策实践及其困境——基于贵州省的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6): 20-26+148-149.
- [4] 聂常虹, 王雷. 我国贫困妇女脱贫问题政策研究[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9(1): 51-59.
- [5] 高苏微, 周常春, 杨光明. 不同视角下妇女反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进展[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19(2): 54-60.
- [6] 程玲. 可行能力视角下农村妇女的反贫困政策调适[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9, (2): 163-169+223.
- [7] 蔡生菊. 脆弱性贫困与农村妇女贫困问题——基于甘肃省的实证调查[J].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 2017(1): 99-103.
- [8] 蒋国河, 平卫英, 孙萍. 发展性社会工作视角下的农村反贫困实践——W县Y村妇女互助储金会的案例分析[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8(6): 94-103.
- [9] 苏海. 中国农村贫困女性的减贫历程与经验反思[J]. 云南社会科学, 2019(6): 151-157.
- [10] 姑丽布斯坦·阿布都卡地尔. 农村妇女贫困原因及其脱贫路径探析——以S县Y村为例[J]. 山西农经, 2020(1): 32-33.
- [11] 黄桂霞. 中国社会保障缓解妇女贫困的经验与挑战[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20(6): 63-71.
- [12] 王伊欢, 任彤. 消除贫困 加速妇女参与反贫困进程——对近五年中国妇女参与反贫困进程的评估[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21(1): 11-21.
- [13] 顾永红, 向德平, 胡振光.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连片特困地区妇女贫困研究[J]. 江汉论坛, 2014(6): 136-140.
- [14] 杜亚男. 浅析中国少数民族妇女反贫困问题及对策[J]. 改革与开放, 2014(12): 48-49.
- [15] 赵丽娜. 精准扶贫: 点亮民族地区贫困妇女的心灯——以延边州妇联扶贫实践为个案[J]. 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4): 46-48.
- [16] 李小云, 陈邦炼, 宋海燕, 董强. “妇女贫困”路径的减贫溢出与赋权异化——一个少数民族

- 妇女扶贫实践的发展学观察[J]. 妇女研究论丛, 2019(2): 5-16.
- [17] 杨丹. 民族地区妇女反贫困实践透视——基于贵州省猴儿关苗寨的调查[J].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9(6): 32-35.
- [18] 钱宁, 王肖静. 主体性赋权策略下的少数民族地区妇女扶贫研究——以云南省三个苗族村寨为例[J]. 社会工作, 2020(2): 10-22+108.
- [19] 满丽萍. 社会性别视角下滇越边境少数民族妇女反贫困实证分析——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为例[J]. 红河学院学报, 2020(3): 28-33.
- [20] 叶静漪. 促进全球妇女事业发展的中国方案——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联大纪念北京世妇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重要讲话精神(四)[N]. 中国妇女报, 2021-04-13(06).
- [21] 张波. 新时代贵州妇女特色手工业的发展、探索与启示——以锦绣计划为例[J]. 贵州民族研究, 2019(3): 70-74.
- [22] 聂常虹, 陈彤, 王焕刚, 等. 新时代我国妇女脱贫问题研究[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0(10): 1282-1289.
- [23] 张丽宾. “十四五”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妇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及下一步工作的目标任务——从保障妇女经济权利的角度[J]. 妇女研究论丛, 2020(6): 5-7.
- [24] 郑吉伟, 李雪薇. 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解放的历史经验与时代意蕴[J].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21(6): 16-24.
- [25] 廖和平, 朱有志. 试论新时期与新时代农村妇女的“超半效应”[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2): 43-50.
- [26] 王旭, 刘静姿.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发展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研究[J].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5): 1-5.
- [27] 中国政府网.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EB/OL]. (2021-09-27)[2022-04-10]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9/27/content_5639412.htm.
- [28] 中国政府网.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EB/OL]. (2011-08-08)[2022-04-10] http://www.gov.cn/zwgk/2011-08/08/content_1920457.htm.
- [29] 全国妇联关于在脱贫攻坚战中开展“巾帼脱贫行动”的意见[J]. 中国妇运, 2016(1): 5-7.
- [30] 中共全国妇联党组. 新时代妇女扶贫减贫的中国经验[J]. 求是, 2020(24): 42-48.
- [31] 王婧. 边缘与困境中的女性——妇女贫困问题的社会与文化分析[J]. 妇女研究论丛, 2003(S1): 50-54.

(责任编辑:文 华)

(校 对:江 南)

论政府失信行为的界定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视角^{*}

孙铭杰

[摘要] 政务诚信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优化营商环境最为重要的因素。当前,各地政务诚信建设虽已迈开步伐,但对诚信与信用仍存在法理上的深层次误解,政务诚信建设与依法治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之间的矛盾与纠结关系也日益突出。以政务诚信治理政府失信行为的思路不仅违背了信用的本质,混淆了违法与失信的关系,并且使得政府介入市场信用体系过大,无法反映并实际制约政府信用本身。鉴于此,为更好地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发挥信用治理的功效,建议从主体要素、意思要素、内容要素、结果要素四要素出发,重新界定政府失信行为。

[关键词] 政务诚信;政府失信;法治政府;营商环境

[中图分类号] D9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071(2023)01-0062-08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必须要扎实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和公信力,而政务诚信建设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制度安排。如何让政府作用更好发挥,提升政府公信力,进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已经成为新时代推动政府发展的重要任务^①。毋庸置疑,营商环境的实质是政商环境。因此,培育政务诚信观念,防范和治理政府失信行为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所在。自2016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以来,各省级政府信用条例都制定了相应“政务诚信”条款,上海、江苏、广东等省市更是出台了地方政府政务诚信的评价方案,并通过编制“政务信用信息目录”“政务诚信清单”等方式有效遏制了政务失信行为,初步形成了政务诚信建设的经验,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②。

然而,政务诚信建设最重要问题是,如何识别政

务失信行为以及确定政务失信的范围,只有明确了政务失信行为的概念,准确划定失信范围,才可以有效编制政务失信记录,提升政府公信力,进而优化营商环境。遗憾的是,纵观当前全国各地已经出台的信用条例,均未对什么是“政务失信”这一基本法律概念作出解释,实践中已有的“政务诚信目录”“政务诚信清单”大都是通过“列举式”的方法说明政务诚信的考核范围^③,并无明确政务诚信的评价标准,无法适应对政府信用的动态监管需要。

在理论层面,政务诚信与依法治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之间的矛盾与纠结关系也日益突出。沈岿教授就指出,与社会信用体系同步进行的依法治国建设并不成熟完善,许多名为提高诚信的失信惩戒措施实为加强法律实施之意,并且政府的自我“信用评价”在理论上和逻辑上都难以自洽^[1]。王伟教授也认为,公权力主体的信用是社会信用建设的基础和核心,因而建议“折中”立法模式,重点调整私主体的信用问题,适度衔接公权力主体信用,仅在诚信

* [收稿日期] 2022-08-26

[作者简介] 孙铭杰,东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211189。

价值观层面进行原则性规定^[2]。

可是,政务诚信并非价值观之道德约束,随着现代公私合作模式的不断加深,公权力主体的私行为日常活跃,特别是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要求之下,其履约信用状态不应排除在社会信用监管之外。当前的问题在于,信用信息的界定和划分仍未得出一致结论,虽然从目前的实践来看,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所采用的是广义信用的概念,即公民的守法行为与履约行为都属于信用行为,若有违法违约者都将承担失信责任甚至面临信用惩戒^④。对此,已有不少国内外学者对这种扩张的信用治理模式提出疑问,认为这种无视法律中心主义的“一切的声誉工程”注定失败^[3]。进而言之,那种试图将政府一切守法或履约行为的数据和信息纳入政务诚信评价体系的尝试不尽合理,并很可能造成依法治国建设与社会信用建设的重叠、混乱、反复。可喜的是,已有学者提出用“拆分法”界定信用信息,割裂“诚信”和“信用”,创立各自独立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4],让诚信的归诚信,信用的归信用,如此方能框定政府诚信和政府信用的范围。

职是之故,笔者将尝试从“诚信”和“信用”的内涵、外延出发,厘清政务诚信和政府信用之间的关系,消除诚信、违法、信用之间的误解,并从优化营商环境的视角出发,重新界定政府失信行为。

二、政府诚信与政府信用关系之厘定

“诚信”与“信用”本就是一对渊源颇深的概念,重“信”观念更是由来已久。诚实守信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故有“诚信者天下之结也”“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等至理名言。由此可见,古代中国“信”字内涵十分丰富,既可以表现人的诚善无欺,也可以表示人讲信用、守信义,即诚信与信用并无明显区分使用。在西方,“信”字观念最早源于古希腊,起初就与经济活动相伴并奠定了西方契约诚信精神的基础。随后,“信”字含义在宗教改革中逐渐增添了道德色彩,并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催生出了近代信用概念^[5]。总而言之,中西方的“信”字内涵都随着时代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其最终结果就是达到对人、事甚至国家“信任”的状态。卢曼也认为,哪里有信任,哪里就有不断增加的经验和行为,因为信任构成了复杂性简化的有效形式,但随着社会复杂性的增加,信任必须被扩展,成为一种新形式

的系统信任^{[6]4-36}。所以笔者以为,在这一新信任系统内,必须发挥不同机制的作用将信任分为“诚信”和“信用”两个独立的子系统。简言之,在政府信任系统内,信任体系就可以扩展为政府诚信与政府信用两个层面。以下,笔者将尝试比较这两个“信任系统”。

(一)“信”字内涵不同

在政务诚信的概念提出之前,学界也已经围绕“政府诚信”“政府信用”的概念进行了探讨,并基本将前者视为政府的政治道德^⑤,后者则更侧重政府的客观履约行为^⑥,因此,“诚信”与“信用”在“信”字内涵上存在根本差别。诚信之“信”(honesty)以诚为基础,是忠诚、诚实、诚恳等道德品质的延伸,只有在交往行为中具备了这些美德,才能让他人信服,而没有了前者的道德凭证,也就无任何信任可言。信用之“信”(credit)则属于经济范畴,是一种以偿还为条件的特殊价值运动,本身并不需要以道德品质为支撑,只需要通过借贷、消费、交易状况就可以达到对他人的信任状态。申言之,诚信与信用均可以达到信任状态,只不过“信”字内在衍生机制不同。具体而言,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诚信是情感之信,信用是数据之信。

诚信之“信”由情感引发,而信用之“信”则由数据评价产生。在过去的农耕文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简单,道德情感之于信任非常重要。此时的信任并不依赖特定的个人利益与背景,不会因为相关特殊事件的出现而打破对一个熟悉的人的信任^{[6]4-36},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往往能够织牢社会的信任网络。但由于社会复杂性的增加,这种来源于内心情感的“信”无法显示陌生人道德水平的高低,无法公正衡量每一个人的行为决定,因此信任的基础必须发生改变。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们通过各类数据建立起了普遍联系,源于数据的“信”不仅能够量化各类交往行为,也使得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能够准确判断对方信用、捕捉利益。

第二,诚信是人格之信,信用是制度之信。

诚信以“人格”为基础,反映私人领域的人际信任,而信用则以“制度”为基础,属于公共领域的契约信任^{[7]59-64},人格信任往往通过血缘、家族、品行逐渐形成,并且往往范围较小,是人们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信任。制度信任则是通过法律条款和约束机制

形成的抽象系统信任^{[7]59-64}。人格信任基本只反映人际关系,只追求在他人的内心得到认可,而制度信任则是为了促成契约之达成,不反映契约双方的人际关系。在人治社会,以人格为基础的诚信是统治者重要的德治手段,而法治的本质——契约,则构成了法治社会公共信用的法理基础^{[8]206}。

第三,诚信是简单之信,信用是系统之信。

诚信之“信”是生成机制较为简单的信任,信用之“信”是运行规则较为复杂的系统信任,这也是传统信任与现代信任的重要区分。简单之“信”由内心生成,只要内心感受到对方的忠诚就会对其产生信任,但随着社会市场的扩张,这种感性的“信”很容易受到经济行为的侵蚀,极易变化、消失。此时,为了与扩张的市场相抗争,社会必须开展自我保护运动,产生出各种规范和制度安排^{[9]5-8}。系统信任的生成不仅来自合法权威与专业知识体系,并且在法律的保障之下,信用制度更加稳定、坚固^{[9]5-8}。

如上所述,政府诚信之“信”来源于情感与人格,是传统社会的简单信任机制,而政府信用之“信”则源于数据与契约,是现代社会的系统信任体系。

(二)“信”字外延不同

信任从传统走向现代不仅经历了内涵演变,“信”字外延也在不断变化。无论是“诚信”还是“信用”都随着时代变迁逐渐扩大自身范围,并在不同领域呈现出交叉、重合关系。但无论如何,作为信任的两种形成路径,两者外延仍存在差距,具体如下:

首先,狭义诚信与狭义信用的评价对象不同。狭义诚信以人的价值观为基础,评价的对象始终是人,聚焦的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的行为与品格,由此决定是否与之往来,主观性色彩较为浓厚。但是,狭义信用以商品货币关系为基础,其不局限于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反映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各类经济实物、虚拟财产、信息数据开始成为信用凭证,信任评价体系更具有客观性^[10]。

其次,广义诚信的范畴大于广义信用的范畴。广义诚信包括信用,信用是一种特定的诚信,强调的是守约重诺^{[11]3-4}。尽管,当前的信用已逐渐从金融领域的“狭义信用”向“广义信用”范畴延伸,一切与约定、规定、承诺、事业、契约、誓言等有关的规范要求和品行都属于信用范畴^[2]。但广义诚信也已经

发展成为一个成己、成人、成物的综合性概念,不仅表现为对人意志的真诚、对他人对己的信任,也表现为对神灵的虔诚、对天地之道的遵守、对自然界的求真^{[12]24}。虽然,广义信用已展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并有吸附“诚信”之意,但总体而言,广义诚信无疑可囊括信用的各类范畴。

最后,诚信与信用的期待层次不同。信任指的是对某人期待的信心^{[6]4-36},期待也被看作社会中相互作用的基本要素和成分,是行动者选择在理性上有效,在情感上和道德上适宜的活动和反应时归属于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那些意义^{[13]11}。诚信与信用期待的不同在于,诚信侧重于对自身或他人道德的单方期待,我们既无法从自身的诚信折射出对方的道德状态,也无法从一个诚信的人身上反映自身状态。信用则不然,它是一种双向期待,期望相互作用的另一方履行其信用义务和责任,即在一定情况下把他人利益摆在自己利益之上的义务^{[13]11}。因此,诚信仅停留在对他人合乎道德的行为期待,信用已经上升到了对信用义务和信用责任的期待。

如上所述,从广义上看,政府诚信的范畴虽大于政府信用的范畴,但政府信用的期待层次更高,已经从道德信赖提升至信用责任的期待。

(三)“信”字定位不同

奥拓·迈耶指出,“行政在最概括的意义上是指国家为实现其目的而进行的活动。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我们就必须使行政行为有利于目的的实现而不是有悖于目的的实现”^{[14]1}。由于诚信与信用的内涵、外延均不相同,“信”字功能有别,政府诚信与政府信用建设的目的定位也不尽相同,故而,两者应依遵不同的目的铺开建设。

早些年,已有学者提出将诚信与法治相结合,以诚信指引法治,以法治保障诚信,规范行政行为,推进诚信的法治政府建设^[15]。从法理上看,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融法的理念相契合;从实践上看,在司法领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融入裁判文书的释法和说理之中。因此,在政府的法治建设中,诚信价值观应体现在政府各种治理活动中,是塑造法治政府的灵魂^[16]。与诚信不同,信用并非价值观念之内部约束,政府信用建设实为提升政府的公信力,通过权威性、可量化、可公开的信息来表征政府的信用状

态^[17]。政府信用水平的提升不能仅靠诚信,还必须发挥“信用”这一特殊工具,使得政府的信用时时处于监督之下。现实中,不少失信政府已经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8],这说明司法机关正在发挥信用监管工具的驱动功能倒逼地方政府守诺践行。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治理政府失信行为,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综上所述,政府诚信建设是实现法治政府的重要路径,而切实改善营商环境、提高政府信用水平,则需要发挥信用的特殊功效。所以笔者以为,政府诚信应侧重于法治政府建设,而政府信用应服务于营商环境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两者既可以相互独立,也相辅相成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

三、以诚信制度治理政府失信行为的误区

自《指导意见》颁布以来,各地纷纷制定《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实施方案》用以指导地方政务诚信工作,整治政府失信行为。各级人民政府基本都将依法行政、政务公开、勤政高效等作为政务诚信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以此提升政府的诚信行政水平^①。由此引发的困惑是,这些与“信用”并无关联的事项能否真实提升政府信用水平,以及持续优化和改善营商环境,这是需要进一步解释和澄清的问题。

(一) 以诚信代替信用

政务诚信这一概念明确提出是在2006年党的十六中全会上,其目的是增强全社会诚信意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19]33}。随后,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要加强政务、商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不难发现,“政务诚信”一词最初并不是为了增强政府信用目的而设,更为明显地带有道德观念、诚信教育的属性。直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的出台,政务诚信终于被视为我国四大信用体系建设之首。由于并非专为信用而创立的专门术语,政务诚信明显溢出了信用规制的功能,并被视为政务主体在履职过程中表现出的信任关系的总和^[20],即包括政府的依法行政、道德义务、诚信履约三个层面。这种大诚信观不仅容易掩盖信用的本质,并且无法从根本上遏制失信行为。这是因为,诚信的概念大于但不等于信用的概念,政府违背诚信的行为不一定是失信行为,违背诚信后承担的责

任也往往不是信用责任。当前,我们仍旧把政务诚信与失信问题简单地等同于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不作为、渎职,抑或是单纯的道德缺陷,却没有回归到制度化与法治化的信用体系轨道中予以考量^[21]。申言之,当前的政务失信者并未真正感受到信用责任的重量。如果政务失信人员每一次的失信结果只是诚信教育、道德减损、批评曝光,而无法触及信用责任的实质“惩戒到人”的话,那么,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就会陷入“失信怪圈”,营商环境将无法彻底改善。

(二) 将违法视为失信

什么是失信?如前所述,信用在实践中已经被认定为是一种履行法定或约定义务的状态,那么,违背法定或约定义务就属于失信行为,此处的法定即为法律规定的义务,也即将违法行为视为失信行为,并且这一定义已被各地的信用立法纷纷采纳。譬如,《指导意见》就将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务员在履职过程中,因违法违规被司法判决、行政处罚、纪律处分、问责处理等信息纳入政务失信记录。由此可知,政府违法已经成为政府失信的一部分,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违法行为的信用化是否会造成信用范围的无限泛化,甚至有可能混淆信用责任与法律责任的关系,以信用责任代替法律责任?

信用与法律其实是分离而独立运行的两大系统,法律与信用相互作用^{[11]3-4}。一方面,信用约束机制也有力所不及之处,此时仍需要发挥法律的制裁作用;另一方面,也并非一切的信用行为都需要依靠法律监管,市场和社会自发的声誉机制往往能够实现更优治理^[22]。这如同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过分强调道德的重要性,把它变得同法律一样威严,不可侵犯,其结果是消灭了道德,也磨平了人们的道德意识^{[23]14}。因此,信用与法律是两种社会评价机制,失信行为并不都是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也并非全是失信行为,两者可以适度扩展但是不可过分偏重任何一方。

自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以后,全国各地开始清理失信约束措施,防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泛化。这意味着,失信惩戒将依法依规进行,这既是对过度偏袒、依赖信用机制的反思,使得信用在法律制度的保障下有效运转。同时,这也

进一步证明了不可将政府违法行为全部归于失信行为,否则将会导致信用或法律体系的崩溃。

(三) 混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

从《指导意见》的内容来看,政务诚信建设的目的并非单纯提高政府信用水平,政务诚信建设似乎只是起到引领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健全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建立和完善市场信用体系。在市场自身发育还未成熟,即“弱市场—强政府”模式下,市场信用监管机制的运行必须依赖政府职能,并在信用制度供给、失信惩戒执行、信用信息维护等方面予以强制力保障才能促进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对信用监管制度的认同,让信用监管真正发挥作用^[24]。因此,在市场信用体系建立的过程中,政府不仅需要为市场提供制度和信息支撑,还要同时注意不能介入过深,干扰市场信用体系的自身运转。当前,政府失信行为屡屡发生的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没有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随意介入私权领域^[25],而后又不依遵信用规则,甚至破坏市场信用秩序,从而导致市场信用监管机制的失灵。

质言之,在当前政务诚信建设的框架下,政府既要促进市场信用体系的完善又要实现自身信用,难度很大。为此,必须转变思路,缩小政府信用的规制范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政府不仅具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和治理能力,能够及时应对市场失灵,市场也具备完善的结构体系和运行机制,能够胜任资源配置的角色,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经进入“强政府—强市场”模式^[26]。在此背景下,政府应当从诚信大框架退缩至有限的“政府信用”范畴,让市场信用机制发挥自治作用,不盲目介入市场,同时找准自身信用的位置和范围,当市场自身无法满足需求时,仍应当积极履行职责^[27]。那么此时,政府信用就被定位在有限政府的角色之下,市场主体同意与政府订立契约,允许政府在既定的契约范围之内进入市场。同时,为了保障市场内信用主体的权利,市场主体甘愿放弃一部分失信惩戒权交由政府行使,但政府在行使该权力的同时,也必须遵守契约规则,一旦损害了契约任何一方的利益,必须受到市场信用机制的惩罚。

综合上述,政府介入市场的权力起源于契约和协议,以及构成契约任何一方的同意^[28]⁷⁰,而当前政

务诚信的建设思路使得政府介入市场过大,无法反映并实际制约政府信用。

四、优化营商环境视角下的政府失信行为再界定

如前所述,政府信用已经从诚信中汲取养分,真正发展为契约信用。政府作为契约关系人,其所做出的决策都是理性的,都应该为自己的缔约决策风险负责。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明确并约束政府失信行为,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开展经营活动,笔者将从主体要素、意思要素、内容要素、结果要素出发,尝试界定政府失信的构成要素。

(一) 主体要素

政府失信主体看似明确,实则是在司法解释与实践操作中十分犹豫和徘徊。从最高法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2015)》(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来看,政府机关可以被视为“单位”,那么如果政府失信后,依据《若干规定》第3条第2款,政府机关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都将被视为失信人员,并被限制高消费。但是,2019年最高法又出台《关于将政府机构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将政府机构纳入失信名单的需实施备案制度,并且政府失信主体范围仅限于各级地方政府,不包括各级部门、事业单位、村居委员等。因此,从法律层面看,在无其他法律法规对政府失信主体做出规定和限制的情况下,依据《通知》的规定,政府失信的主体只能是各级地方政府。然而,笔者通过失信被执行人网站查询发现,不少地方的政府招待处、街道办、基建办公室、村委会却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之列^⑧。此外,由于《民法典》已经赋予了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村委会、居委会特别法人之地位^⑨,这些主体均可以从事民事活动,参与交易行为。所以,笔者以为,政府失信的主体不应当仅限于地方各级政府,还应当扩大至各级机构和村委会、居委会。当然,当前政府官员失信的现象也非常普遍,治理政府失信最重要的就是治理官员失信,政府失信的主体更应该从机构延伸至主要负责人,将失信公职人员纳入政府失信主体。

(二) 意思要素

在信用契约中,行政机关放弃了原有的行政主

体地位,而是以平等民事主体参与其中,契约之达成必须经过双方协商,意思表示一致。契约意味着守信践诺,意味着义务与责任,当事人都必须遵守^[29]。所以说,信用契约的存在是政府失信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了契约承诺,信用责任、失信惩戒也无法谈起。一直以来,地方失信惩戒立法就忽视了信用的意思要素。譬如,有的地方将在公共场所吸烟等不文明行为纳入信用档案^[30],某地甚至将志愿服务纳入社会信用体系^⑩,这些都误解了信用的真实本意。刘松山教授也认为“失信应当以一对一的具体允诺和约定为前提,没有具体的允诺就谈不上失信”^[31]。同理,政府失信的对象也应当是经过意思表示并存在契约关系的当事人,缺乏契约基础的不确定个体不是失信对象,是普遍性社会利益,属于法律调整范畴^[31]。当然,政府与当事人经协商一致也可以变更和解除信用契约,此时将不再发生失信行为。

(三) 内容要素

当前政务诚信建设的重点领域内容与政府信用契约的内容存在重合,并且部分行政协议契约也应当属于政府信用契约范畴。首先,政府的信用契约与行政协议不同,前者是一种特殊的市场交易行为,是民事行为,而后者属于行政行为,仍然是一种行政权的行使方式,不具有市场行为性^[32]。因此,笔者以为,在信用契约中,政府并无优益权,即使要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也是一种正常的契约当事人的权利,是基于合同双方的变更和解除权^⑪。所以说,政府失信违背契约,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义务,不享有豁免权。从当前行政协议的范围来看,确实存在将部分民事信用契约纳入的情形。王利明教授就指出“矿业权等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协议,政府投资的保障性住房的租赁、买卖等协议,并没有超出民事合同的范畴,其在性质上仍然属于民事合同”^[32]。笔者赞成此观点,因为即使这些合同契约存在公益目的,契约的履行依旧遵循价值规律,因此,有必要将其纳入信用契约的范畴,予以信用规制。一味强调政府的行政管理目标或者是行政优益权只会为行政机关的失信找借口,不利于政府的信用建设。其次,政务诚信建设重点领域的内容也实际属于政府信用范畴。《指导意见》将政务诚信的重点领域划定在政府采购、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招投标、招商引资、政府债务等领域。这些都是政府作为民事主

体与其他主体签订的民商事合同,合同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都遵循市场规律,权利义务呈现对等性^[33]。此外,这些重点领域内容也并未被列为行政协议的范围^⑫,依旧属于民事合同,并且已经有较为成熟的民商事法律法规^⑬,因而也不属于行政协议的内容范畴。

(四) 结果要素

随着《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的出台,政务诚信建设的目的和定位再次被明确,即“健全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促进行政权力规范透明运行”。归根结底,加快推进政务诚信建设的目的是最终实现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虽然,法治政府建设的好坏有可能影响到政府的信用水平,政务失信的风险会居高不下,但是这一过程中政府的守信行为,都是为了完成行政管理的职责,通过更加高效、有为的治理,为人们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从而不断改进人民群众对自身工作的评价与信任感。因此,这依然属于“诚信”价值观的范畴,没有触及“信用”的本质即契约。即使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职过程中存在违法、失职行为,侵犯了公民的权利,降低了人们对其信任的评价,妨碍了诚信队伍建设和依法行政建设,但是这并不能降低政府机关在市场交易中的信用水平,并不能反映其履约状态的好坏,并不会阻碍政府的信用建设,甚至妨碍营商环境。当然,我们亦不能对政府机关的各种违法行为进行失信惩戒,或者将其作为失信被执行人公开,只要这些行为不涉及真实信用,不侵犯社会其他主体的信用利益,这些违法行为都有其他更好的惩戒手段,如违法责任、党纪责任、政务处分等,并非一定要纳入信用惩戒的范围之内。

五、结语

“诚信”与“信用”虽和而不同,但都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工具,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和界限也亟待厘清论证,并构建起切实可行的不同制度安排。当前,营商环境优化和政务诚信建设、法治政府建设同步展开。无疑,法治政府建设可以为政务诚信建设保驾护航,但是政务诚信建设特别是优化营商环境的目标更加需要发挥“信用”的本质功效,在信用框架下实现政府信用法治化,而非法治政府诚信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前提是准确识别市

场经济活动中的政府失信行为,基于前文分析,笔者将政府失信构成标准总结如下:

第一,政府失信的主体是政府机关及其法定代表人。政府机关可以延伸至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管理机构,村委会、居委会,法定代表人可以延伸至主要负责人、主要履职人员,但是一般公职人员不应被视为政府失信行为的主体。第二,政府失信应当与相对人存在意思表示,并且以侵犯单个(集体)信赖利益为标准,而不能延伸至面向所有公民的违法行为。第三,政府失信的内容应限定在民事合同内,如一般政府采购合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合同、房屋租赁合同、招商引资合同、债务合同、招投标合同、用工合同等等,其实质是政府作为平等民事主体与其他市场主体进行的市场交易行为。第四,政府失信的后果是降低了市场经济中的信用度,破坏了市场信用秩序。只有违反信用契约,侵害他人信用利益的行为才是真实的失信行为。最后,政府失信行为必须同时满足以上四个要素,不能仅凭单一要素判断。

注释:

-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 ② 上海市发改委要求各单位编制政务诚信“三清单”;苏州编制并发布《政务信用信息归集目录(试行)》;广东佛山市政府办公室编制了《政务诚信征信目录》等。
- ③ 如《佛山市市直机关单位政务诚信征信目录(试行)》将机关单位的政务诚信分为政务决策、执行、监督诚信和社会治理诚信四个方面;《佛山市市直公务人员政务诚信征信目录(试行)》也将公务人员的诚信分为严守法纪、勤勉尽责、审慎用权、廉洁正直、崇德守信五个层面,并将领导干部的诚信分为正确决策、恪尽职守、严格监管、防治滥权四个层面。
- ④ 从当前我国各省级政府出台的信用条例来看,基本都将“社会信用”定义为履行法定或约定义务的状态。
- ⑤ 参见刘松山:《论政府诚信》,《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杨海坤:《论政府诚信》,《广州大学学报》

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1期;陈翠玉:《政府诚信立法论纲》,《法学评论》2018年第5期。

- ⑥ 参见张鸣:《地方政府信用的内涵、结构要素及实际测量度》,《探索》2013年第4期;于新循,付贤禹:《从自律走向他律:我国政府信用的法制化探索》,《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2期;范柏乃,张骞,喻晓:《我国地方政府信用的法律体系建设研究》,《行政与法》2008年第7期。
- ⑦ 《指导意见》将政务诚信的指导原则分为了依法行政、政务公开、勤政高效、守信践诺、失信惩戒五个部分,各地的实施方案也基本效仿。
- ⑧ 例如,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政府松龄路街道办事处、沧州市人民政府招待处、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基建办公室、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政府水南街道罗源村民居委员会等等,数据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8月18日。
- ⑨ 参见《民法典》第97、101条。
- ⑩ 参见《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修订草案)》第32条。
- ⑪ 参见《民法典》合同编,第543、562、563条。
- ⑫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政府采购合同、招投标合同、招商引资合同、政府债务合同均未列入,第2条第5项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合同也仅指符合政府特区经营领域的政府与资本合作协议,其余绝大部分政府与资本合作协议均为民事合同。
- ⑬ 例如《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民法典》等等。

参考文献:

- [1] 沈岿.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法治之道[J]. 中国法学,2019(5):27-34.
- [2] 王伟. 论社会信用法的立法模式选择[J]. 中国法学,2021(1):234-235.
- [3] Dai Xin. Toward a Reputation State: The Social Credit System Project of China. [DB/OL]. (2018-06-10) [2022-08-20]. https://ssrn.com/abstract=3193577.
- [4] 林钧跃. 论信用信息的界定[J]. 征信,2021

- (4):7-12.
- [5] 李嘉莉,党志峰.西方诚信观念:历史嬗变中的综合[J].伦理学研究,2014(4):60-64.
- [6] [德]尼克拉斯·卢曼.信任[M].翟铁鹏,李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 [7] 徐尚昆.信任与治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8] 谢晖.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
- [9] [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郭华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10] 章政,张丽丽.论从狭义信用向广义信用的制度变迁——信用、信用经济和信用制度的内涵问题辨析[J].征信,2019(12):1-8.
- [11] 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 [12] 褚凤.诚信原则比较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
- [13] [美]伯纳德·巴伯.信任——信任的逻辑和局限[M].牟斌,李红,范瑞平,译.福州:福州人民出版社,1989.
- [14] [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M].刘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15] 陈翠玉.政府诚信立法论纲[J].法学评论,2018(5):165-175.
- [16] 解志勇.诚信原则是塑造法治政府的灵魂[J].人民论坛,2020(30):112-115.
- [17] 王瑞雪.政府规制中的信用工具研究[J].中国法学,2017(4):158-173.
- [18] 观察者网.全国100多地方政府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大庆级别最高[DB/OL].(2017-04-01)[2022-07-20].https://www.guancha.cn/society/2017_04_01_401673_1.shtml.
- [19] 胡俊超.社会信用体系“领头羊”政务诚信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20.
- [20] 张丽丽,章政.政府信用内涵与我国政务诚信建设的路径选择[J].征信,2020(3):18-25.
- [21] 人民网.严惩“官赖”,政务诚信必先治“官员失信”[DB/OL].(2016-11-21)[2022-08-20].<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1121/c1003-28884616.html>.
- [22] 戴昕.理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整体视角:法治分散、德治集中与规制强化[J].中外法学,2019(6):1469-1491.
- [23]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24] 胡仙芝,马长俊.市场信用监管的政府责任及其实现机制[J].中国行政管理,2020(3):40-44.
- [25] 侯明明.司法改革之于诚信政府建设的功能及其限度[J].河南社会科学,2021(2):72-85.
- [26] 李芸,战熠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模式重构与路径选择——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系统考量[J].南京社会科学,2015(11):70-76.
- [27] 王存河.政府信用的内涵及制度保障[J].法学评论,2004(5):62-68.
- [28]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M].瞿菊农,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29] 杨解君.中国行政法的变革之道[J].江苏社会科学,2012(4):33-35.
- [30] 张小妹.违法吸烟将纳入信用档案[N].北京青年报,2018-10-12(04).
- [31] 刘松山.失信惩戒及其立法的三大问题[C].//上海市法学会.上海法学研究(2020年第3卷总第27卷)——法治理论与实务文集[C].2020:93-100.
- [32] 王利明.论行政协议的范围——兼评《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2条[J].环球法律评论,2020(1):5-22.
- [33] 崔建远.行政合同族的边界及其确定根据[J].环球法律评论,2017(4):21-32.

(责任编辑:浩洋)
(校对:木子)

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的运行机理 与功能表达

——基于英雄文化培育的视角^{*}

苗大鹏 刘社欣

[摘要]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实践的重要环节,在培育英雄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筹策、展布、操演、刻写”,透视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何以成为英雄文化培育的载体及何以在运行中实现英雄文化的培育。在运行机理上,通过时空、人员、器物等仪式要素传递的象征意义赋予参与者崇尚英雄的信念;通过对参与者身体的规训与信仰的塑造,激发其学习英雄精神的主动性;参与者则依据重塑后的精神品性,自觉于日常生活中捍卫英雄、关爱英雄、争做英雄,进而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争当先锋模范的英雄文化。在功能表达上,党和国家借助其表达增强国家认同与政党认同、弘扬社会价值观与凝聚社会共识、进行特定目标的政治动员等方面的功能。

[关键词]颁授仪式;英雄文化;运行机理;功能表达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3)01-0070-09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英雄模范的表彰工作,在强调发挥其精神引领与典型示范作用的同时,也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2017年8月,随着“五章一簿”为主干的功勋荣誉制度体系的正式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的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实践的重要环节,党和国家通过其给予英雄模范最高级别的表彰,向全社会发出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雄的强烈信号。英雄人物的事迹及其承载的精神,是国家、民族赓续发展的重要文化支撑,同时也承载着国家、民族与政党的光辉历史记忆,内蕴着维持社会良性运行的价值观念。因而培育积极健康的英雄文化,就是对民众精神信仰的坚守、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涵养。本文以英雄文化培

育为视角探究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作为载体何以运行以及具体表达何种功能,对于揭示其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教化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文献回顾及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礼仪是宣示价值观、教化人民的有效方式”“一些重大礼仪活动要上升到国家层面,以发挥其社会教化作用”^[1]¹¹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总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总结好运用好庆祝活动的成功经验,不断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2]。有学者认为,“大党大国典礼制度的核心旨在实现自我形象构建、传承革命精神、增强治理效能、提高国际影响力”^[3]。而仪式强烈的表达属性使其作为典礼制度的核心环节,通过符号与象征,

* [基金项目]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课题“提升广州红色文化全国影响力传播力研究”(2021GZYZB32)。

[收稿日期] 2022-08-31

[作者简介] 苗大鹏,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510053;刘社欣,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510053。

“使得公众经由强烈的视听效果触动乃至震撼心灵,而感受荣誉制度所表征的国家形象与意志”^[4]。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据相关发言人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通过举行隆重庄严的功勋荣誉颁授仪式,为英雄模范授予最高荣誉,评选表彰大批的道德模范、时代楷模和最美人物,在全社会形成了见贤思齐、崇德向善、争当先锋的良好风尚。

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是党和国家对英雄模范表彰的最高规格的政治仪式。作为“文化的展演”,政治仪式既“凸显文化的政治内蕴和要求”^[5]¹⁰⁰,同时也在观念、行为、心理文化等层面直接给予举办者政治文化一定的反馈和刺激^[6]。而英雄文化则恰是集中表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价值理念的政治文化,是执政党获取民众广泛“精神”认同、夯实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政治仪式曾以不同的表现方式培育与彰显党的英雄文化,通过“不同英模的榜样力量,将党的政治意志柔性地渗入民间,以完成不同的政治任务”^[7]。比如,作为一种政治仪式的纪念活动,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借助纪念为革命献身的先烈,以激励后来者^[8];通过对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奠基者的纪念,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加强道德教育^[9]。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召开的全国英模表彰大会,弘扬以集体主义为内核的新的革命英雄主义,摒弃实质为个人主义的旧英雄主义^[10];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服务生产为中心目标的“五好”活动,通过表彰较好地执行道德模范的家庭妇女,在国家层面肯定她们的家务劳动也是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11]。1989年举行的劳模表彰大会,将大会表彰在名称、规模、时间、地点等方面作了制度化的规定,进一步扩大了劳模精神的影响^[12]。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开展了“双百”英模的评选,颂扬英雄模范的光辉事迹,激发民众爱国精神^[13]。进入新时代,有学者通过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机理探究,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为个案分析,澄明政治仪式何以可能与如何可能建构国家认同^[14];也有学者认为大党大国典礼的举办既要不忘初心、铭记本来,更要开创未来,主动传承发扬革命精神^[15]。整体来看,学界现有成果多直接将政治仪式当作英雄文化培育的载体,重点

集中在其表现样态、发展演进历程的研究,而对政治仪式“何以能”培育英雄文化及其过程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当前,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层面的政治仪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的相关研究正持续升温。其在建构历史意识、担当历史责任、唤起集体记忆、凝聚人民力量^[16]方面发挥的作用业已成为学界共识,然而在更深层次上关涉的社会文化功能,为整个社会提供的道德、价值和秩序规范^[17]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出的指示,要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18]。时代是出卷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的交织影响下,更加需要通过政治仪式发挥培育英雄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积极作用。本文基于迄今举行的五场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从英雄文化培育的视角透析新时代政治仪式究竟“如何培育”“如何表达”的问题,揭示仪式在培育英雄文化方面的运行机理及具体的功能表达。

二、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的运行机理

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是党和国家最高层面的政治仪式。有学者认为,政治仪式既是“充满暧昧与神秘的象征系统”,又“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糅合了传统和现代、持存和变迁以及国家和社会等各种比照系统中的复杂因素而成为一种‘文化大杂烩’”^[19]。同时,作为一种表征和符号,政治仪式具有极强的外在表现力。因此,为了能够清晰观察其作为“文化的展演”的过程以及理解仪式观众如何内化英雄精神,我们通过“筹策、展布、操演、刻写”的流程概括,在其应用和范围上,既不改变政治仪式的实践和本质,也不夸大其特征和表演过程,以此揭示仪式何以能培育英雄文化以及透视其何以对观众在意义传递、精神品性重塑、仪式化行为养成等方面发挥引导作用,借此达到直观地认知和把握仪式在英雄文化培育上的运行机理。

(一) 筹策:立足民族主体性,着眼解决现实问题

“筹策”实际上是回答为什么要举行仪式的问题^[1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英雄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

年文明积淀的精髓。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仁者爱人”的价值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这也使得中华民族的英雄往往具备以国家、民族、集体为重的特质。鲁迅就曾将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比作中国的脊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英雄文化在历史的积淀中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和精神财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中,礼仪作为“信仰的依托、文化的命脉和精神的象征,对于社会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化具有关键性的意义”^[20],因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通常作为培养、传承、弘扬英雄文化的载体被广泛和长期使用。有学者指出,传统中国社会中,“礼仪道德同法律一样成为一种外在的强制性行为规范,从‘应该’走向‘必须’,从内在道德自觉走向外在强制,逐渐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主导精神力量”^[21]。有学者在梳理传统中国的“礼”与“仪式”的演变后进一步指出,传统中国的“礼”更接近于今天一般意义上的仪式^[22]。历史证明,礼在传统中国是最普遍的社会规范,在表达、以至于肯定信仰方面发挥巨大作用^[23]²¹⁹。

一段时间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消费主义、娱乐至死等思潮尤其在对英雄人物及精神的解构上不遗余力。这也导致“人们不再用神圣的眼光看待政治权威,不再以神圣的态度行使政治权利,不再以神圣的观念对待政治象征”^[24]。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建党原则的中国共产党,其建构的英雄文化承载着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学者认为,一定意义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神圣性、至上性、纯洁性,以及明确的价值和道路指向性、不具妥协意向的善恶二元论色彩^[25]与政治仪式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耦合。因此,通过政治仪式培育新时代的英雄文化既是历史的顺承,更是对时代面临问题作出的回应。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既具备政治仪式的一般特征,同时也结合当代中国具体展现中国元素、中国风格,因而在培育英雄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方面具有显著的作用。

(二) 展布:借助仪式运转要素传递的主流价值信息,赋予仪式参与者崇尚英雄的信念

仪式的运转既需要外部环境要素的支撑,也需要内部要素的良性运转。外部环境要素为仪式的生

长注入源头活水,内部要素构成的象征系统则通过符号向参与者实现意义的传递。

首先,仪式运转的外部要素,主要包含民族文化传统与约束仪式的法律法规。如前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于民众的价值系统中,民众强烈的政治情感为仪式的举行提供支撑。在实践层面上,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为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提供合法性基础,有学者就指出,“法律是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之一,而任何具有政治属性的仪式都以合法性为主要诉求”^[26]。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第九条就对相关颁授仪式作出基本规定;2018年,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则在第23条对包含“国家”“中国”等字样的表彰活动作出严格的限定。可见,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既为仪式的开展提供法理基础,同样也借此彰显了国家最高荣誉的至上性与权威性。

其次,在仪式运转的内部要素中,时间、空间、人员、器物组成其基本的内部结构。仪式组织方通过“精致的布景”,营造“强烈的感染域与情绪场,使抽象晦涩的观念转化为一种情绪体验”^[27],仪式参与者在潜移默化中体认主流价值。具体而言,第一,时间的选择。将“节日、纪念日”作为仪式举行的时间,将其作为主题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节日的政治功效,比如可以“召唤附着在被纪念的人物和事件上的政治象征意义”^[5]¹¹²。在已举行的五场新时代功勋颁授仪式中,四场仪式就选择在建军节、国庆节和建党节的时间节点前举办,得以最大限度地烘托了仪式的重要性。第二,场所的选择。精心挑选的仪式场所也是仪式得以顺利举行的前提条件之一。仪式场所是一种政治象征,仪式举办者通过各种象征符号装饰,在空间中给参与者营造了共情的效果。人民大会堂作为党和国家举行政治、外交的重要场所,其整体风格庄严肃穆、典雅宏伟,在全国民众心中有着崇高地位。其中,金色大厅被称作人民大会堂“第一厅”,首次“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以及“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均在此举行。据介绍,大厅改造的指导思想为“体现出高贵、华丽、庄重、典雅的庆典气氛和风格特征;同时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文化韵味和新的历史阶段的时代风采”^[28]。表现在具体的装饰设计上,包含诸如“20根两层通

高柱”，“用红色雕金花饰面，纹样采用‘缠枝牡丹’，表现出高贵典雅的装饰风格”；大小额枋也采用中国古典沥粉贴金彩画，与雕金柱相配合，“共同体现金色大厅高贵华丽的风格和气氛”；“柱面两种不同色调的金色饰面显得十分讲究华贵”^[29]，等等。因而，在金色大厅为英雄举行颁授仪式，会天然地增加崇尚英雄的神圣感。

第三，人员的配置。虽然仪式的操演将仪式参与者“抛入和日常政治关系完全不同的仪式关系中，但政治关系的内在逻辑始终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5]131}。从现场画面看，在颁授国家最高荣誉、党内最高荣誉以及军队最高荣誉的仪式中，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平均出席并亲自为英雄模范颁奖，这也极大拓展了仪式的政治影响。

第四，器物的配置。核心器物“是政治仪式所能够营造出的象征漩涡的物质意义上的中心”^{[5]133}，而“规格越发强大的器物越容易获得更高的认同感”^{[5]136}。在新时代功勋颁授仪式中，勋章、奖章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器物。“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及“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在设计中既注重仪式感，也强调民族工艺，融入与表彰对象相对应的象征元素，设计华美，蕴含深意。以“共和国勋章”为例。勋章整体由足金打造，大致分为章链和章体两部分，以红色、金色为主色调。章链部分采用传统的花丝工艺技术融入寓意美好、高洁、典雅的中国结、兰花和牡丹等元素，以金丝编织而成，整体上呈现华丽感。章体融入国徽、黄河、长江、五角星等元素，填充色采用珐琅工艺，并以红宝石点缀其中。从整体上看，“共和国勋章”象征勋章获得者为共和国建设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此外，仪式主办方也充分发挥仪式音乐在声音象征方面的重大作用，不仅通过仪式音乐控制仪式的节奏、调节仪式的气氛，还通过仪式音乐将参与者带入特殊的政治情感体验之中，实现政治价值的构建与宣示^[30]。例如，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现场，当司仪宣布颁授仪式正式开始时，六名军号手吹响仪式号角，优雅悠扬的乐曲节奏渲染仪式的气氛，营造出神圣的声音空间；仪式主持人在宣读授勋决定前请全体起立奏唱国歌，使得仪式参与者在国歌声中达到“共情”；在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为英雄授勋时，现场播放的《忠诚赞歌》，铿锵有力的音符象征着获得勋章者“坚定信

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31]。

总之，仪式组织方在仪式运转所需的外部环境要素与内部结构的展示中，将仪式的庄严性、神圣性与礼赞英雄的崇高性赋予仪式参与者，使之产生崇尚英雄的信念。

（三）操演：通过对仪式参与者身体的规训与信仰的塑造，激发其学习英雄的动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狭义上的礼指“人类日常生活中所奉行践履的行为仪式与规范”^{[32]2}，换言之，礼是与身体联系在一起的，礼在很大程度上把生理意义的身体伦理化，认为身体是道德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身体的重视最直观的表现是礼仪对身体的规训，礼节仪式则是身体动作的连贯组合。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礼仪可以说是古代社会的人们所设计的理想行为模式，每一个具体的仪节、仪式都被赋予深刻的价值意蕴，而这些价值意蕴的真正实现与落实则需要身体的实践与展演。”^{[33]150}

现代政治仪式在汲取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仍注重在操演过程中对身体的规训，直观表达对英雄的尊重。在已举行的功勋荣誉颁授仪式中，“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与“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流程上大致相同，其全程直播也使得观众有了强烈的代入感。以“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为例，在仪式现场，司仪宣布最高领导人和勋章获得者入场时，全场就正式进入了仪式的场域中。相对于在仪式现场的人员，通过电视、网络直播等收看的观众则构成了广泛意义上的仪式参与者。从直播画面看，现场人员的身体在仪式司仪和主持人的口令中不断受到规训。结合仪式结束后的新闻通稿来看，司仪和主持人的口令主要包括：①全体起立，欢迎习近平总书记和勋章获得者入场；②请王沪宁同志主持仪式；③请全体起立，奏唱国歌；④请礼兵护送勋章入场；⑤请习近平总书记为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⑥请全体起立，向勋章获得者致以崇高敬意；⑦请少先队员向勋章获得者献花；⑧请勋章获得者代表发言；⑨请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在操演过程中，无论是现场人员“起立”时致敬的庄重姿态，还是礼兵护送勋章入场的庄严气氛，抑或是少先队员献花时的致敬动作，场内外观众在这场视觉盛宴中大受鼓舞，崇敬英雄之情溢于言表。此外，在国歌、仪式号角、《忠

诚赞歌》等声音符号营造的“想象共同体”中,场内外观众在情感上实现了英雄情怀的共鸣,激发出学习英雄的动力。仪式结束后的第二天,《光明日报》刊发《“七一勋章”获得者可敬可亲亦可学》的评论员文章,鼓励全体党员向“七一勋章”获得者看齐,“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34]。在《光明日报》的采访中,受访者均表示为优秀党员的榜样力量所振奋。比如,有教育工作者表示,“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的事迹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学习张桂梅,就要把她的精神传递下去^[35];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社会各界民众在观看颁授仪式后,纷纷表示学习先进、弘扬功勋模范精神,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比如一位“90后”的基层工作者在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中有了更深的感悟,要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工作的硬标准^[36]。又如,航天科技工作者陆元九获得“七一勋章”使其同事倍感自豪,表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报国之志,继续在产品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综合性能不断提升等方面埋头苦干、攻坚克难^[36],等等。总之,在这场党内最高荣誉的颁授仪式中,仪式的直接、间接参与者纷纷被勋章获得者的英雄事迹及其英雄品格所感动,他们的精神品格也在仪式的时空中实现了升华。

(四)刻写:依据精神品性重塑后形成的共同记忆,实现捍卫、关爱与争做英雄的主动

刻写是政治仪式流程的终点^{[5]252}。在仪式的操演结束后,无论是仪式的直接参与者还是间接参与者,往往通过“仪式化”的方式,将其在仪式中获得的精神理念和行为规范投射到社会实践之中。因而,透过仪式化的行为,仪式参与者“将主流观念渗透于全部社会生活中,使主流观念影响于日常生活,进而强化主流价值的传承”^[37]。一定意义上讲,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是一段时期党和国家政治文化的集中呈现,在颁授国家、党内、军内最高荣誉的仪式中,通过展布、操演向民众直观地传递崇尚、学习、捍卫、关爱英雄的意义,形成关于英雄的共同记忆。而此后民众在社会生活中表现英雄般的举动,一定意义上也是仪式行为的拓展。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当前,越来越多的民众在生活中主动捍卫英雄。比如,网络“大V”罗某平公然发表诋毁抗美援朝“冰雕连”英烈的言论,就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强烈愤慨,

招致社会上对其几乎一边倒的谴责;旅游博主李某贤因犯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获刑七个月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令人拍手称快^[38]。英烈事迹及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精神财富,自觉关爱英雄则直接表现出民众的情感取向。据《解放军报》载,民众在得知“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将安葬在兰州市烈士陵园的消息后,许多人自发从全国各地来到现场悼念,在一幕幕令人动容的情景中,“让人感到英雄模范已经成为全社会最尊崇的人、人民心中最明亮的星”^[39]。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在2020年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90后”“00后”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和总体战作出重要贡献。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数百万干部奔赴扶贫一线,其中1800多名干部为脱贫事业而牺牲。面对外军的挑衅,祁发宝、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等新时期革命军人义无反顾冲锋在前,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在同社会上歪曲、丑化党的历史作斗争的群体中,青年人已显示出责任与担当。据《中国国防报》报道,当那些抗美援朝英雄的孙辈在网络上谈起“我爷爷”“我姥爷”时,言辞间是那样自豪骄傲,可见年轻人对抗美援朝英雄的敬意已在心中生根发芽^[40]。

总而言之,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通过对英雄模范最高的礼赞,弘扬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尤其在英雄文化的培育上发挥重要作用。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设立烈士纪念日”等举措,“有力彰显党心民心、国威军威,在全社会唱响了主旋律、弘扬了正能量”^[41]。

三、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的功能表达

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仪式作为一种可见、可触、可感的行为方式,承载并象征着诸多文化观念,而仪式自身的表达属性也使其得以通过符号与象征实现观念的表达。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能否坚守其建构的英雄文化不仅关乎自身执政安全,更直接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因而,党和国家通

过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和政党认同、引领社会思潮与凝聚社会共识,进行政治动员,以期在主流文化和价值观方面对民众进行引导和熏陶。

(一) 借助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传承历史记忆,增强国家认同与政党认同

英雄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集中展现,英雄模范承载了民族和国家的集体记忆,他们的行为被赋予了集体价值的崇高。历史记忆是一个集体、一个组织有选择性的主观建构,包含特定的理想和价值追求,蕴含集体行动的决心和力量。群体之间的区分,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彼此拥有不同的历史记忆,而其内部成员之所以能在情感上认为共属一体,关键就在于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因此,传承英雄模范的历史记忆,不仅是对个人光辉事迹的肯定,更是对其所处民族、国家中的人民这一集体伟大形象的集中彰显。不同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所奋斗的过程中展现出的优良作风,成为党和国家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42]⁷⁸。因此,党和国家借助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表彰英雄模范,在英雄模范光辉事迹的回顾中传承历史记忆,以此增进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增强国家认同和政党认同。

选择特殊的时间节点对英雄模范进行荣誉表彰能够最大限度唤起民众的英雄情结,促使爱党爱国情感的內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和95周年之际,党和国家举行颁授仪式,分别授予英雄模范党、国家、军队最高级别的荣誉。比如,“八一勋章”要求候选人既要满足信念坚定、实绩优异、作风过硬、群众公认的评选条件,同样要符合聚焦战斗力、突出功勋卓越定位、严把政治关廉洁关、适度体现代表性的遴选原则。勋章获得者及英雄事迹展现出的人格力量深刻感染了民众。2017年7月28日,习近平向麦贤得、马伟明等10位英雄颁授“八一勋章”。10位来自军队的英雄,既有不怕牺牲、冲锋在前的坚强战士;也有心系强军梦,科研报国的高端科技人才;还有保卫人民群众远离毒品侵害的缉毒先

锋。以军内最高荣誉对英雄模范进行隆重表彰,向民众传达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是守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保卫人民幸福生活的坚强依靠,同时也唤起、固化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为人民的历史记忆。勋章获得者的英雄事迹唤起民众的爱党、爱国情怀,激发他们对政党和国家的情感认同。又如,2021年6月29日举行的“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习近平总书记向22位来到仪式现场的英雄模范颁授“七一勋章”的同时,司仪也通过对英雄模范光辉事迹的解说,唤起民众对百年间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31]的历史记忆。在党的百年华诞这一重要的时间节点授予英雄模范党内最高荣誉,更易激发全体党员牢记党的性质宗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二) 借助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

改革开放以来,强势输入的西方文化为我们发展生产力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管理理念,同时其中的腐朽因素对我国也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干预性。历史虚无主义、消费主义、娱乐至死等思潮在国内的传播,解构英雄、消解崇高,对党建构的英雄文化形成严重滋扰。不良社会思潮在削弱民众英雄信仰的同时,也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隐患。因此,弘扬一种核心价值观就十分必要和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43]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聚着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英雄模范人物通过人格化的优势将这种无形而又抽象的价值观鲜活地呈递在民众面前。因此,新时代功勋颁授仪式通过表彰英雄模范所展现出的深层社会文化价值,激励社会大众凝聚共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民族复兴积蓄精神动能。

党和国家借助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将英雄模范人物树立为国家和民族的榜样,以中国共产党党建构的英雄文化为标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在2019年的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中,习近平总书记将英雄人物的品格概括为忠诚、执着、朴实,引起在场人员的强烈共鸣。颁授仪式结束后,多位国家荣誉称号

获得者在接受采访时深表认同。比如,“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高铭暄教授表示,一个人对党和国家、对人民有了绝对忠诚,工作起来心中就会有劲头、有动力。又如,“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王有德认为,“忠诚是第一位的,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如果对党不忠诚、对人民不忠诚、对脚下的这片土地不忠诚,就会出大问题”^[44]。英雄模范的事迹广为传播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大受鼓舞,比如有受访者表示,于漪、卫兴华、高铭暄等“人民教育家”称号获得者在几十年教书育人中呕心沥血,为青年学生树立良好榜样,我们要“努力奔跑,成长为国民表率、社会栋梁”^[45]。也有受访者向袁隆平、屠呦呦、李保国等科技工作者表示敬意,认为“心怀敬畏、精益求精、勇于创新、追求极致,才是向这些模范致敬的最好方式”^[45]。

值得一提的是颁授仪式掀起的群众学习英雄精神的热潮、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及时跟进,将仪式展现出的英雄文化通过多种方式在民众中弘扬。例如,2021年出品的电视剧《功勋》,取材于国家首批8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真实故事。通过“大写的业绩”与“小写的生活”相结合,展现功勋人物默默无闻,秉持“忠诚、执着、朴实”的人生品格和献身祖国事业的崇高境界,潜移默化中对观众进行了主流价值观的教育。据“中国视听大数据(CVB)”统计,全剧48集揽获20.455%电视观众,回看用户规模始终位居黄金时间段电视剧第一^[46]。

(三) 借助新时代功勋荣誉颁授仪式,进行特定目标的政治动员

“政治动员是一定阶级或政党,通过运用政权或政党的力量,激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行为。”^[47]在政治仪式中,重要领导的“讲话”往往作为一个重要环节置于仪式的最后。通常情况下,领导人在对仪式举办的背景、目的和意义等进行概述后,就为实现特定的目标进行政治动员。仪式组织方通过时间、空间、器物的象征意义及身体动作的规训营造了一个特殊意义的“共情时空”。在这个时空内,仪式参与者的情绪随着仪式的进行不断高涨,往往在仪式的最后阶段达到最高点。因此,此时安排领导人发表讲话、进行政治动员也往往会取得更加显著的效果。

从政治动员的效果来看,重大节日和纪念日因

自身象征意义强烈,仪式组织方往往选其作为仪式的主题,以期取得最佳效果。如前所述,党和国家在纪念建军、建立新中国和建党的重要时间节点分别举行功勋颁授仪式,动员民众争当英雄模范,实现党和国家的既定战略目标。但仍有特殊时期举行颁授仪式的个例,例如2020年9月8日举行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同时嵌入了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这场仪式的举行既非在重大节日,也非在纪念日,选择“非常之时”自有其必要性。从当时的背景看,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打乱了社会正常发展的节奏,面对严峻的疫情,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于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举,最终带领全国人民控制住疫情并恢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然而,面对世纪疫情仍在全世界高位运行的情况,既统筹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又统筹社会疫情防控、巩固来之不易的防疫成果就显得必要和迫切。因此,适时对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个人、先进集体进行表彰,以实现榜样示范和精神引领之效。当时,对尚未取得全胜的脱贫工作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仍需全体民众再接再厉。在此情况下,传承英雄模范精神,以伟大抗疫精神对“世纪大疫情”背景下的民众进行激励和政治动员正得其时。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高度称赞伟大抗疫精神,在对其内涵阐释的基础上,对接下来的工作既进行了部署,又进行了具体的动员,比如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同国际社会携手面对挑战,等等。在讲话的最后,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脱贫攻坚的目标作为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对全国民众进行了动员。在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通过直播信号传遍祖国大地,现场热烈的掌声也深刻感染、调动着民众的情绪。在《人民日报》的采访中,受访者纷纷表示“要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而不懈奋斗!”^[48]颁授仪式结束后的第二天恰值第36个教师节,《光明日报》在对教育界人士的采访中,受访者一致认为“伟大的抗疫精神是支撑中国人民不畏艰险、战疫到底的强大信念”,有高校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加强工作,在新冠病毒科研攻关中充分发挥清华力量,展现高

校科技工作者的担当”,有青年学生表示,“要努力学习,强化自身能力建设,勇于担当善于担当,真正使自己成为能够担当大任的新时代青年”^[49]。可见,英雄文化始终是激励民众事业进步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2] 习近平亲切会见庆祝活动筹办工作各方面代表[N]. 人民日报,2021-07-14(001).
- [3] 张国玉. 不断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12):19-23.
- [4] 王理万. 国家荣誉制度及其宪法建构[J]. 现代法学,2015(4):77-88.
- [5] 王海洲. 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 [6] 朱庆跃. 政治仪式在中共政党文化构建中的功能价值分析——以民主革命时期抗日纪念仪式为例[J]. 现代哲学,2021(4):58-65.
- [7] 孙云. 中共英模表彰制度的肇始及演变[J]. 党的文献,2012(3):71-76+82.
- [8] 陈金龙. 略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J]. 中共党史研究,2007(6):16-24+32.
- [9] 陈金龙. 纪念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纪念活动为视角[J]. 思想教育研究,2008(8):3-7.
- [10] 孙云. 1950年全国英模表彰大会的召开及意义[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3):23-29+123-124.
- [11] 周蕾. 塑造和表彰——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五好”活动的历史考察[J]. 妇女研究论丛,2015(1):55-60.
- [12] 姚力. 20世纪80年代全国劳模表彰及其时代价值[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5):48-58+157.
- [13] 张树华,潘晨光,祝伟伟. 关于中国建立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思考[J]. 政治学研究,2010(3):39-43.
- [14] 曾楠. 政治仪式:国家认同建构的象征维度——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为考察对象[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5-11.
- [15] 张国玉. 不断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12):19-23.
- [16] 徐沐熙. 不断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J].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1(5):120-127.
- [17] 徐沐熙. 礼贯古今:以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彰显中华礼制文明[J]. 北方论丛,2021(6):16-21.
- [18] 华春雨. 习近平对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发挥功勋荣誉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 推动全社会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N]. 人民日报,2016-05-19(01).
- [19] 王海洲. 后现代视域中的政治仪式——一项基于戏剧隐喻的考察[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0(2):148-157+160.
- [20] 张智,马琳. 仪式礼仪: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J]. 思想教育研究,2019(4):118-122.
- [21] 李梅. 中华传统礼仪的演进轨迹与现代转型[J]. 山东社会科学,2020(5):172-178.
- [22] 王昌. 理论的限度:仪式理论与中共纪念史研究[J]. 党史研究与教学,2022(2):25-35.
- [23] 李亦园. 文化与修养[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24] 郝宇青. 当下中国政治仪式的去神圣化及其应对策略[J]. 探索与争鸣,2018(2):54-57+142.
- [25] 郝宇青,吴满. 中国共产党执政新议题:从特定合法性资源到散布性合法性资源的转换[J]. 探索,2014(6):62-68+74.
- [26] 王海洲. 政治仪式外部环境的分层解析:文化、政制与事件[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6):47-52.

- [27] 曾楠,闫晓倩. 国家认同建构的象征性资源探究:以政治仪式为视角[J]. 青海民族研究, 2020(4):98-102.
- [28] 王炜钰. 人民大会堂部分厅室的改造[J]. 建筑创作,2014(Z1):406-409.
- [29] 王炜钰,俞靖芝,尹思谨,等. 亦空间 亦装饰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室内改造工程[J]. 室内设计与装修,2010(3):34-37.
- [30] 王海洲. 试析政治仪式中的声音符号及其象征意义[J]. 天津社会科学,2011(2):53-58.
- [31] 习近平. 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1-06-30(02).
- [32] 谢谦. 中国古代宗教与礼乐文化[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 [33] 汤海艳. 成人之道 中国传统礼仪及其道德教育功能研究[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34] “七一勋章”获得者可敬可亲亦可学[N]. 光明日报,2021-06-30(02).
- [35] 心中有信仰 脚下有力量[N]. 光明日报,2021-06-30(02).
- [36] 弘扬功勋模范精神 奋进伟大复兴征程[N]. 人民日报,2021-06-30(05).
- [37] 曾楠,闫晓倩. 国家认同建构的象征性资源探究:以政治仪式为视角[J],青海民族研究, 2020(4):98-102.
- [38] 郝晓军,蒋婷玮. 捍卫英雄就是守护信仰[N]. 中国国防报,2021-12-03(02).
- [39] 杜勤俭. 从英雄模范身上汲取精神力量[N]. 解放军报,2021-09-29(07).
- [40] 吕高排. 尊崇英烈就是守护中华民族的根与魂[N]. 中国国防报,2021-10-15(02).
- [4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 人民日报,2021-11-17(01).
- [42]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
- [43] 习近平.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44] 伟大出自平凡 平凡造就伟大[N]. 人民日报, 2019-09-30(02).
- [45] 向英雄模范学习致敬[N]. 人民日报,2019-09-30(05).
- [46] 周安华,尹相洁. 国家英雄书写:历史叙述与民族想象——浅谈电视剧《功勋》的美学意蕴[J]. 中国电视,2021(12):20-27.
- [47] 陈金龙. 毛泽东与纪念活动的政治功能表达[J]. 现代哲学,2009(1):50-57.
- [48] 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N]. 人民日报,2020-09-10(03).
- [49] 把伟大抗疫精神转化为前行力量[N]. 光明日报,2020-09-10(02).

(责任编辑:青山)
(校对:木子)

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南京都市圈跨城区 社会联系度研究

——基于 2022 年春节期间百度迁徙大数据*

厉诗辰 吴义东 王先柱

[摘要] 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奋斗目标的重要引擎,对我国经济航船能够行稳致远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为使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更好实施,应不断推进我国跨区域层面的都市圈建设。在此背景下,基于 2022 年春节期间南京都市圈各城市的百度迁徙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从人口流动这一维度探析该区域内各城市间的跨城联系度。从空间视角看,南京作为都市圈中心城市,能通过扩散和涓滴效应促进圈内其他城市发展,但存在苏皖省际行政壁垒现象;都市圈内各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与其地理距离呈负相关关系,经济联系强度随着地理距离的扩大而递减;宁马滁跨界一体化发展成效显著,南京与马鞍山、滁州的跨城联系度高于江苏省内部分城市。从时间视角看,都市圈内人口跨城流动在春节期间具有不对称性,假期后期“返城流”的净迁入指数峰值高于假期前期“返乡流”净迁入指数峰值,南京作为中心城市的对外吸引力进一步增强,节假日及工作日阶段的人口流动均有明显的虹吸现象。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为促进南京都市圈各城市一体化高质量协调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 南京都市圈;迁徙数据;跨城联系;人口流动;区域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9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071(2023)01-0079-09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当前,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区域内各城市的协调发展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稳定器和助推剂。都市圈作为城市发展过程中从相互竞争到互助合作的重要载体,发挥着实现区域内各城市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作为我国最早启动建设的跨省域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在过去 20 多年的共商共建共

享中,区域内各城市正逐步形成以南京为中心的通勤圈、生活圈和产业圈。2021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正式复函同意《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这是首个得到国家层面批复、支持江苏安徽两省跨省域联动的都市圈规划,标志着南京都市圈的建设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1]。

都市圈内不同城市的差异促成了城市间功能互补的水平关系,各城市通过协调合作释放区域整体发展潜能,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率与生产效益双提升的跨越式发展^[2]。近年来关于城市间社会联系度的相关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理论界在研究都

* [基金项目] 2022 年度南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招标课题“南京都市圈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路径研究”(2022-11-2);2021 年度安徽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推动长三角省际产业合作园区建设的安徽方案研究(AHSKZD2020D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住房公积金一体化对新市民跨区域住房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72204002)”。

[收稿日期] 2022-10-09

[作者简介] 厉诗辰,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243032;吴义东,博士,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资格教授,硕士生导师,243032;王先柱,博士,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43032。

市圈内城市联系度问题时,所采取的视角不尽相同。Simeon 和 Caroline(2002)基于生产与消费链等贸易流,研究了1987—1996年间苏联部分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变化^[3];Matsumoto(2004)基于国际航空客运和货运流,分析了1982—1998年间亚洲、欧洲和美洲地区内部之间的网络结构特征及联系^[4];鲁金萍等学者(2014)将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生态建设及环境保护等要素列入城市综合评价体系,指出这些资源要素的流动构成了城市流,通过其强度变化能够反映京津冀城市群之间各城市的经济联系^[5]。结合现有研究发现,基于“流空间”视角表征城市间的联系特征能反映出不同城市间交通、资本以及信息联通的基本情况。随着城市跨区域合作程度的不断加强,以静态常住人口为标准的空间资源配置方法难以满足现实的需求^[6]。都市圈作为引领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需要寻找一种动态的新型数据载体来衡量城市间实时变化的社会联系度。以人口流动为媒介的迁徙流作为大数据时代的新型产物,能衡量空间层面上各类生产要素的配置结构。人口因工作、生活等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在不同城市之间作出的各类短期重复且具有周期性的运动将直接推动都市圈内不同城市之间的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流通,从而促进经济的融合发展。因此,追溯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人口流动情况能在一定程度上归纳区域发展特征,厘清区域内各城市间的社会联系度,进而为促进区域的经济发展,提高其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理论依据。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关于城市间社会关联度这一问题的数据获取环境及采集途径都趋于多元化。百度迁徙数据、腾讯迁徙数据等新型数据源的不断涌现,为人口流动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数据支撑。国内外学者在研究都市圈内城市间联系度时,通常借助人口迁徙数据这一变量来突破传统数据时间滞后、统计样本数据少等障碍^[7]。田琳(2020)基于高德人口迁徙大数据分析上海都市圈内9个城市在工作日、周末、节假日阶段的人口迁徙特征及联系强度变化^[8];孙继平等学者(2020)基于春运期间的腾讯人口迁徙数据,以人口迁徙热度这一指标表征成渝城市群内不同城市间的联系度,这些都对研究城市群网络有着重要意义^[9];张小东等

学者(2021)借助百度迁徙大数据,对中国城市网络结构的层级、关联关系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为中国城市网络结构的均衡发展提供参考性建议^[10]。人口迁徙数据能体现出区域内不同城市之间的经济活动吸引力情况,为研究基于人口流动的各城区社会联系度提供新的视角,同时也有助于促进都市圈的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南京都市圈作为连接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两大板块、衔接长江与淮河两大流域的重要枢纽区域,承担着跨区域协调的重要责任。近年来,随着南京都市圈的不断扩容,城市间经济合作频数增加,一体化发展程度不断攀升,而对于新视域下都市圈内各城市间的社会联系度问题还未有详细的研究,且基于人口迁徙数据这一指标能为研究南京都市圈内不同城市之间的关系提供全新的研究路径,进而促进中心城市与其周边地区的相互作用,促进区域的一体化、高质量发展^[11]。基于此,本文通过2022年春节期间的百度人口迁徙大数据计算南京都市圈内各城市间的社会联系度,以探究都市圈跨城联系的现状、特征及趋势,由此为提高南京都市圈内各城市经济发展、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性建议。

一、研究区域、数据、方法

(一) 研究区域

本文将南京都市圈作为研究区域。南京都市圈目前为“8+2”格局:即8个地级市(江苏省的南京、镇江、扬州、淮安,安徽省的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和江苏省常州市的溧阳市(县级市)、金坛区,总面积约6.6万平方公里。其中,为便于各城市间的横向比较分析,常州市的金坛区和溧阳市部分数据,直接采用常州市级层面的相关数据。

(二) 研究数据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选取自百度迁徙大数据平台^①。同时,由于春节对于中国人的特殊含义,在此期间由各地区务工人员返乡过年的所引发的爆炸性增长的人口迁徙,使春节前后的人口迁徙数据特征有较大的研究意义。选取2022年春节假期南京都市圈内各城市人口流动最为集中的11天,即2022年1月29日至2022年2月8日,爬取该阶段的迁徙指数值及城市间OD比例来探究城市间的社会关联度。

(三) 研究方法

本文参考田琳(2020)在研究上海都市圈跨城联系特征时所采用的测算方式^[8],借助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研究南京都市圈中两两城市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将其定义为“人口迁徙联系度”。通过建立都市圈内各城市之间不对称的关系型矩阵,若两城市之间的联系未出现在前 100 位联系榜单中,则将该迁徙指数值设置为 0,视为两城市之间的联系度不紧密。同时,分为出发地城市 O 和目的地城市 D,得到两城市之间的人口迁徙联系度,公式如下:

$$A_{od} = B_{od} + B_{do} \quad (1)$$

其中, B_{od} 为人口从城市 O 出发至城市 D 的迁徙指数, B_{do} 为人口从城市 D 出发至城市 O 的迁徙指数, A_{od} 为城市 O 和城市 D 之间的总迁徙联系度。联系度可以表征城市之间人口迁徙联系的紧密程度。

同时,通过都市圈内每一个城市节点与其他城市之间的迁徙联系度矩阵,借助 Ucinet 软件计算出各城市中心度。城市中心度这一指标可以反映出都市圈网络中各城市节点与其他城市的交流往来能力及各城市节点在都市圈这一区域经济网络中的中心程度。由于区域内城市间的联系具有方向性,因此将城市中心度这一指标分为点入度中心度和点出度中心度,计算公式如下:

$$C_o = \sum_d B_{od} \quad (2)$$

$$D_o = \sum_d B_{do} \quad (3)$$

其中, C_o 为城市 O 的点出度中心度,该指标可以反映都市圈内各城市对区域内其他城市的经济辐射影响力, D_o 为城市 O 的点入度中心度,可以反映出某城市对其他城市的接受能力。

表 1 2022 年春节期间南京都市圈各城市间日均迁徙联系度矩阵

	南京	镇江	滁州	马鞍山	常州	扬州	淮安	宣城	芜湖
南京		62.73	33.94	46.53	16.95	29.39	26.68	15.97	9.88
镇江	25.11		2.24	1.56	25.12	10.47	5.74	1.13	1.24
滁州	12.23	3.17		8.52	1.84	9.15	7.62	2.25	3.84
马鞍山	16.56	1.07	4.40		0.98	0.58	0.55	5.37	28.44
常州	8.71	34.37	2.11	2.15		7.64	6.41	12.36	1.78
扬州	11.15	10.89	6.93	0.89	5.30		13.65	0.63	0.86
淮安	11.93	7.79	7.08	0.98	5.52	17.16		0.61	0.63
宣城	3.67	0.70	1.00	4.88	5.32	0.38	0.31		21.12
芜湖	3.56	1.33	2.90	43.54	1.23	0.90	0.56	36.61	

表 2 2022 年春节期间南京都市圈各城市中心度测算表

城市	点出度中心度	点入度中心度
南京	242.072	92.915
芜湖	90.626	67.774
常州	75.525	62.275
镇江	72.605	122.054
马鞍山	57.964	109.041
淮安	51.7	61.517
扬州	50.297	75.66
滁州	48.622	60.603
宣城	37.376	74.949

二、南京都市圈跨城区联系度现状、特征与趋势

基于 2022 年春节期间南京都市圈各城市间日均迁徙联系度的矩阵数据以及都市圈各城市的点出度、点入度中心度(见表 1、表 2),能对都市圈内各城市间的社会联系度以及各城市对区域内其他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和接受能力进行分析评价,并进而对其现状特征及趋势进行原因剖析,以期为实现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

(一) 中心城市龙头效应突出,跨省际区域存在行政壁垒问题

都市圈的中心城市会通过扩散和涓滴效应消除城市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赫希曼的极化涓滴效应

认为经济发达地区能通过吸引周边地区的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通过涓滴效应逐渐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12]。结合表 1 和图 1 可知,南京在都市圈中的中心性作用十分明显,不管是其与江苏省其他城市之间的迁徙联系度还是与安徽省部分城市之间的迁徙联系度,都保持较高水平。同时,南京是都市圈内“集高点入度与高点出度于一身”的城市,经济活跃度高于区域内其他城市。作为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南京在对圈内其他城市产生经济辐射效应的同时,也与其他城市形成主动联系,这不仅能巩固其自身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核心动力源的战略定位,更能通过其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影响力,对周边区域的经济形成渗透和带动作用,从

而进一步提高总体经济资源配置效率^[13]。而淮安、滁州、宣城等城市的点出度与点入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经济辐射力与对外吸引力均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根据表 3 可知,春节期间迁入南京来源地与迁出南京目的地前 100 位热度城市中,都市圈其他各城市在热度榜中都处于靠前位置。南京作为江苏省的省会城市以及都市圈中的龙头城市,其在经济规模、产业集聚、人文凝聚等方面的资源禀赋,能吸引周边城市的人口向南京流动,同时周边地区在土地供给、劳动力价格、农业经济以及生态资源等方面的区位优势也能与南京形成极强的互补关系,联动效应往往能强化资源的跨区域配置能力及效率。

表 3 2022 年春节前后迁出、迁入南京城市热度排名

2022 年 1 月 3 日南京迁出目的地城市热度排名			2022 年 2 月 6 日迁入南京来源地城市热度排名		
热度排名	城市名称	比例	热度排名	城市名称	比例
1	江苏省镇江市	7.36%	1	江苏省淮安市	7.71%
2	安徽省滁州市	7.11%	2	安徽省滁州市	7.51%
3	江苏省淮安市	6.96%	3	江苏省镇江市	7.22%
8	江苏省扬州市	5.02%	5	江苏省扬州市	5.70%
9	安徽省马鞍山市	4.65%	10	安徽省马鞍山市	4.36%
12	江苏省常州市	2.47%	12	江苏省常州市	2.81%
14	安徽省芜湖市	2.02%	15	安徽省芜湖市	1.93%
23	安徽省宣城市	1.25%	17	安徽省宣城市	1.58%

注:城市热度排名仅列出南京都市圈所涉及城市

客观而言,城市间行政壁垒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堵点。在苏皖两省各自省域范围内,都市圈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度较高,但跨越省域范围后,联系度相对减弱。不同省际行政区域各自的“经济沃土”是产生跨辖区行政性问题的根源之一,地方政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会在围绕各类生产要素进行竞争的过程中忽视其他省域城市的发展保障,如利用税收或信贷等优惠政策扶持本地企业的发展而忽视外地企业的营商环境。赵金涛(2010)认为行政壁垒会制约区域经济发展,阻碍区域一体化进程^[14]。因此,为进一步提高南京都市圈的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和一体化发展程度,破除行政壁垒的限制

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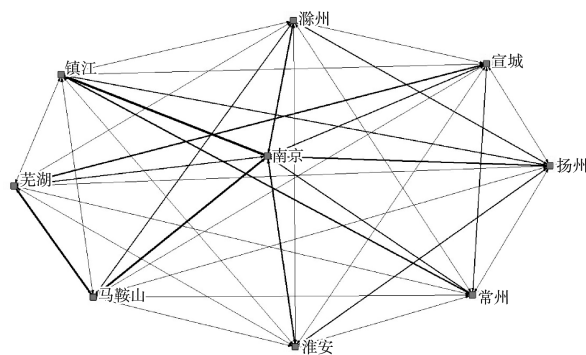


图 1 2022 年春节期间南京都市圈各城市间联系情况网络图

注:通过 Ucinet 软件绘制,线宽代表城市间的联系程度

(二) 都市圈内各城市间联系度与地理距离呈负相关关系

从空间视角来看,地理距离是影响区域内各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的重要因素。通常距离越接近,则从一城市抵达另一城市的便捷程度就越高,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也会更加高频,这为城市之间的互相联系提供了前提条件,为城市间人才、资本、生产要素的流通互动提供了更为顺畅的途径。结合表 1 和表 4 可看出,地理距离十分接近的各城市间,如南京—镇江、南京—扬州、南京—滁州、南京—马鞍山,镇江—常州、镇江—扬州,滁州—马鞍山,马鞍山—芜湖,宣城—芜湖等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十分接近,这些城市之间的人口迁徙联系度也处于较高水平。由图 2 可发现,都市圈内各城市间地理距离与人口

迁徙联系度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随地理距离的扩大而递减。地理距离及迁徙联系度也反映出南京作为地区性中心城市,其与苏皖各城市之间的沟通和联系程度处于领先地位。“十四五”期间,南京将持续推进建设都市圈轨道交通体系,坚持交通先行,以此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等目标。截至目前,宁句城际作为南京都市圈的首条跨市域轨道,已经建成通车,宁马城际等其他轨道重点建设项目也正处于开工建设阶段,这使得“轨道上的都市圈”“一日生活圈”“一小时畅行都市圈”等美好愿景加速实现,不断扩展和延伸的交通网络能逐渐形成都市圈的基本骨架,可以更好地统筹不同地区的协调发展,为南京都市圈的发展进入新阶段注入动力。

表 4 南京都市圈各城市地理距离(单位:千米)

	南京	镇江	常州	扬州	淮安	滁州	马鞍山	宣城	芜湖
南京									
镇江	81								
常州	127.6	80.5							
扬州	96	36	109.7						
淮安	194.2	206.8	234.6	180					
滁州	77.8	140.1	197.6	131	210.3				
马鞍山	58	134.1	175.8	155	247.1	99			
宣城	158.5	203.3	222.9	248	369.9	191.9	120.4		
芜湖	101.1	181.1	199.5	197	292.3	133.5	52.9	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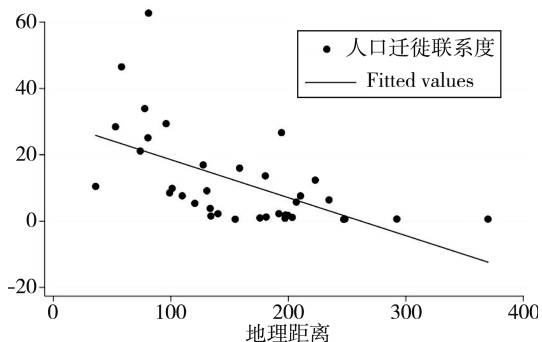


图 2 2022 年南京都市圈各城市人口迁徙联系度与地理距离关系

(三) 春节期间返乡、返城流呈现明显不对称性

本部分参照刘望保(2016)和田琳(2020)等学者的方法绘制南京都市圈内各城市在 2022 年 1 月

29 日至 2 月 8 日这一阶段的每日净迁入指数时间序列图^{②[8][15]},这能很好地反映都市圈内人口跨城区流动的不对称性。结合图 3 可以发现,春节前南京、常州等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会出现大规模的“返乡潮”现象,这一现象在 1 月 30 日(除夕前一天)达到峰值,当日净迁入指数为 -6.19,而当春节假期即将结束时,会出现大规模的回乡人口返城现象,2 月 6 日—7 日(春节假期最后两天)的人口净流入指数呈现最高值,且最高值超过 6.5,春节后的净迁入指数绝对水平高于春节前的净迁入指数绝对水平,这也说明了南京、常州等地区在春节假期后期的“返城流”过程中,城市对外吸引力进一步提高,由此产生了都市圈内人口跨城流动的不对称现象。同时,从图中可以看出南京、常州等城市的每日人口

净迁入指数由春节假期前期的负值转化为春节假期后期的正值,这是由于经济发达地区凭借其雄厚的产业基础、广阔的发展前景以及各类诚意满满的人才引进政策,为外来人口提供了充足的工作岗位和机会。硬实力的支撑以及软实力的推动,使得外来人口愿意流向南京、常州等发达地区。而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一般而言是劳务输出型城市,其相对较低的劳动力价格也为都市圈内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条件。

为便于进一步分析南京都市圈内各城市的人口流动情况及社会联系度,本文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随机抽取任意一个没有法定节假日的时间段,通过百度迁徙数据平台中各城市的人口迁入指数及迁出指数,形成非春节期间、正常工作日的每日净迁入指数时间序列图,以此与春节期间的人口流动情况进行比较分析,此处所选取的时间段为2022年3月21日至2022年3月31日。结合图4可以发现,春节期间上涨的通勤频率使得正常工作日阶段的都市圈内各城市人口流动更具波动性,南京作为都市圈内的龙头城市,在该阶段的周一当日会出现净迁入指数的“小高峰”,分别为3月21日的0.099以及3月28日的0.091,而在该阶段的周五当日会出现净迁入指数的“小低谷”,3月25日出现了该阶段净迁入指数的最低值。同时,由于春节对于中国人的特

殊含义,其所产生的大规模人口迁徙活动使得2022年1月29日至2月8日这一阶段各城市的人口净迁入指数绝对值水平普遍高于2022年3月21日至3月31日,这也更加能阐释都市圈内人口流动的大城市虹吸现象。

基于发展经济学中的人口流动理论可知,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经济发达地区能为外来人口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足额的工作报酬、完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的公共服务提供以及个人能力和自我认同感的提高,这些因素能吸引大量的外来人口前往经济发达地区工作甚至定居,而对于都市圈内其他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而言,工作岗位少、薪资待遇福利不足、就业前景不广阔、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等劣势使得这些地区难以留住高水平人才,导致大量人口流出到经济发达地区。这种现象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为都市圈内经济发达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动力来源,但核心人才的流失会削弱都市圈内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活力,迟滞经济欠发达城市的发展进程,最终影响整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此,对于这些城市而言,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以留住部分高水平人才、提升城市自身实力和内在吸引力、增强其与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的协同性,这些对都市圈内各城市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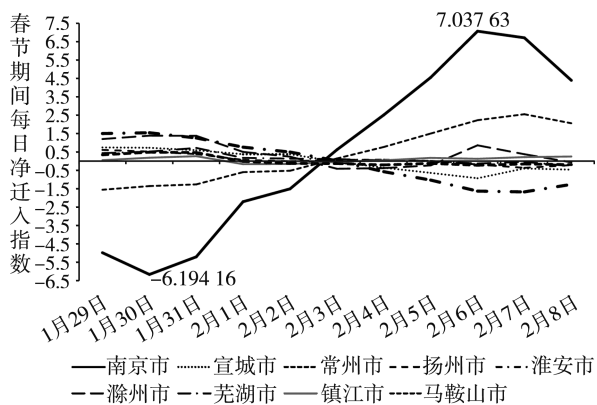


图3 2022年春节期间(1月29日—2月8日)南京都市圈各城市每日净迁入指数

(四)“宁马滁”跨界一体化示范效应显著

《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中指出,未来南京将努力形成“一极两区四带多组团”的新型空间格局,此处的“两区”为宁镇扬和宁马滁两个同城化片区。结合表1和图5中的相关数据,从省际视角进行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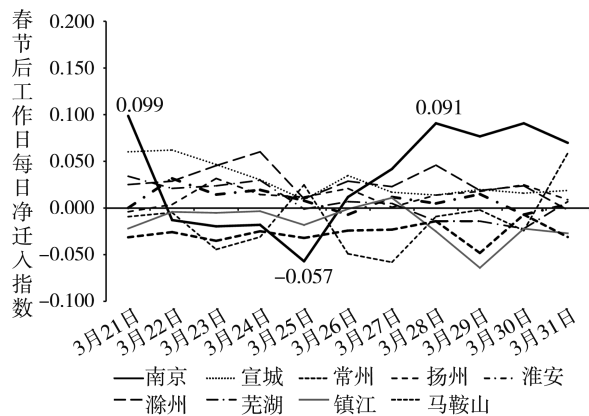


图4 2022年春节后工作日(3月21日—3月31日)南京都市圈各城市每日净迁入指数

察,南京与滁州、马鞍山之间的城市联系度处于较高水平。南京与滁州、马鞍山的人口迁徙联系度高于南京与常州、扬州、淮安等江苏省内城市。同时,2022年1月29日至2月1日从南京迁出至都市圈内其他城市指数以及2022年2月5日至2月8日

从都市圈内其他城市迁入到南京指数都表明南京对马鞍山、滁州的经济辐射影响程度更高。

从地理位置角度来分析,南京与马鞍山、滁州的空 间地理距离十分接近,马鞍山和滁州虽然属于安徽地 界,但它们均与南京交界,分别位于南京的西南和西北 方向,这使得它们更容易接受来自区域中心城市经济辐 射效应,承接中心城市转移的产业服务。从交通设施角 度看,南京—滁州、南京—马鞍山方向的市郊铁路即将 启动,交通便捷程度的提高极大地拉近了城市间的时空 距离,愈加完善的交通系统能降低城市间要素流动的成 本、拓宽都市圈内城市基本功能和服务的共享范围,持 续推动省际平行城市之间的交流协作^[16]。同时,南京 江北新区与安徽省滁州市于2021年9月签订了政务服务 “跨省通办”战略合作协议、马鞍山于2021年7月专门 成立“宁马省际毗邻地区管委会”等举措,都意味着都 市圈内的一体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宁马滁跨界一体化 发展十分显著,这为都市圈内其他城市的跨省交流和 协作提供了示范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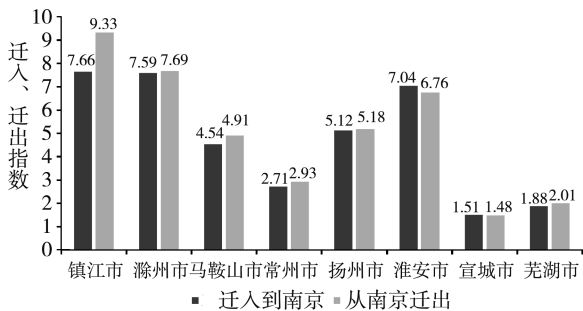


图5 南京都市圈各城市春节假期前期迁出、春节假期后期迁入南京指数

三、进一步促进南京都市圈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一) 发挥好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实现都市圈各城市共同发展

南京作为都市圈内的中心城市,需要通过经济扩散与集聚效应提高其作为中心城市的辐射能级,实现区域发展过程中的带动示范作用^[17]。作为地区性中心城市,应在其已有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如金融、互联网、通信等新业态产业的发展,提升其自主创新能力。对于都市圈中南京之外的其他城市而言,应结合自身特点和发展条件不断提升自身的区域竞争力,以实现与都市圈中心城市的资源优

势互补,促进都市圈的整体协同发展^[18]。具体而言,如:加快都市圈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的建设,以实现不同城市间各层级互动交流、工作规划相互衔接、社会事业共同发展等目标;进一步促进南京都市圈内产业合作园的发展,努力发挥好各城市自身比较优势,与其他地区做好产业配套工作^[19];聚焦宁镇扬片区、宁马滁片区、宁淮片区以及宁宣黄片区的各类建设,以推动片区内各城市间要素的自由流动。“各扬所长、协调共进”的治理模式能够促使南京都市圈的同城化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推进,通过区域间的优势互补来实现合作共赢,不断推动都市圈内各城市的高质量共同发展,由此实现都市圈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全面提高,最大程度发挥都市圈经济效应,使得都市圈内各城市都能成为宜居且富有经济韧性的“幸福城市”。

(二) 持续推进构建区域一体化交通体系,构建“畅达都市圈”

交通可达性反映了城市间相互作用的机会潜能和克服空间分割障碍的能力,能显著提高区域内中心城市经济辐射能力以及城市间的联系度^[20]。因此需加快构建南京都市圈内一体化的交通体系,不断推进都市圈内公共交通的发展^[21]。铁路方面,要深入构建“轨道上的都市圈”,推进市郊铁路、城际铁路等轨道交通资源的整合,全力争取南沿江城际铁路实现全面完成主体工程目标,保证北沿江高铁、宁芜铁路的扩能改造工程全面实施,有序推进宁淮铁路南京段、宁宣铁路、宁扬铁路以及宁马铁路等项目的前期工作,以此实现交通便捷、互联互通的都市圈合作关系;公路方面,需加快推动宁滁、宁和高速公路的前期工作建设,确保宁马高速、宁宣高速、江苏段工程、S126省道江宁段、G328国道的改扩建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由此实现南京与其周边地区的高速公路环成网,以期形成便捷畅通的公路网络,为进一步提高行政区域之间的交流协作提供便利条件;此外,在航运方面,应重点建设南京这一航运枢纽与其周边城市的联运建设,努力形成以禄口机场为主枢纽、周边机场为辅助的机场体系^[22],持续推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T1航站楼南指廊工程的建设,全面提升都市圈内各城市联通国际的能力,促进都市圈的高水平开放性发展,形成“一核两翼六区”的功能结构布局。

(三) 加大都市圈内经济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为克服都市圈内大城市发展的虹吸效应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需加大对都市圈内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和各项优惠扶持政策, 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建设, 规划并实施一系列具有经济带动示范效应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加强对欠发达地区本土企业的税收优惠支持力度, 不断优化企业营商环境, 促使企业做大做强, 由此产生一批能够服务于落后地区发展的先驱性企业, 发挥好这些企业的“排头兵”作用, 为当地人口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以及有保障的工薪报酬。同时, 需要实施引智工程、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为愿意服务且扎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高层次、高水平人才提供相应奖励措施, 如提高其工资福利待遇、保障其住房和医疗等公共服务配置, 注重人才自身的发展需求等, 通过这些措施鼓励部分高层次人才流向经济欠发达地区, 由此推动这些地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 促使其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并进而提高其在都市圈内的核心竞争力。此外, 不仅需要凭借优厚且富有诚意的待遇吸引高层次人才核心人才, 更需要注重都市圈内经济欠发达城市本身的地区形象打造, 在提升其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同时, 要让高层次人才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潜能持有高度的认同感和接受感^[23], 从而使得他们能拥有更加强烈的留职意愿, 如部分经济欠发达城市可凭借其丰厚的旅游资产及和谐舒适的居住环境来进一步加深巩固部分高层次人才留在都市圈内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作甚至定居的意向, 由此打造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新引擎”, 为实现区域内部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合力释放都市圈内各城市的发展潜能提供“催化剂”。

(四) 突破省际联系壁垒, 加强都市圈城市跨省协作

城市发展意愿不一致、成本分担与利益分享比例难以协调等问题会限制城市跨区域合作的程度。由于南京都市圈内各城市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以及受地方本位主义思想的影响, 因此区域间的联系壁垒会阻碍都市圈内各城市的进一步高质量发展以及区域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基于此, 需要对南京都市圈目前的发展管理模式进行创新, 如可以成立一个专门负责调解都市圈内各城市间利益冲突和矛

盾的组织, 并由这一组织制定适应南京都市圈发展的各项规章制度, 以此实现区域间的进一步交流与协作。同时, 为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穿在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全部过程和各个领域, 需要统筹兼顾好各方工作, 协调好各方力量, 目前南京都市圈建设办公室已经正式揭牌, 不久将实现实体化运作, 集中办公的高效能工作模式会使得南京都市圈内的各个城市在推进都市圈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生态环保、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具体工作过程中, 统筹协调好各自的职责任务, 有效避免不同城市之间的工作冲突和利益矛盾等问题。此外, 苏皖两省在鼓励本土企业大力发展的同时, 也不应忽视都市圈内其他省域城市所属企业的需求, 对于外来投资企业, 各级政府应进一步优化落实其投资和信贷环境, 以期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对于都市圈内的各城市能实现跨省协作这一美好愿景, 应复制借鉴并推广“宁马滁”跨界一体化发展的示范效应, 在顺应都市圈各城市经济发展规律的先决条件下, 努力破除区域内各城市间资源互动与共享的阻碍, 不断加强省际城市间的产业分工及合作, 开展切实可行、高效能的区域优势对接及转移, 在资源稀缺、地方财政有限的桎梏下, 实现区域内各城市的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以及都市圈内的一体化程度, 将南京都市圈打造成高效集约且分工合理的全国跨省域都市圈建设先行者, 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不断助力、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其应有贡献。

注释:

- ① 百度迁徙数据平台网址: <https://qianxi.baidu.com>。
- ② 各城市每日净迁入指数 = 区域内总迁入指数 - 区域内总迁出指数。

参考文献:

- [1] 叶南容, 吴海瑾, 曾盛红. “南京都市圈”发展战略下南京江北新区提升区域辐射力的路径[J].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22(1): 85 - 89 + 96.
- [2] 张学良, 李培鑫. 城市群经济机理与中国城市群竞争格局[J]. 探索与争鸣, 2014(9): 59

- 63.
- [3] Simeon Djankov, Caroline Freund. Trade Flow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1987 to 1996[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2(1): 76-90.
- [4] Hidenobu Matsumoto. International Urban Systems and Air Passenger and Cargo Flows: Some Calculations [J]. Journal of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 2004(4): 239-247.
- [5] 鲁金萍,杨振武,刘玉. 京津冀城市群经济联系网络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15(5): 117-122.
- [6] 魏玺,席广亮,甄峰. 商业体系与实际服务人口流动性耦合关系研究——以南京都市圈为例[J]. 经济地理, 2022(6): 55-63+82.
- [7] 蒋小荣,汪胜兰.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人口流动网络研究——基于百度迁徙大数据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17(2): 35-46+127.
- [8] 田琳. 基于迁徙数据的上海都市圈跨城联系特征研究[C]//共享与韧性:数字技术支撑空间治理:2020年中国城市规划信息化年会论文集, 2020:464-471.
- [9] 孙继平,侯兰功. 基于腾讯人口迁徙数据的成渝城市群网络结构特征研究[J]. 现代城市研究, 2020(9): 78-85.
- [10] 张小东,韩昊英,唐拥军,等. 基于百度迁徙数据的中国城市网络结构特征研究[J].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 2021(10): 1798-1808.
- [11] 徐宁,赵虎,陶修华. 基于城市引力的都市圈空间结构演变研究——以南京都市圈为例[C]//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202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4 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 2021: 721-730.
- [12] 袁建军. 都市圈建设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制约因素与实践路径[J]. 学习论坛, 2022(5): 71-79.
- [13] 王佳宁,罗重谱,白静. 成渝城市群战略视野的区域中心城市辐射能力[J]. 改革, 2016(10): 14-25.
- [14] 赵金涛. 京津冀经济一体化中的科学决策与行政壁垒探讨[J]. 特区经济, 2010(4): 60-61.
- [15] 刘望保,石恩名. 基于ICT的中国城市间人口日常流动空间格局——以百度迁徙为例[J]. 地理学报, 2016(10): 1667-1679.
- [16] 张学良,林永然. 都市圈建设: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J]. 改革, 2019(2): 46-55.
- [17] 徐志华,杨强,申玉铭. 区域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综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6(3): 40-45.
- [18] 栾强,罗守贵,郭兵. 都市圈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力的分形测度及影响因素——基于北京、上海、广州的实证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6(4): 58-62.
- [19] 王先柱,黄河. 南京都市圈产业合作园高质量发展研究:模式、经验与建议[J].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 2022(1): 90-96.
- [20] 刘辉,申玉铭,孟丹,薛晋. 基于交通可达性的京津冀城市网络集中性及空间结构研究[J]. 经济地理, 2013(8): 37-45.
- [21] 陈晓华,吴仕婧. 南京—合肥双都市圈区域空间格局研究——基于城市流的视角[J]. 华东经济管理, 2021(11): 35-44.
- [22] 汪毅. 探索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新路[J]. 群众, 2022(5): 19-20.
- [23] 邵建平,李芳红. 欠发达地区核心人才流失与地域认同度关系实证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2(13): 28-31.

(责任编辑:向梅)

(校对:江南)

南京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温李庆 顾巍巍 班 鸣

[摘要]基于统计年鉴关于南京都市圈各城市各产业增加值数据,对比分析产业发展现状,利用区位熵、灰色关联度等分析法进行建模研究。结果表明,根据产业发展现状,南京都市圈城市可划分为3个梯队;根据区位熵分析,得到各城市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根据灰色关联度分析,提出都市圈产业跨区域协同和集群化发展重点方向。根据上述结果,从南京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视角提出以下建议:因地制宜发展主导产业,形成产业发展雁阵格局;聚焦重点布局跨区域产业,形成产业发展集群效应;建立完善协同发展规则体系,形成产业发展长效机制。

[关键词]南京都市圈;产业协同;区位熵;灰色关联度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23)01-0088-09

引言

当前,我国正在进入新型城镇化时代,都市圈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区域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出现的现象,也是城市地域空间形态演化的高级形式^[1]。2021年2月,《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原则同意,成为中国第一个经国家批复建设的都市圈。截至目前,国家发改委已经批复了多个都市圈规划,包括南京、福州、成都、西安、长株潭等。其中,南京都市圈地跨苏皖两省,是唯一跨省规划建设都市圈。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信息全球化的演进,都市圈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介入全球竞争的基本单元。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产业全球化,都市圈的产业竞争力决定着整个区域的经济水平和发展潜力。南京都市圈制造业实力雄厚、金融体系完整、科教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是国家重要的制造业、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教和文化中心。随着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的全面推进,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如何充分发挥都市

圈各城市的资源禀赋和主导产业优势,建立城市间产业的跨区域协同和集群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是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面临的重大且紧迫的课题。

本文基于统计年鉴关于南京都市圈各城市各产业增加值数据,对比分析产业发展现状,利用区位熵、灰色关联度等分析法进行建模研究。并据此得出相应的结论,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创新点在于3个方面:一是根据产业发展现状,将都市圈各城市划分为3个梯队。二是根据区位熵分析,得出各城市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三是根据灰色关联度分析,提出都市圈产业跨区域协同和集群化发展重点方向。

一、文献综述

德国学者哈肯最早提出了产业协同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个系统内子系统间的伺服原理和自我组织原理可以实现各系统的协调发展,从而产生协同效应^{[2]98}。近年来,都市圈、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逐渐成为国内研究热点。赵双琳等人从产业协同发展内涵、区域产业协同理论、产业协同效应评估等方

* [收稿日期] 2022-07-13

[作者简介] 温李庆,工学硕士,南京市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中级经济师,210000;顾巍巍,军事学学士,南京市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中级经济师,210000;班鸣,文学学士,南京市宏观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师,210000。

面分析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提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核心是区域产业的协同合作^[3]。在都市圈产业协同研究方面,陈红艳等人从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空间重组的角度研究了东京都市圈产业重构的演进历程^[4]。在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评估方面,刘怡等人运用区位熵及修正后的灰色关联度分析法评估了京津冀地区各城市、各行业的产业发展状况,并从产业布局、制度设计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5]。在城市群产业协同机制创新方面,陈燕等人对粤港澳大湾区分行业区位熵以及城市间和行业间的灰色关联度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的机制创新建议^[6]。在城市两业协同集聚的影响方面,邢会等人探究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作用,为产业协同集聚理论提供了新视角^[7]。

目前,对南京都市圈产业协同方面的研究较少。陈芳英利用区位熵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南京都市圈区域内的产业集聚优势和城市产业结构布局现状进行研究,并从都市圈产业一体化的视角提出建

议^[8]。但该研究基于都市圈 2019 年的产业增加值和城镇单位就业人数,未解决数据项类别不协调且部分重合的问题,影响结论的科学性。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关于区域产业协同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对南京都市圈产业协同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南京都市圈各城市产业发展现状,采用区位熵、灰色关联度等分析方法对南京都市圈各城市各产业进行建模研究,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二、产业发展现状及规划重点方向

(一) 产业发展现状

南京都市圈总面积 6.54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 0.7%。由表 1 可知,2021 年年末,都市圈常住人口约 3 548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2.5%,经济总量近 4.7 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 4%。2021 年都市圈三次产业结构为 4.35:43.57:52.08,都市圈城镇化率 73.85%,高于全国 9 个百分点。综合来看,南京都市圈 8 市 2 区(县)经济发展现状可分为 3 个梯队。

表 1 2021 年南京都市圈各城市相关经济指标

地区	行政区域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地区生产 总值(亿)	增长率 (%)	第一产业 增加值 占比(%)	第二产业 增加值 占比(%)	第三产业 增加值 占比(%)	常住人口 (万人)	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 (万元)	城镇化 率(%)
南京	6 587	16 355.32	7.5	1.86	36.09	62.05	942.34	17.45	86.90
镇江	3 840	4 763.42	9.4	3.30	48.70	48.00	321.72	14.82	79.88
扬州	6 591	6 696.43	7.4	4.73	47.90	47.37	457.70	14.63	71.42
淮安	10 030	4 550.13	10.0	9.30	41.52	49.18	456.22	9.98	66.21
芜湖	6 009	4 302.63	11.6	3.94	47.62	48.44	367.20	11.72	71.90
马鞍山	4 049	2 439.33	9.1	4.27	49.45	46.28	215.70	11.30	72.39
滁州	13 433	3 362.10	9.9	8.56	48.92	42.52	399.00	8.43	62.90
宣城	12 340	1 833.90	10.1	9.38	48.57	42.05	248.70	7.35	61.75
金坛	975	1 101.09	9.5	3.69	51.91	44.40	59.29	18.57	66.84
溧阳	1 536	1 261.30	10.1	4.50	51.44	44.06	80.43	15.68	64.09
都市圈	65 390	46 665.65	/	4.35	43.57	52.08	3 548.30	13.15	73.85

注:数据来源于各城市 2021 年统计公报

第一梯队是以南京为代表的都市圈中心城市,南京以占都市圈 10% 的土地面积,集聚了都市圈近 27% 的人口,贡献了都市圈超 35% 的经济总量,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 17.45 万元。南京市在都市圈的经济总量和常住人口首位度高,人口城镇化率高,第三产业发达,是都市圈名副其实的龙头城市。

第二梯队是以镇江、扬州、芜湖、马鞍山等 4 市,金坛、溧阳等 2 区(县)为代表的地区。4 市 2 区(县)以占都市圈超 35% 的土地面积,集聚了都市圈超 42% 的人口,贡献了都市圈超 44% 的经济总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3.69 万元。第二梯队的 4 市 2 区(县)工业基础好,三次产业发展均衡,增长动能强劲,是都市圈未来的增长极。

第三梯队是以淮安、滁州、宣城等 3 市为代表的地区,3 市以占都市圈近 55% 的土地面积,集聚了都市圈超 31% 的人口,贡献了都市圈近 21% 的经济总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8.38 万元。第三梯队的 3 个城市生态资源丰富,发展腹地广阔,是都市圈的潜力地区。

从产业结构来看,由图 1 可知,近年来,南京都市圈整体上呈现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持续上升、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逐步下滑、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稳中有降的发展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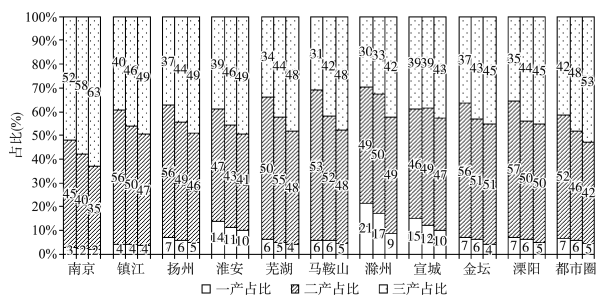


图 1 2010、2015 和 2020 年南京都市圈各城市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图

注:每组柱形图从左到右分别为对应城市 2010、2015 和 2020 年三次产业结构占比情况。数据来源于各城市 2011、2016、2021 年统计年鉴。

分梯队看,以南京为代表的都市圈第一梯队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由 2010 年的 52% 稳步提升到 2020 年的 63%,是都市圈城市中唯一一个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超 50% 的城市,表明南京已经迈入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化时期。

以镇江、扬州、芜湖、马鞍山等 4 市,金坛、溧阳等 2 区(县)为代表的第二梯队城市,虽然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从 2010 年到 2020 年逐步降低,但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大体相当,均高于同期全国值(38%)近 10 个百分点,表明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是南京都市圈第二梯队城市发展的基础,同时存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持续下降的隐忧。

以淮安、滁州、宣城等 3 市为代表的第三梯队城

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相对较高,但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均衡,后续发展潜力较大。

(二) 产业规划重点方向

通过查阅南京都市圈各城市发展规划、近年来政府工作报告等文件,收集整理出各城市的产业规划重点方向如表 2 所示。可以看出,南京都市圈各城市的产业发展处于不同阶段,其重点方向存在一定的竞合关系和互补性。

在竞争合作方面,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制造、软件和信息服务、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轨道交通、智能电网等产业是都市圈多个城市产业规划布局的重点。具体来看,南京、镇江、扬州、芜湖、滁州、宣城、金坛、溧阳等 8 市(区)将新能源汽车及其相关产业作为规划重点方向,南京、镇江、扬州、淮安、芜湖、马鞍山、滁州等 7 市将智能装备制造相关产业作为规划重点方向,南京、镇江、扬州、淮安、芜湖、宣城、金坛等 7 市(区)将软件和信息服务相关产业作为规划重点方向,南京、镇江、扬州、溧阳等 4 市(区)将智能电网产业作为规划重点方向。其中南京的软件和信息服务、新型电力(智能电网)装备制造集群已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具有集群化发展优势,都市圈各市(区)在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制造、软件和信息服务、智能电网等产业进行差异化布局和特色化发展,有利于该产业在都市圈范围内形成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优势,提升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在产业互补性和特色产业发展方面,淮安的绿色食品和生态旅游、宣城的文房四宝等文旅产业和绿色食品、滁州的休闲旅游和健康养生等产业规划重点方向,充分发挥了淮安、宣城、滁州等城市生态资源丰富、农业产业发达的资源禀赋优势,和南京、镇江、扬州等市生态资源紧张形成优势互补。南京的集成电路、滁州的硅基材料和半导体、金坛的光伏等产业在半导体产业链上下游形成分工协作。镇江和扬州的航空航天和海工装备、扬州的高端纺织和服装、芜湖的电线电缆、滁州的智能家电、马鞍山的钢铁、溧阳的农牧与饲料机械等产业都是各市(区)根据自身现有产业基础规划的特色产业发展方向,有着独特的差异化发展优势。

表2 南京都市圈各城市产业规划重点方向

城市	产业规划重点方向
南京	8大产业链:软件和信息服务、新医药与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新能源、集成电路、智能电网、轨道交通、智能装备制造 创新产业体系:着力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智能电网两大优势产业,做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两大先导产业,着力突破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等潜力产业,积极布局未来网络与通信、基因技术、氢能与储能等产业新赛道
镇江	重点培育8大产业链: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汽车)、高性能材料、医疗器械和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海工装备、智能农机设备
扬州	先进制造业集群: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装备、新型电力装备等3个千亿级集群。软件和信息服务、高端纺织和服装等2个五百亿级集群。海工装备和高技术船舶、生物医药和新型医疗器械、食品等3个百亿级集群。1个航空产业发展集群
淮安	3大制造业发展方向:绿色食品、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型装备制造 3大主导服务业:生态旅游、现代物流、现代商贸 3大特色农业产业:特优高效种植、特种健康养殖、特色生态休闲
芜湖	4大支柱产业:汽车及零部件、材料、电子电器、电线电缆 10大战略新兴产业: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现代农机及智慧农业产业、航空临空产业、微电子产业、新型显示产业、轨道交通装备产业、新材料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线上经济产业 6大服务业:金融业、物流业、新型信息服务、工业设计和检验检测、新型商贸、文化旅游
马鞍山	产业集群:做精做深钢铁主业,延伸拓展智能装备、轨道交通装备、高端数控机床等3大战略新兴产业,培育N个地标产业
滁州	先进制造业发展体系:智能家电、先进装备、硅基材料、绿色能源、新型化工、健康食品等6大千亿级产业,智能仪器仪表、轨道交通装备、新型功能纺织材料、凹凸棒基新材料、智能出行装备、绿色涂料、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医药、燃料电池等10个以上百亿级产业 现代服务业发展体系:商贸流通、文化创意、休闲旅游、健康养生等4大生活性服务业,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科技服务、电子商务等5大生产性服务业
宣城	特色产业链:汽车零部件、新能源等2大核心产业。电子信息、节能环保装备、新材料、大数据和软件信息服务业、文房四宝等文旅产业、精细化工、绿色食品、大健康等8大优势产业
金坛	特色产业: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和光伏产业
溧阳	4大重点产业:动力电池、智能电网、汽车及零部件、农牧与饲料机械

注:资料来源于各城市发展规划、近年来政府工作报告等文件

三、模型构建

(一) 优势产业的测度—区位熵模型

都市圈优势产业的测度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从产业集聚来看,某产业在都市圈各城市之间的差异越大,表明该产业的专业化程度越高,产业发展越容易形成集聚效应。另一方面从产业发展来看,产业结构专业化体现的是某城市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的发展水平,可为城市制定产业政策提供指引。

区位熵指数又称专业化指数,它由哈盖特(P. Haggett)首先提出并运用在区位分析中,用于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

和作用^[9]。本文采用区位熵指数对南京都市圈的产业结构专业化程度开展研究,计算公式如下:

$$Q_{ij} = \frac{a_{ij} / \sum_{i=1}^n a_{ij}}{\sum_{j=1}^m a_{ij} / \sum_{i=1}^n \sum_{j=1}^m a_{ij}} \quad (1)$$

式中: Q_{ij} 表示 j 城市 i 产业的区位熵指数; a_{ij} 表示 j 城市 i 产业的生产总值; $\sum_{i=1}^n a_{ij}$ 表示 j 城市的生产总值; $\sum_{j=1}^m a_{ij}$ 表示都市圈 i 产业的生产总值; $\sum_{i=1}^n \sum_{j=1}^m a_{ij}$ 表示都市圈的生产总值。

由公式 1 可知,南京都市圈某城市某产业的区位熵指数 Q_{ij} 是指该城市某产业生产总值和该城市所有产业生产总值的商与南京都市圈该产业生产总值和都市圈所有产业生产总值的商的比值。区位熵指数越高,表明在都市圈范围内,该产业在该城市的集聚效应越明显、专业化生产水平越高。具体判断标准为:若 $Q_{ij} = 1$,表明 j 城市 i 产业的发展水平与南京都市圈 i 产业的发展水平相当,专业化发展优势不明显;若 $Q_{ij} > 1$,表明 j 城市 i 产业的发展水平高于南京都市圈 i 产业的发展水平,具有专业化发展优势;若 $Q_{ij} < 1$,表明 j 城市 i 产业的发展水平低于南京都市圈 i 产业的发展水平,缺乏专业化发展优势。

(二) 产业关联的测度—灰色关联度模型

灰色关联度模型是对系统的动态发展过程进行量化分析的方法,用来考察系统各因素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表现为系统各因素之间变化的相近性和发展趋势的相似性,从而识别影响系统发展状态主次因素的重要方法^[10]。本文在都市圈区位熵的基础上,用灰色关联度模型测度都市圈城市和产业的相似度。灰色关联度模型建立过程如下:

第一步:建立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以南京都市圈 i 产业区位熵值作为参考数列 $x_0(i) = \{x_0(1), x_0(2), \dots, x_0(n)\}$, n 为产业数。各城市相应产业的区位熵值作为比较数列 $x_j(i) = \{x_j(1), x_j(2), \dots, x_j(n)\}$, j 为城市序号。

第二步:将比较数列进行初值化处理。其计算

公式为: $\Delta_j = |x_j(i) - x_0(i)| = \{|x_j(1) - x_0(1)|, |x_j(2) - x_0(2)|, \dots, |x_j(n) - x_0(n)|\}$ 。

第三步:计算灰色关联度。公式为:

$$\varepsilon_j(i) = \frac{\min_j \min_i \Delta_j(i) + \alpha \max_j \max_i \Delta_j(i)}{\Delta_j(i) + \alpha \max_j \max_i \Delta_j(i)} \quad (2)$$

式中, α 为分辨系数,一般取值 0.5。

第四步:计算各城市的灰色关联度 $R(j)$ 和各产业的灰色关联度 $R(i)$, 公式为

$$R(j) = \frac{1}{n} \sum_{i=1}^n \varepsilon_j(i) \quad (3)$$

$$R(i) = \frac{1}{m} \sum_{j=1}^m \varepsilon_j(i) \quad (4)$$

灰色关联度的取值范围为 0 ~ 1。某个城市的灰色关联度数值越高,表明该城市的产业结构与都市圈的产业结构差异越小,反之则越大。某个产业的灰色关联度数值越高,表明该产业在都市圈内布局均衡,发展差异较小,反之则差异越大。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以 2020 年南京都市圈 9 个城市^① 19 个行业门类增加值指标为基础数据,具体的产业划分和选取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关于我国行业门类划分的规定,具体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21》《安徽统计年鉴 2021》《江苏统计年鉴 2021》。

(一) 区位熵分析

表 3 南京都市圈各城市各产业区位熵指数

产业	行业门类	南京	镇江	扬州	淮安	常州	芜湖	马鞍山	滁州	宣城	都市圈
第一产业	农林牧渔业	0.48	0.90	1.21	2.38	0.52	0.97	1.02	2.01	2.26	0.60
第二产业	采矿业	0.37	0.70	1.80	0.98	0.14	0.02	0.30	7.00	0.73	0.16
	制造业	0.83	1.14	1.03	0.88	1.18	1.08	1.13	1.02	1.05	1.27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0.64	2.52	1.14	1.29	0.89	0.56	0.10	1.58	0.67	0.46
	建筑业	0.83	0.72	1.25	1.19	0.68	1.44	1.26	1.32	1.46	1.01
第三产业	批发和零售业	0.95	1.22	1.01	0.79	1.11	1.14	1.10	0.70	0.94	0.9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99	1.16	0.70	0.99	0.81	1.38	0.87	1.26	1.54	0.82
	住宿和餐饮业	0.95	0.93	0.88	1.27	1.04	1.00	1.03	1.00	1.15	0.83
	金融业	1.49	1.05	0.68	0.77	0.99	0.59	0.52	0.55	0.66	1.08

续表

产业	行业门类	南京	镇江	扬州	淮安	常州	芜湖	马鞍山	滁州	宣城	都市圈
第三产业	房地产业	0.94	0.89	1.38	1.12	0.98	0.81	0.95	0.97	0.78	1.0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37	0.33	0.37	0.59	0.60	0.19	0.25	0.09	0.10	1.1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73	0.58	1.00	0.99	1.96	1.69	0.65	0.12	0.42	0.9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59	0.97	0.89	0.74	1.07	0.32	0.53	0.19	0.11	1.06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30	1.45	0.76	1.28	0.77	0.27	0.48	1.18	0.42	1.2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87	1.16	1.24	2.14	1.47	0.32	0.15	0.20	0.01	0.40
	教育	1.13	0.68	0.78	0.90	0.47	1.37	1.71	1.69	1.12	0.99
	卫生和社会工作	1.08	0.70	0.87	1.19	0.60	1.12	1.46	1.49	1.13	0.9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18	1.32	0.76	0.82	1.66	0.40	0.46	0.21	0.29	0.81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00	0.84	1.14	1.01	0.77	0.91	1.32	1.25	1.27	1.00

从产业集聚看,如表 3 所示,南京都市圈农林牧渔业区位熵指数为 0.6,表明从全国看,以农林牧渔业为代表的的第一产业并非都市圈的优势产业。其中,南京、常州等 2 市为 0.5 左右。镇江、扬州、芜湖、马鞍山等 4 市略高,为 1 左右。淮安、滁州、宣城等 3 市超过 2。表明从都市圈看,以南京、常州为代表的城市已开始向现代都市农业转型,淮安、滁州、宣城等 3 市的农林牧渔业基础好,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是都市圈农产品的主要供应基地。

第二产业中,南京都市圈制造业、建筑业的区位熵指数均超过 1,其中制造业区位熵高达 1.27,表明从全国看,南京都市圈制造业发达,产业优势明显。从都市圈看,镇江、扬州、常州、芜湖、马鞍山、滁州、宣城等 7 市的制造业区位熵均大于 1,南京、淮安等 2 市的制造业区位熵均接近 1,表明南京都市圈各城市制造业基础雄厚,专业化程度高,集聚优势明显,为都市圈制造业集群化发展奠定基础。

第三产业中,南京都市圈金融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行业的区位熵指数均超过 1,具有产业集聚优势。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产业区位熵较高,表明南京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发达、生活性服务业完善,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极大地提升居民生活水平。

从城市发展看,南京第三产业发达,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区位熵均位列都市圈首位。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区位熵高达 2.37,具备较强的集聚发展优势,是南京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是典型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重要要素保障,具有较高的附加值和外溢性。南京上述产业的区位熵较高,表明作为中心城市,南京对于都市圈的信息、资金、技术、人才等高端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能力强。

镇江的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批发和零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产业的区位熵值位居都市圈首位,表明镇江作为工业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商务商贸发展优势明显。扬州的房地产业区位熵位居都市圈首位,同时其他产业的发展较为均衡。常州的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区位熵位居都市圈首位,表明制造业是常州发展的根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撑,同时常州还是都市圈重要的文化、体育和娱乐中心。芜湖各产业发展均衡,其中建筑业区位熵仅次于宣城,位居都市圈第二。马鞍山的教育、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区位熵是都市圈最高的。

淮安的农林牧渔业区位熵位居都市圈首位,其独具的生态优势和美食文化,带动了淮安的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发展,相关产业的区位熵也位于都市圈首位。滁州的采矿业、

卫生和社会工作区位熵位居都市圈首位。宣城的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区位熵位居都市圈首位,农林牧渔业的优势也很明显。

(二) 灰色关联度分析

根据表 3 及公式 3 关于灰色关联度算法,计算得到南京都市圈各城市灰色关联度如表 4 所示。除滁州、宣城外,其他城市的灰色关联度均大于 0.9,其中南京的灰色关联度最高,为 0.93。表明南京作为都市圈中心城市,其产业结构和都市圈整体产业结构高度相似。以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芜湖等 5 市为代表的第二梯队城市,其产业结构和都市圈整体产业结构差异较小,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也较高,城市之间在产业竞争合作中有着分工化、集群化发展的基础和潜力。以淮安、滁州、宣城等 3 市为代表的第三梯队城市灰色关联度值排名靠后,说明这 3 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和南京都市圈整体产业结构存在较大的互补性,未来应重点关注产业的差异化布局机会。

表 4 南京都市圈各城市灰色关联度

城市	灰色关联度
南京	0.93
镇江	0.90
扬州	0.91
淮安	0.90
常州	0.92
芜湖	0.90
马鞍山	0.91
滁州	0.84
宣城	0.88

根据表 3 及公式 4 关于灰色关联度算法,计算得到南京都市圈各产业灰色关联度如表 5 所示。根据表 3,排除都市圈整体区位熵较小的非优势产业,如农林牧渔业,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等产业的影响。可以看出,一方面,都市圈在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生活性服务业灰色关联度值较高,表明都市圈各城市的相关产

业发展均衡,为都市圈居民的高品质生活提供支撑。另一方面,都市圈在制造业、建筑业等工业产业和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的灰色关联度值较高,表明工业是南京都市圈发展的基础,同时生产性服务业的均衡发展为都市圈的工业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撑。都市圈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灰色关联度低,同时南京的该产业区位熵高,表明该产业在都市圈内部发展不均衡,呈现出南京专业化、集群化发展,其他城市协同发展的现象。

表 5 南京都市圈各产业灰色关联度

产业	灰色关联度
农林牧渔业	0.84
采矿业	0.82
制造业	0.9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0.85
建筑业	0.92
批发和零售业	0.9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93
住宿和餐饮业	0.95
金融业	0.91
房地产业	0.9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8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89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0.8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90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85
教育	0.91
卫生和社会工作	0.93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90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0.96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 主要结论

本文梳理了南京都市圈产业发展现状及规划重点方向,并对都市圈各城市各产业的区位熵、灰色关联度进行建模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从产业发展现状看,南京都市圈各城市分为

三个梯队。南京为第一梯队,是都市圈中心城市,经济总量和常住人口首位度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口城镇化率高,第三产业发达,已迈入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化时期。镇江、扬州、常州、芜湖、马鞍山等5市为第二梯队,工业基础好,三次产业发展均衡,增长动能强劲,是都市圈未来的增长极。淮安、滁州、宣城等3市为第三梯队,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相对较高,生态资源丰富,发展腹地广阔,发展潜力较大。

2. 从区位熵看,第一产业并非南京都市圈的优势产业,淮安、滁州、宣城等第三梯队城市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建筑业是南京都市圈的优势产业,各城市发展较为均衡。特别是制造业,各城市和都市圈的区位熵均较高,已形成都市圈制造业集群化发展的独特优势。第三产业除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外,都市圈的其他产业区位熵均较高。其中南京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区位熵均位列都市圈首位,体现了南京对于都市圈内的信息、资金、技术、人才等高端生产要素资源具备较强的配置能力。

3. 从灰色关联度看,南京都市圈各城市间产业的协同性大于差异性,有利于都市圈各城市间产业的跨区域协同和集群化发展。具体来看,都市圈各城市制造业发展均衡,规划重点方向特色性强且协同度高。生产性服务业发达、生活性服务业完善,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极大地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共同推动都市圈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二) 对策建议

1. 因地制宜发展主导产业,形成产业发展雁阵格局。都市圈在产业协同发展的过程中,要从城市的资源禀赋条件和产业发展基础出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谋划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例如淮安、滁州、宣城生态资源丰富,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生态文旅产业,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依托城市周边沿山环湖及农村地区建设环南京一小时鲜活农产品流通圈。镇江、扬州、常州、芜湖、马鞍山等市要进一步巩固工业发展优势,主动加强与南京生产性服务业的对接合作,加快工业的转型升级步伐,努力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南京作为都市圈的创新高地,应充分

发挥信息、资金、技术、人才优势,提升服务性生产要素支撑能力,主动对接都市圈其他城市产业转型发展需求,探索形成“研发总部在南京、生产基地在都市圈”的产业协同发展格局。

2. 聚焦重点布局跨区域产业,形成产业发展集群效应。依托淮安、滁州、宣城生态资源丰富、农业特色发展优势,以特色种养殖、农产品流通加工、特色生态休闲等为主要内容,布局集体体验、游憩、文化创意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文旅康养产业集群,重点满足都市圈居民休闲旅游需求,规划建设都市圈纵向自驾游廊道,打造宁淮滁宣生态经济带。依托沿江5市制造业发展优势,聚焦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制造、智能电网等重点制造业产业,错位发展、协同布局,共同打造都市圈沿江制造业高地。以南京建设引领性国家创新型城市为契机,聚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创新资源、拓展发展腹地,将南京建设成为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3. 建立完善协同发展规则体系,形成产业发展长效机制。南京都市圈在产业协同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建设。以宁淮智能制造产业园、省际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示范区、G312科创走廊等跨区域合作发展平台为牵引,将共建产业园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试点,加快破除行政壁垒和体制障碍,实现广泛的同城化效应,高效推进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和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要建立互利互惠、平等互信的利益协调机制。全面、系统地建立都市圈产业园区开发建设、运营管理、利益分配、绩效考核等方面的规则体系,避免出现产业园区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同质竞争,形成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

注释:

① 因金坛区、溧阳市统计数据缺失,且金坛区和溧阳市均属于常州市管辖,其产业结构与常州市相似,本文用常州市统计数据代替金坛区和溧阳市的统计数据。

参考文献:

[1] 薛俊菲,顾朝林,孙加凤.都市圈空间成长的过程及其动力因素[J].城市规划,2006(3):

- 53-56.
- [2] [德]赫尔曼·哈肯. 大自然成功的奥秘: 协同学[M]. 凌华复,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 [3] 赵双琳, 朱道才. 产业协同研究进展与启示[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2009(6): 15-20.
- [4] 陈红艳, 骆华松, 宋金平. 东京都市圈人口变迁与产业重构特征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9): 1498-1511.
- [5] 刘怡, 周凌云, 耿纯.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评估: 基于区位熵灰色关联度的分析[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7(12): 119-129.
- [6] 陈燕, 林仲豪.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产业协同的灰色关联分析与协调机制创新[J]. 广东财
- 经大学学报, 2018(4): 89-97.
- [7] 邢会, 谷江宁, 张金慧. 两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禀赋差异视角[J]. 华东经济管理, 2021(12): 72-79.
- [8] 陈芳英. 南京都市圈城市间产业结构互补吗? ——基于产业协同度评价的实证研究[J]. 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 9-16.
- [9] 于强.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制造业的产业转移[J]. 中国流通经济, 2021(1): 70-78.
- [10] 周文浩, 曾波. 灰色关联度模型研究综述[J]. 统计与决策, 2020(15): 29-34.

(责任编辑: 田青)

(校对: 木子)

(上接第53页)

- [8] 陈建平, 胡卫卫, 郑逸芳. 农村基层小微权力腐败的发生机理及治理路径研究[J]. 河南社会科学, 2016(5): 25-31.
- [9] 甄小英. 规范农村基层“小微权力”的思路与对策[J]. 国家治理, 2017(31): 42-48.
- [10] 湖南省娄底市财政监督检查局. 关于“村级小微权力+互联网+监督”平台建设的思考——基于湖南省娄底市的调研分析[J]. 财政监督, 2019(11): 47-51.
- [11] 渠敬东, 周飞舟, 应星.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9(6): 104-127+207.
- [12] 王海娟, 贺雪峰. 资源下乡与分利秩序的形成[J]. 学习与探索, 2015(2): 56-63.
- [13] 张静. 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问题与回顾[J]. 开放时代, 2001(9): 5-13.
- [14] 刘建军, 莫丰玮. 国家从未离场, 何须找回? [J]. 探索与争鸣, 2021(1): 75-85+178+2.
- [15] 钟伟军, 陶青青. 压力下的权威拓展: 基层政府如何塑造非正式治理资源——基于浙江省W镇“仲规侬”的案例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2021(2): 128-139+174.
- [16] 亨廷顿. 难以抉择: 发展中国的政治参与[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 [17] 卢福营. 经济能人治村: 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J]. 学术月刊, 2011(10): 23-29.
- [18] 贺雪峰. 治村[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19] 赵树凯. 乡村治理的百年探索: 理念与体系[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4): 11-28.
- [20] 习近平. 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N]. 光明日报, 2020-01-14(01).
- [21] 中共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 [22] 吴理财, 解胜利.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 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 16-23+162-163.
- [23] 孙顺华. 媒体叙事中的新乡贤文化建构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11): 148-155.

(责任编辑: 淑萍)

(校对: 木子)